

| 罗海岩 著 |

© 版權 GianAngelo Pistoia

法拉奇

向世界投不信任票

法拉奇是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纽约时报》

新华出版社



罗海岩，新华社高级编辑，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1991年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毕业，获新闻文学双学位。先在新华社从事新闻采编业务，后从事图书编辑工作。

关于本书 世界著名记者、作家法拉奇2006年9月14日逝世后，国内首部介绍法拉奇的著述。本书详细介绍法拉奇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及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等代表性作品所传播的理念和历史意义。前五章记叙她采访部分世界领袖的场景，其余部分评述法拉奇其人其事。

法拉奇向世界投不信任票

罗海岩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拉奇向世界投不信任票 / 罗海岩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 - 7 - 5011 - 7828 - 5
I. 法... II. 罗... III. ①法拉奇 (1930~2006)
—生平事迹②法拉奇 (1930~2006)—文学研究
IV. ①K835. 465. 6②I546.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1850 号

法拉奇 向世界投不信任票

作 者: 罗海岩
责任编辑: 窦欣平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1 - 7828 - 5
定 价: 26.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目 录

序	我心中的法拉奇	(1)
引 言	拉开世界的“铁幕”	(1)
	1. “铿锵玫瑰”的魅力	(1)
	2. 本书的内在逻辑	(5)
第一章	对话东方国度的领路人	
	——法拉奇与邓小平	(1)
	1. 满川风雨看潮头	(2)
	2. 毛主席像还要挂多久	(4)
	3. 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7)
	4. 中国影响的几何倍数放大	(10)
第二章	挑战白宫的新闻博弈	
	——法拉奇与基辛格	(15)
	1. 两个人的“越南之战”	(16)
	2. 尼克松思维的“保姆”	(21)
	3. 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	(24)

4. 一肩担政治, 一肩担女人 (27)
5. 历史不记载没有发生的事 (30)

第三章 神秘莫测的抵抗首领

- 法拉奇与阿拉法特 (33)
1. 是一只猛禽, 还是一头羚羊 (34)
 2. 抵抗运动的设计者 (36)
 3. 无数支蜡烛照亮阿拉伯民族 (38)
 4. 爱国者, 而非思想家 (41)

第四章 牧歌的琴弦弹奏政治

- 法拉奇与西哈努克 (47)
1. 田园牧歌式的国王 (48)
 2. 流亡元首的精神家园 (50)
 3. 是美国废黜了我 (55)
 4. 谁都不是最终的胜利者 (58)
 5. 没有选择的自由思想家 (59)

第五章 统治五亿人口的伟大女性

- 法拉奇与甘地夫人 (65)
1. 那双淡褐色略带忧伤的眼睛 (66)
 2. 女人眼里的战争 (69)
 3. 非教徒, 不结盟 (71)
 4. 圣女贞德是我的梦 (74)
 5. 幸福只是一片飘零的落叶 (76)

第六章 明星的传奇制造 (81)

1. 我的舞台, 我做秀 (82)
2. 提问式的攻击利器 (87)
3. 激情冲荡的感情张力 (90)

第七章 为文学撕扯的记者心灵 (95)

1. 新闻和文学的“杀手铜” (96)
2. 新闻界借去的作家 (99)
3. 双性气质的绝妙统一 (103)

第八章 神话背后的傲慢与偏见 (106)

1. 阶级立场的歧见 (107)
2. 东西方文明的价值偏差 (109)
3. 世界上从来没有精英 (112)
4. 对女性政治家的例外推崇 (117)

第九章 散步也揣着炸弹的情人 (120)

1. 乱世情殇一沙鸥 (121)
2. 《男子汉》宣言 (124)
3.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127)

第十章 9·11 后的复出 (133)

1. 向西方世界发出警告 (134)
2. 《愤怒与自豪》激起千层浪 (138)
3. 法拉奇转向的社会成因 (141)
4. 极端主义的视界 (144)

第十一章 中国观点的法拉奇	(147)
1. 公允新闻的源代码	(148)
2. 法拉奇在中国	(152)
3. 一个人引发的同类示范意义	(157)
4. 让伪新闻从业者汗颜	(159)
5. 我们是否还需要法拉奇	(163)
第十二章 死神也不能让她停止发问	(169)
1. 一个精彩的故事再也没了下文	(170)
2. 将生命的印记留给世界	(175)
3. 向死而生	(178)
附录一：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183)
附录二：《风云人物采访记》原著序言	(190)
附录三：法拉奇采访维利·勃兰特	(195)
附录四：联合国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	(214)
附录五：美国三项新闻道德准则	(216)
附录六：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原则声明	(220)

序

我心中的法拉奇

18年前，当我从书店买下《风云人物采访记》的时候，没有料到18年后的今天，我要为这本书的作者写一本书。

18年中，中国的新闻事业不断有新的突破和发展。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随着社会环境逐步发展到全方位对外开放，媒体与受众一起，越来越融入世界；

随着体制环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特别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带动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新闻事业的初步繁荣；

随着媒体环境从渠道单一型到立体化，传播内容和手段更加丰富和多元。虽然这个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有些领域稍显不足，在有些方面又似乎过头。





在这个历史变革的进程中，法拉奇的影子像传递某种信息的信使，飘荡在我们的上空。她对中国新闻业界的冲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2006年9月14日，法拉奇在她的故乡意大利佛罗伦萨病逝，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后，引起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各家报刊都在报道这一消息的同时，回顾她不凡的一生，阐述她的采访方法之影响，以及她笔下的一个个风云人物——这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始动力。

而内在的成因是，我所在的新华出版社是当年国内唯一一家翻译出版《风云人物采访记》及续集的出版社。法拉奇逝世后，前来联系购书的电话和信函不可计数。向中国读者介绍法拉奇其人其事的想法油然而生——在平时的繁忙工作之际，这样的计划我连想都不敢想，但“十一”的7天长假在即，我可以把属于自己的这些天，包括近一段的闲暇时光都交给法拉奇。

写作的过程中，常有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又深感勉为其难。凭着对法拉奇的理解，靠着出身新闻专业的素养，以及在新华社从事十余年新闻采访和编辑工作的历练，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关于法拉奇的一本书，机遇和挑战共存。静夜中，我常常抿上一口茶，一次次地问自己：40多岁的你还有那种激情和冲动吗？你文字和材料的统揽驾驭能力能过关吗？我谢绝了许多事情，闭门伏案，同自己较劲。

良工不示人以璞。但这本书还是仍显粗疏地急切问世了。权作是展示法拉奇作品主要风格特征，完成了评介之大端的非良工之作吧。它是应时应势而生、点面结合的急就章，是作者关注法拉奇新闻踪迹的集成和思想之作，也是法拉奇2006年9月14日逝世后，国内推出的首部介绍法拉奇的著述，是《风云人物采访记》出版后18年来国内介绍法拉奇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读本。

把这一件事，一件受苦的事，当做一桩近乎神圣的事业，这多少有

些滑稽，时下许多聪明的人是不这样干的。但我仍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并为此深感欣慰。

本书所做的努力是：通过展示法拉奇的采访和写作场景，分析法拉奇的采访风格和思想特征，挖掘并发现她作为国际著名记者和作家的丰富内涵。从而把法拉奇同新闻采访和写作实践相结合，阐发法拉奇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把法拉奇更加深刻地介绍给广大读者。

作者的奢望是：本书不仅对不熟悉法拉奇的新闻专业学生、初作记者和编辑的人，以及新闻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有一定参考价值，就是对那些已经非常熟知法拉奇，并做过很长时间记者和编辑的人们，读了以后也不觉得是浪费时间。广大知识界读者，也乐意翻开看看。

本书的写作，虽然有18年的“追踪”为铺垫，但实际上只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几千字的写作速度，使我难以深思熟虑，不免失之浅显和粗糙。写作过程中，参阅了许多学者和同仁对法拉奇的研究资料，恕不一一列出，谨表谢意。如果读者在阅读本书以后，有些不满或批评，责任只在于作者，而不属于法拉奇和他们。

2006年11月18日

于北京



引言

拉开世界的“铁幕”

1. “铿锵玫瑰”的魅力

中国知识界都知道世界著名记者法拉奇的名字。2006年9月14日，法拉奇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逝世后，中国媒体以罕见的信息量，浓墨重彩法拉奇波澜壮阔的一生。

充满忧郁的灰褐色的眼睛，涂着夸张的黑色眼影。垂顺的直发从中间分开，身材纤细，活力四溢。操着因长期吸烟而变得“深沉”的嗓音，讲着柔和的意大利口音，这就是世界新闻史上的风云人物法拉奇。

1929年6月29日，法拉奇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18岁时，她被任命为《晚邮报》驻外记者。随后，担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曾亲历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等。她穿梭于人类敌





对行为的炮火硝烟中，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尽管危险的战地报道使她被弹片击伤多次，但她从未言退，乐此不疲。

22 岁时的法拉奇已经是个有着明星色彩的记者。

回国后，法拉奇主要从事政治人物采访，并在国际新闻界大放异彩。她的足迹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生动地记录了世界 20 世纪中后期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她采访过 30 多位世界政坛首脑和驰骋国际风云的巨擘，虽然身为矮小瘦弱的女性，但采访风格相当硬朗，甚至咄咄逼人。在她的采访名单中，有中国的邓小平、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约旦国王侯赛因、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巴基斯坦人民联盟领袖拉赫曼、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等重量级强权人物。

在以色列，她访问当时的总理梅厄夫人和国防部长沙龙，被对方视为“不好对付，极难对付”的记者；

在越南，她历经长达 8 年的战地记者的冒险生涯，采访了当时北越的领导人武元甲和南越的“总统”阮文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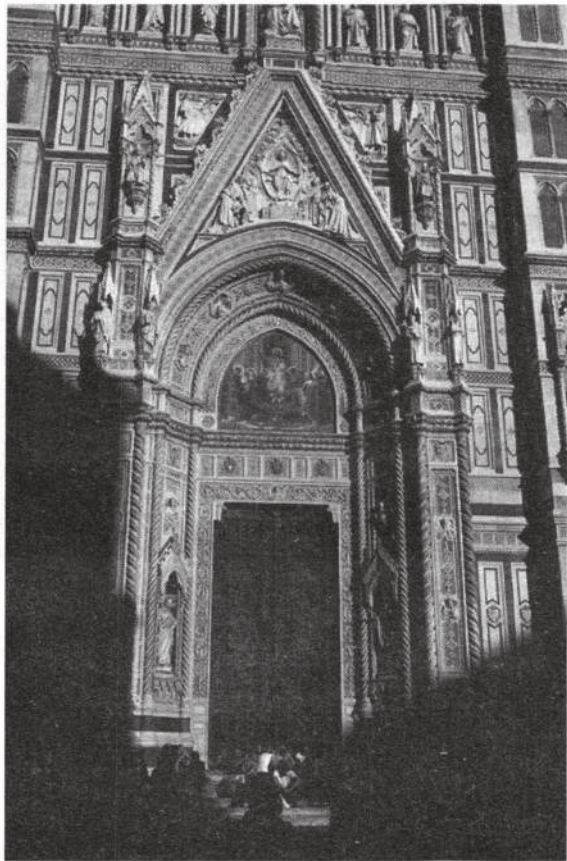
在伊朗，她不顾伊斯兰教的禁令，当着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面揭开蒙在头上的面罩；

在中东，她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唇枪舌剑，在激烈的争吵中，窥见对方的内心世界；

基辛格曾因与她访谈时不慎失言而深深懊悔，慨叹“一生中做得最蠢的事”是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

浓厚的新闻和文学功底，加上提问尖锐、言辞泼辣，使许多圆滑老练的政坛人物难以招架。她善于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发问方式，融自己的丰富情感于多彩的文字中。于是，在她的笔下，一个个置身于

台前幕后的政治家们露出了真实的面貌，或运筹帷幄，大智大勇；或狭隘暴躁，势利浮华。



法拉奇的故乡佛罗伦萨的标志性建筑：大教堂。

作为西方新闻界精英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法拉奇像永动的雷达，始终关注着世界矛盾的焦点，处于世界惊涛骇浪之中。她的许多篇报道都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她著述颇丰，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行销世界上许多国家，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1974 年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出版，书中的众多人物像连线一样，勾勒出了整个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从而确立了法拉奇名扬天下的“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权威地位。

法拉奇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深居简出且沉默寡言，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神秘居所。她安居纽约摩天大楼的阴影中，用鹰隼一样的眼神，冷静地观察着新旧世纪交替时的纷乱世象，安度她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她的家是一幢由褐砂石砌成的房屋，后带一个小小的花





园。这个生长着茂盛花果的园落，没有桎梏法拉奇深邃的思想。

“9·11”事件发生后，法拉奇告别多年的沉默，写出了8万字长文《愤怒与自豪》。9月29日意大利《晚邮报》首次刊登后，4小时之内报纸卖出100万份，打破了新闻史上有记载的报纸销售的最高纪录。美国媒体评论这篇文章的发表“已成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之一”。随后，意大利一家出版社把未删



世界浩繁的信息，充盈法拉奇深邃的思想。

节的《愤怒与自豪》编辑成书出版，7个月内在意大利也销售了100多万册。该书的法文版、英文版也迅即问世，并荣登许多国家的“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她在文中呼吁欧洲民众要保护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因之被媒体称为“欧洲的良心”。

法拉奇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之一，具有极高的国际声誉，被誉为“和政治家纵谈天下大事的能手”。她不仅是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一个以其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人，同时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象征，一个文化界的奇迹，一面思想中的谜语。西方一位著名思想家这样评价：“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始终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

法拉奇已成为珍贵的历史参照物和让人理解生活、校正人生的尺柄。她根植于现实，以“新闻”的犀利手法再现了人类精神和文化世界中的复杂光色，以其展示的顽强的生，向世人展示了何为真正意义上的死，从而成为人类精神天空中一颗闪亮的星斗。

在她的采访记中，我们与她共同经历重大的冒险事件，共同体验刻骨铭心的感情历程，共同分担哲学与政治范畴中的思考，能强烈地感受到法拉奇信仰的内在魅力，每个人都会被其作品透露出来的激情、真诚与正义的力量所震撼。

2. 本书的内在逻辑

人们对事物认知的程度，常常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如果从点和面、横向和纵向、主体和客体的结合上去把握，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本书的结构就依循了这些基本法则。

引言：首先粗线条地介绍了法拉奇其人，这对不熟悉法拉奇的读者是必要的，对于资深的读者也不会觉得没有意义。接着对本书结构做了简要的介绍，算作阅读本书的路径，也是作者抛出的一个“诱饵”。

第一章，是法拉奇与中国读者联系最紧密的内容，客观而翔实地介绍了她当年和邓小平两次对话的全过程。既有问答的记述，也有点睛的评点，不乏细微之处的描写。

第二章，介绍了法拉奇和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对话内容。把当时谈话的焦点内容融合在客观的介绍之中，着重解读法拉奇藐视权贵、精英的独立精神。她认为掌握世界命运的领导人群落中，大都是毫无光彩的平庸之辈。自卑者可以从这里读出自信，崇拜和迷信权威者可以发现自己是怎么“跪”而不起的。

第三章，记述了法拉奇对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采访过程。作





为民族主义战士，阿拉法特执着坚贞，意志非凡，爱恨交织。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爱国者和思想家是两码事。在世界文明的冲突和嬗变的背景中，我们从书中的领悟胜于言传。

第四章，介绍法拉奇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采访记。后者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国际友人，想起他就会勾起某段大国政治的历史。但这个章节并不仅仅是记叙那段历史，而是想拿出一个古玩，重新掂量掂量。从中可以看到法拉奇和亲王的政治史观。

第五章，写两个杰出女性的对话。法拉奇认为，印度的甘地夫人统治着近五亿人口，是我们的时代中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在缺少伟大人物的领袖群落中，出现甘地夫人这样的一匹骏马是耐人寻味的。甘地夫人不让须眉，不畏打拼，这多少表现了法拉奇的女权主义情结。

上述五章，相当于五个“点”，截取了法拉奇采访作品的五个剖面，是在法拉奇甲、乙方对话形式的问答录基础上，参阅其他相关资料，充实编写而成。这里既择取了法拉奇原文中的精髓内容，又增加了一定的叙述、描写和背景分析。在这五章中，示范性地表述了法拉奇新闻采访的基本风格，给读者提供了原始的对比性观照。由此推衍开来，是后面的八个章节组成的“面”，即提供认识和把握法拉奇的基本思路



这是法拉奇最为得意的照片。

和纲目。读者尽可以从对法拉奇的推崇中，退将下来，“冷却”阅读。

第六章，“明星的传奇制造”介绍了法拉奇成功的奥秘。她怎样靠真实、勇气和自由取胜，怎样在大人物面前驾驭风云舞台，怎样把提问变成攻击的利器。法拉奇的妹妹评价说：“我姐姐一生充满了传奇的神秘色彩。”本章意在破解神奇的谜底。

第七章，“为文学撕扯的记者心灵”描述法拉奇梦想当一名作家，现实中却选择了记者的职业。新闻的视点让法拉奇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事物，文学的底蕴拓展了她的表现空间，使她的作品展现出了许多记者“写不出”的东西。

在第八章中，剖析了神话背后的法拉奇，即她的傲慢与偏见。人总要有些许弱点。法拉奇的弱点恰是她优点的反衬和延伸。阶级立场和观点的矛盾，东西方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取向，使这个历史人物也表现出历史的局限，影响了她对一些事件的准确认知。

第九章，讲述法拉奇的爱情故事。她爱上了一个散步也揣着炸弹的男人，这说明什么都不能妨碍女人对爱情的追求。法拉奇43岁时采访希腊抵抗运动的一个英雄时，把自己变成了爱情故事的主角。危险与死亡能激起英雄的兴奋，这种英雄观和法拉奇多少有些心理感应。本章是“软”些的内容，却不乏刚性。

“9·11”事件电闪雷鸣，法拉奇拍案而起，《愤怒与自豪》横空出世。此文标志着法拉奇的复出，亦为她从左派向右转的分水岭。在第十章里，论述了她复出并右转的外在因素和个人原因。

第十一章，介绍法拉奇的作品中怎样充满了对社会良知和公正的呼唤，为什么在中国赢得了广泛的爱戴和尊崇，以及由此引发的同类示范意义。

法拉奇让一切伪新闻从业者为之汗颜。在昭示人们身体力行自己的





信仰，加强媒体业界自律的同时，拎出了我们是否还需要法拉奇的问号。

第十二章，写法拉奇的向死而生和身后哀荣。一个精彩的故事没有下文，留下了长久的思考和争议。

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实际上您已读完了全书。如果要更完整、更深刻地理解法拉奇，不仅要读这本书，更应该读她的新闻和文学纪实作品，以及她后期创作的散文和小说：

《风云人物采访记》让我们领会法拉奇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高超的访谈技巧；

《男子汉》使读者分享带有法拉奇鲜明风格的炽热爱情和对暴政的猛烈批判；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深刻阐述了何为挚爱，领略对生命存在的超凡思考。

《印第安拉》取材贝鲁特战场，主题是反战、热爱自由与生命，获海明威文学奖。

上述是我们了解法拉奇的重要依据，是理解并欣赏法拉奇作品的珍贵史料。在读了这几部经典著述后，我们就知晓了法拉奇其人其事，尽可见仁见智，评点一番。



第一章

对话东方国度的领路人

——法拉奇与邓小平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呼之欲出。

当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治路线的调整有诸多猜测之时，法拉奇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和邓小平身上。

法拉奇和邓小平进行了两次深入广泛的交流。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双方的“过招”充满急锋应对的率真和畅快。

邓小平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党和国家，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属于他自己，因而极富情感和人性化。法拉奇生动的采访内容，把邓小平推向世界潮头，犹如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发出的新时代宣言。





1. 满川风雨看潮头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蓄势待发。虽然当时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还是华国锋，但法拉奇拨云识雾，已敏锐地辨识到中国政坛的核心所在。她两次申请来中国采访邓小平，遗憾的是均遭到拒绝，成为她心中未竟的夙愿。

是时，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要来中国访问。法拉奇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禁为之一振：法拉奇的父亲跟佩尔蒂尼是老朋友，法拉奇与其私交也甚好，于是她登门求助佩尔蒂尼，请他向邓小平引荐自己，理由是为佩尔蒂尼访华“做舆论准备”。

佩尔蒂尼盛情难却，也因为法拉奇久负盛名，他径直把电话打到中国大使馆，并为法拉奇“担保”：她是个很严肃的时政记者，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感兴趣。他着重指出，中方如果能同意法拉奇“独家”采访邓小平，那必将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外交部的报告送到邓小平手里，很快得到批复。

邓小平并不很清楚法拉奇的情况，也不知道她要提出的具体问题。他只收到一个粗线条的采访提纲，主题是：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

法拉奇萌发采访的想法后，开始大量收集有关中国的历史资料，研究中国国情。她对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稔熟在心，对邓小平的历史背景，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了如指掌。当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邀请函时，法拉奇喜出望外，拿到签证后即刻启程。

1980年8月18日，法拉奇抵京，下榻在民族饭店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

8月的北京，正值炎热的盛夏。民族饭店那时尚未改建，二楼东边的房间内都没有空调，只配有一台立式电扇。法拉奇专门挑选了一个没有空调的东向房间，因为一般的外国人都不会住到这边来，有利于对自己的行踪保密。



两位风云人物的历史性聚会。

三天后的上午，人民大会堂。法拉奇和邓小平首次会面。

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法拉奇落座伊始，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然后亲切地问邓小平：“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贺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略感惊奇：“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邓小平幽默地笑了：“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那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

“邓先生，我父亲也76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几记耳光的。”

“他干得好！不过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采访就这样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

2. 毛主席像还要挂多久

法拉奇的提问，首先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

“过去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我来，只看到了3张毛泽东的画像……”

随着中国拨乱反正的深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后被纠正，极端的个人崇拜也灰飞烟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对一个领袖的评价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连在一起。

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就是198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将毛主席画像逐步减少，拆除一些毛主席像和语录牌。

法拉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她补充问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呢？”

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
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帷幕。

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法拉奇穷追不舍：“你们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邓小平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

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抓住这个话题纵深挖掘，把话题指向毛泽东本人：“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对此做了辩证的分析：“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





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

谈到这里，邓小平的面孔严峻起来，他对法拉奇强调性地说了两次：“请你把这句话一定要记下来！”

围绕减少毛主席像以及拆除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邓小平还告诉法拉奇，尽管修建毛主席纪念堂违反了毛主席自己的意愿，但当时做这件事，是从求得稳定来考虑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又提出了发展“小资本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答道：“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一个个对中国前途和命运十分重大的问题，在法拉奇和邓小平的轻松话语中清晰地勾画而出。邓小平平时会见外宾时，对时间掌握得很准，基本上谈到吃饭前就结束了，但这次却超过了预定时间，仍意犹未尽。

12时10分许，邓小平提议：“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

这正是法拉奇求之不得的事，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激动地连连点头：“好啊，好啊！”

3. 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两天后的8月23日上午，法拉奇再次采访邓小平，话题仍像上一次那么尖锐。

在谈话过程中，法拉奇的问题时常超出想象和预料，比如：“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的身体并不坏。当然还有其他的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到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呢？”

“你是否能肯定，今后事情的发展更为顺利？你们是否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因为我听说，所谓‘毛主义分子’，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仍然存在。”

在法拉奇印象中，斯大林一无是处，而赫鲁晓夫则相反。或许是为了拉近和邓小平的距离，法拉奇提出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骤紧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听到了，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但他爽朗地大笑起来，然后平静地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接着，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他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于是，法拉奇把话题转移到邓小平“两次遭贬”以及受到迫害的历史上来：“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主席），





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的批准下，您曾经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纠正说：“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我个人经历了三上三下。”他叙说其详：第一次是被王明的左倾路线整下去的；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帮”痛恨他；第三次是“四人帮”篡权时又把他打下去。邓小平自嘲性地解释说：“为什么我会三上三下？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

“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一个人经历三上三下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下了一次。当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仑比，也不好比。您经历三上三下而复生，有什么秘密呢？”

邓小平的回答透着直率和诙谐：“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法拉奇接着说：“但是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事。”

邓小平答：“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毛主席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从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有家长作风，听不得不同意见。他后来确实滋长了不健康的、封建主义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

天才总是化繁为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邓小平的回答举重若轻，删繁就简，很少用行话、套话等远离听众的复杂语言。在表达意见，传递信息的同时，也传递给对方“兴趣”。当法拉奇对邓小平当年在江西的生活表现出好奇，并提问：“您在江西都做些什么？”他回答说：“每天劳动两个小时。”



法拉奇已没有了往日的迷茫，目光透出清冽和坚毅。





法拉奇又问：“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而对于给自己的评价，邓小平则显得异常谦虚：“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的一生问心无愧。”

……

4个小时的谈话结束了，邓小平高兴地起身与法拉奇握手告别，法拉奇说出了一句极少对采访对象说的话：“您的讲话精彩极了！”

邓小平在回家的路上，也对工作人员说，“这个记者很有意思，提出来的都是些关键性的问题。”

在3天之内，邓小平先后接受了同一记者的两次采访，这是从来没有先例的。他们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将被收入到后来的《邓小平文选》中。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们的问答内容一直影响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它还被收入到各种类别的新闻教科书中，被中国新闻学子们奉之为经典。

4. 中国影响的几何倍数放大

回到民族饭店的法拉奇兴奋不已。她对服务人员说：“邓小平简直就像我的父亲，我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容忍。他还如此幽默，使我感到非常亲切！”

由于法拉奇要向西方报纸供稿，所以这次采访她没有使用母语意大利语，而是使用英语。为此，外交部派我国著名翻译家，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的施燕华（著名外交家吴建民的夫人）为她做翻译，并请施燕华去北京民族饭店协助整理录音和记录稿。因为双方有“君子协议”：稿件须经中方审阅，但中方保证全文发表。

整理记录的情景是这样的：在那间没有空调、又不透风的房间里，

大门紧闭，光线暗淡，零乱的床铺和桌面上，堆满了稿纸。法拉奇伏案疾书，挥汗如雨，还拼命地抽着烟，屋里充满了浓烈的烟草味道，如同电影里面“地下工作”的场景。

工作之余，法拉奇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多次表达她对邓小平的看法：“邓小平真是个伟人。他对一切问题了如指掌，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我喜欢他的风格。我真喜欢他！”在采访邓小平之前，她已同世界上10家大报订了供稿合同，准备连载她与邓小平的谈话记录：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意大利《晚邮报》、伦敦《泰晤士报》、南斯拉夫《政治报》及德国、加拿大的报纸等。世界舆论对她的这次采访寄予厚望。

法拉奇对施燕华说，旦有其他记者知道她来了，就都会登门，打听她要见谁，谈什么，使她不得安宁。所以，自住进饭店到离开，法拉奇没有单独上过街，没有对外打过电话。只是间或看一些从国外带来的有关邓小平的图书和资料。

两个昼夜，40多个小时，法拉奇废寝忘食，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时吃三明治，有时吃自己带来的饼干。两瓶矿泉水喝光了，竟想不到让服务员来送上几瓶。

法拉奇一边放录音，一边核对笔记，时常停下来置疑施燕华：“这是什么意思？”有时候还挑剔地说：“这个英文不好懂，换一个说法吧！”为了使译文既准确地表情达义，又能让外国人一看就懂，施燕华经常提出几种译法供她选择。法拉奇还提出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邓小平先生谈话时说‘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施燕华答道：“这个”只是中国人讲话中的口头语，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法拉奇硬要把“这个”也放到谈话记录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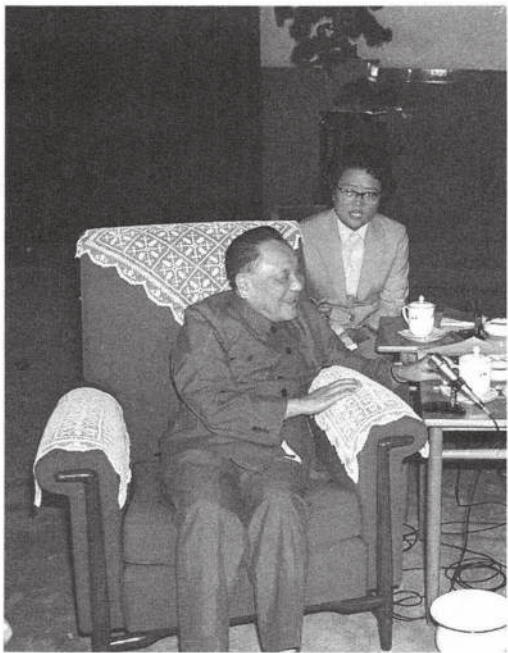


5227字的邓小平访谈录第一部分，首先发表在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上。按美国报业的规矩，由于人物访谈只呈现了单方的声音，不能算作“新闻”，而是“评论”的一种形式，只能发表在评论类专版上。

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4991字，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

《邓小平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的文章题目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全文转载，有的转载题目改成《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认识》。有报社评论称“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国际舆论都给予邓小平以极高的评价，中国架起了与世界沟通的新桥。

法拉奇在采访记的前言中说：“我问的所有的问题，包括最尖刻、最无礼的问题，邓都微笑着坦率地予以回答。”她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非常得意地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



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
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

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她又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

这次谈话在国内也产生了巨大反响。不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因这次采访，对法拉奇有了深刻印象。当他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佩尔蒂尼总统时，真挚地对他说：“你们意大利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一个很伟大的法拉奇！”法拉奇的采访使中国的影响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放大。

这篇“杰作”实际上是邓小平同法拉奇共同谋篇挥就的。没有邓小平的非凡智慧和宽广胸怀，法拉奇的独角戏成就不了这篇杰作。政治家应如何面对传媒，如何面对传媒代表公众提出的追问，邓小平做出了杰出的示范。

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无疑是职务行为，他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着国家，是坚定和严肃的。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极富感情和人性化，有些甚至是新闻记者所具有的。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引导和影响境内外主流媒体报道的成本最低和最有效的方式，让社会公众分享和理解政府的观点、立场和政策，从而得到广泛的支持，这绝不是一种为博得信任和好感的“技术秀”，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把说每句话、每件事同整个国家的形象、利益乃至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在交心论理的过程中，增加人格的力量，达到沟通的最高境界。这是个很有意义的现实问题。

1980年9月，法拉奇写信给邓小平，感谢他接受这次采访。在信的末尾，她写道：“这次采访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我





实现这一梦想，后来我发现担心是多余的。”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谈，它标示着一个记者所能达到的空前的事业高度，昭示着政治家应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100年以后的阅读，都不会显其陈旧和过时。



第二章

挑战白宫的新闻博弈

——法拉奇与基辛格

美国坊间有这种说法：基辛格是尼克松总统思维的“保姆”。因为他作为美国的第二号人物，主持了对华、对俄以及越南战争停火和谈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务。

在法拉奇的诱惑下，基辛格口无遮拦：“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舆论为之哗然，尼克松气歪了鼻子。

美国和越南的战争尚未结束，白宫里就上演了一场政治家和记者的精彩论战。基辛格的名声和法拉奇的采访内容连在一起。数年之后，基辛格回忆起来仍痛心疾首，称这次采访是“一生中媒体打交道的灾难性的一次”。

读者尽可以从中解读法拉奇藐视权贵、精英的独立精神。





1. 两个人的“越南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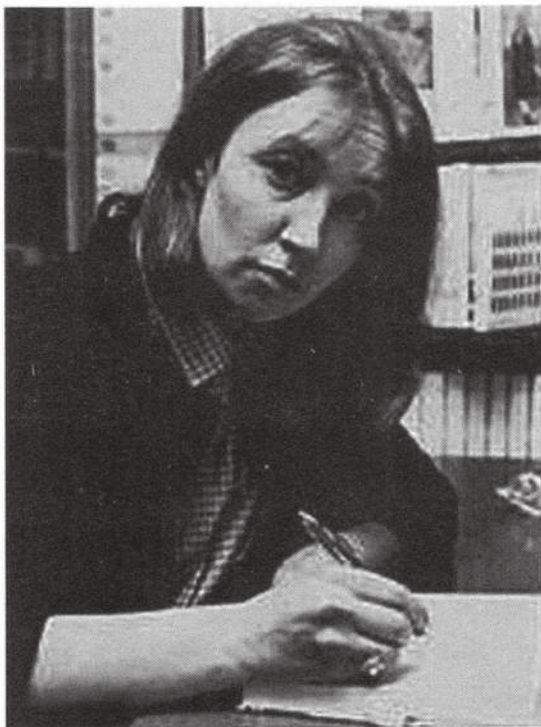
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区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白宫，占地73000平方米，是历届美国总统的官邸和办公地。

踏着冬天的积雪，裹着厚厚的冬装，法拉奇匆匆走在奔向白宫的路上。迎面而来的寒风，和她火热的内心世界形成巨大的反差。

时值20世纪中后期，基辛格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此行，法拉奇就是去造访盛名下的基辛格，探求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美国越战政策，以及基辛格成功和成名的神秘的“谜”。

基辛格，这位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有14个亲属死于德国纳粹的集中营。1938年全家逃到伦敦，后又迁居纽约。一个英文单词都不懂的他，曾以优异成绩考入哈佛大学，并留校任教。21岁时服兵役，并挺身政界，成为连续三届美国总统的顾问。

法拉奇向他发出请求采访的信函后，从不单独会见记者，只在官方



法拉奇的采访充满个性风格。

记者招待会上做表态发言的基辛格立即就同意了。因为他阅读了法拉奇在越南采访北越领导人武元甲的访问记，他也想借法拉奇之笔，阐述美国政策，兜售他自己。

是时，美国侵入越南的战争已届10年。由于旷日持久，美国国内反战浪潮日趋高涨，迫使美国政府逐步放弃对南越政权的支持，和北越共产党人进行停火谈判。

1972年11月2日上午，白宫。

“早安，法拉奇小姐！”基辛格和法拉奇一起走进那间陈设华丽的书房。那里堆放着许多书籍和多部电话，墙上有抽象派的画和尼克松总统的照片。

基辛格进屋后竟忘了法拉奇的存在，伏案阅读起一份文件。他这样做既愚蠢又不礼貌。但是，这种局面倒使法拉奇有空研究对方：粗壮的矮个子，顶着一个甌羊般的大脑袋。

读完文件，基辛格转身坐在旁边一张比沙发高的安乐椅上，居高临下，发问对方。他不知道下面的问答，将会带给他什么样的难堪。

“就像我对您说过的那样，我从来不接受单独采访。这次我考虑接受采访的原因，是我读了您关于武元甲的访问记。你说武元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提问的口气使人感到他似乎没有多少时间。法拉奇不得不简要地回答：“我觉得他既和蔼，又傲慢，归根到底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我对他毫不感兴趣，但是他对我讲的话可是千真万确的。”

基辛格眼珠里闪着智慧也含着敌意：“为什么呢？”

“因为武元甲1969年所作的预言在1972年成为了现实。”

“有什么例子吗？”

法拉奇通过例证把采访展开：武元甲说美国人将逐步从越南撤出去，最终放弃这场使他们花钱越来越多并把他们引向通货膨胀的战争。





基辛格表示同意地叹了口气，做了个鬼脸。他是个能出色控制自己表情的人，很少让嘴唇和眼睛流露出他的真实情感。但在这次会晤中，他没有约束自己。每当法拉奇表示反对南越“总统”阮文绍时，他都点头表示赞同或会心地微笑。



基辛格打开中国之门之后，曾经四十多次来华访问。

需要凭借权势来壮胆，这是怯懦者的经常性表现。法拉奇发现了基辛格的弱点，用话题引诱，由浅入深。她先从美国和北越和平谈判的日期谈起，问基辛格为什么受到越南两方的严厉谴责，甚至是带有侮辱性的谴责，是否准备单独与河内签约实现和平。

基辛格说，请别问我。我只能告诉您我们决心实现和平。阮文绍不同意，这是他的事情。

法拉奇接着问：“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

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选择谁？”

这是个有失恭敬的问题，意在探寻美国政府在北越和南越的选择上有什么新的考虑。

基辛格没有答复。无言以答的本身就是个最好的答复。法拉奇继续发问：“如果我替您回答，我想您会更乐意与黎德寿共进晚餐吧！”

这是美国外交圈“教父”和“大腕”面对记者的困窘，还是有意回避一种充满利害的取舍？法拉奇再次追问基辛格是否喜欢黎德寿这个人。

基辛格不得不答道：“他是一位对事业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他很严肃，很果敢，总是彬彬有礼，很有教养。他有时也非常强硬，甚至很难对付。这正是我尊敬他的地方。当然我们的关系完全是工作上的。他身上存在某种程度的和蔼，有时我们还互相开玩笑。也许有一天我会去河内大学教国际关系，他会来哈佛大学讲授马列主义。”

在谈判的唇枪舌剑中，常有插科打诨的语言，因为外交就是外交，充斥着技巧和方式，许多时候是不会有多少实在内容的。但是，一个西方的领袖人物，表达了对东方对手的敬佩，这不能不说是个新闻。

法拉奇说：“今天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张可怕的照片，是一张死去的十分年轻的越共的照片。还有一条惊人的消息，一架直升飞机被越共的子弹打中击落，机上22名美国人全部身亡了。”

“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请您不要叫我再谈越南了。”

当时在美国民众中，有很多人认为如果基辛格和尼克松接受和平协议，是对河内共产主义的投降，指责他们放弃了对南越的支持。在法拉奇就此提问时，基辛格答道：“这样议论尼克松总统是荒唐的。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投降，是要给南越在目前条件下生存下去的机会，当前，需要的是政治上的条件而不是军事上的条件。就像我们一贯所说的那





样，现在轮到南越人在未来的政治竞赛中取胜了。让我们谈论除了越南以外的其他事情吧。”

“基辛格博士，您不是和平主义者吗？”

“不，我想我不是。尽管我尊重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我与任何一个和平主义者都完全不同。我只同意与彻底反对暴力的和平主义者进行交谈。战争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条件决定的。比如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是必要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战争本身是必要的，也不意味着国家必须通过战争来保持自己的威严。”

法拉奇感到基辛格的答问就像鳗鱼一样，常游离开话题而两面摇摆。但正是在这种摇摆中，美国政府对越战争的新变化已现端倪。她继续问：“那么关于越南战争您有什么要对我说的？我觉得您从来没有反对过越南战争啊。”

“我怎么可能反对呢？即使在过去我不处在今天的地位时……也没有反对过越南战争。”

“我们的作用是逐步减轻美国卷入这场战争的程度，以至最后使战争结束。归根结底，历史将判断谁做了更多的努力：是那些只批评别人，自己却不做任何事的人呢，还是像我们这些努力去缩小战争，最后结束战争的人？当一个国家卷入一场战争时，只是嘴里说应该结束战争是不够的。这与主张参与这场战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法拉奇向纵深开掘：“您没有看到这是一场无用的战争吗？”但基辛格开始支吾起来。当然，他当时不想谈、不能谈的许多问题，后来都在他的《复兴的世界》、《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动乱年代》等著述中，昭示无疑了。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基辛格没有改变过那种含有讽刺或表示严厉的目光，始终保持着单调、不变的声调。法拉奇后来说，录音机上的

音量指针本来是随着讲话人的声音大小而摆动，但是在基辛格讲话时，指针却始终一动不动，语调如同雨点打在屋顶上的那种恒久的滴答声。

2. 尼克松思维的“保姆”

法拉奇的脑海中显映出这样一幕幕的生动画面：

基辛格说服尼克松与河内签约；

基辛格促成尼克松与北京谈判；

基辛格带着尼克松走访莫斯科。

于是，美国坊间有了这种说法：基辛格是尼克松思维的“保姆”。



2004年7月14日，基辛格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办公室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展示他与邓小平同志的合影。





基辛格对政治有着浓厚的热情，曾是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重要顾问，继而成为尼克松的“大管家”。人们把他看作当时美国的代表不是偶然的。有人讽刺说，“如果基辛格死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尼克松会成为美国的总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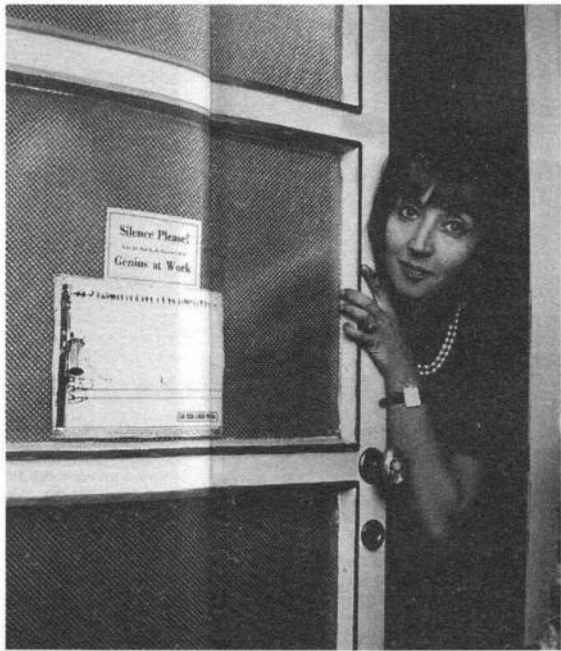
人们给他们两人杜撰了一个刻薄但却形象的名字：尼克辛格。总统离不开他，做每次旅行，参加每项仪式，出席每次宴会，度每个假期，都有基辛格的影子。

法拉奇当然注意到这些。她曾在文章中写道，基辛格清晨就进入白宫，直到深夜才离去。甚至把换下来的脏衣服也装在纸袋里从容地带进白宫，送到总统的私人洗衣房里。基辛格的家仿佛就是白宫。

面对法拉奇的发问，基辛格解释说：“请相信，我干这项工作不是出于追求总统的权势。如果回顾一下我的政治经历，您会发现我在三次竞选中都是反对尼克松的。”基辛格在采访中，力图回避他和尼克松的亲密关系。

“这一点我知道。有一次您甚至宣称尼克松‘不适合当总统’。但您后来是否为此而在尼克松面前感到困窘呢？”

基辛格说：“我不记得说过反对尼克松的确切的话了，不过我说过



法拉奇倚门留影，对门外的大千世界心往系之。

类似的话。至于说我在他面前感到困窘……我那时并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态度，只是一般知识分子对官场的习惯。尼克松总统的表现很有魄力和能力。他对我的聘请证明了这一点。在他授予我这个职务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近过他，而且他知道我对他并不友好。他聘请我，表现了很大的勇气。某些说法是浪漫的，不公正的。”

法拉奇追问：“有人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您关心的只是您自己所干的，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

“我不敢肯定自己能否与其他总统一起干我同尼克松总统一起干过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与总统的关系是特殊的。换句话说，我认识的领导人很多，但是有勇气在不向任何人透露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助手派到北京去的领导人却不多。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领导人，敢于把同北越人谈判的任务交给他的助手，而且只向极少的几个人通报。我所以有可能做某些事，是因为总统为我提供了某些可能性。”

从早晨十点钟双方开始谈起，几乎每隔十几分钟就有电话铃声，都是尼克松打来要东西或询问事情的电话。基辛格恭敬地回答着对方的问话，可见两个人的关系之密切。

“可是您也曾经是其他总统的顾问，而且是尼克松的对手的顾问，我说的是肯尼迪，约翰逊……”

“我对所有总统的态度是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要听取我的意见。他们向我提出问题，我就回答他们。我与肯尼迪和约翰逊相处的情况，是不能同我和尼克松相处的情况相比的。”

在基辛格功成名就后，他的去向如何？法拉奇据此发问：您已经成功了。与中国交往这一炮打响了，苏联这一炮也打响了，越南和平这一炮也几乎打响。基辛格博士，我向您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曾经向去登月球的宇航员提出过：“登过月球后你还准备做什么？”他们不知所





措，回答我说：“以后看吧！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跟他们一样，也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但是，与宇航员不同的是，我没有不知所措，在我的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可做。担任我这种职务的人，一旦不干了，不可能马上转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我肯定会找到很值得去做的事。”

名人对权力都是贪恋有加，权力欲显示出他们的价值取向。权力对基辛格有多大的引力呢？

基辛格仍然用那种没有平仄的声音答复：“当你掌了权，而且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你就会把它看作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可以肯定，当我离开这个职位时，我会感到若有所失。但是，权力本身，作为一种工具，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每天早晨当我醒来时，我不会对自己说，我有一架专用飞机多好啊！家门口有一辆配备着司机的汽车等着我多好啊！我对这种想法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有了权以后可以做更多的事，可以建立很多辉煌的业绩。”

白宫的许多房间对外开放，包括白宫东翼，主楼底层的外宾接待室、瓷器室、图书室以及一楼的东大厅、国宴厅、红厅、蓝厅和绿厅等。它是世界上唯一向公众开放的元首官邸。法拉奇并非是游客，此时她仍在基辛格的精神世界中窥探和寻觅。

3. 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

作为公众人物的领袖，一般是不应有自己特殊情趣的。把个人的感情与公职行为相提并论是为官之大忌。许多在公务行为上修行比较完美的政治家们，最后遗憾地在这些问题上，授人以话柄。

法拉奇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辛辣地揭示了对方的这个弱点。

采访之前，基辛格几乎没有向媒体表露过心迹，也没有袒露过个人生活和性格。采访中，法拉奇让基辛格解释他如何取得外交界的明星地位，基辛格回避躲闪，语焉不详，后来，终于被法拉奇巧妙地引出了这番话：“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狂野的西部故事中的一个牛仔，骑着马，独自指挥着一支大篷车队。”



基辛格从来不接受单独采访，只对法拉奇例外。

基辛格安然端坐，两臂握着扶手，跷着二郎腿，以致上衣紧绷绷的，随时有崩掉纽扣的危险。法拉奇问，怎样解释您成了风云人物，甚至几乎比总统更出名这一事实呢？对此，您有什么理论吗？

“有的，但是我不告诉您。因为我与一般人的理论不一致。就拿关于聪明的理论来说吧，对于掌权来说，聪明并不那么重要，甚至往往是无用的。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是如此，干我这一行的人也同样不需要太





聪明。我可以肯定，您对我在世界闻名这一点也会有您的理解。”

“基辛格博士，我不敢肯定。我想通过这次采访找到根据。我想归根到底是成功使您出了名。我的意思是说您像一个棋手走了几步好棋，首先是打开中国之门这步棋走得好，人们总是喜欢能吃掉国王的棋手啊。”

“是的，中国是我取得成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但是关键还不在于此。关键在于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点，喜欢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喜欢只身进入城市和乡村的骑马牧者，仅此而已。即使不带手枪也没关系，只要他在行动，在正确的时候去正确的地方，像西部电影里的人们一样。”

“我明白了。您就像不带枪的亨利·方达，为理想伸出拳头。他是孤独的，勇敢的……”

基辛格打断了对方的话：“不一定需要勇敢。事实上，对骑马牧者来说勇敢是次要的。他只需要向人们表明他单枪匹马地进了城，单独地行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和令人吃惊的人物就适合于我，因为单枪匹马是我的风格，也可以说是我的技巧。还有独立性，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最后还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我对自己做的事一向坚信无疑。我不要求享有盛名，也不追求名望。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是我为群众的反应所干扰，那我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真正的好演员不是单靠演技，他们演戏时既用技巧又靠信念。”

法拉奇把这些都收入到采访录中，使一个复杂、自大乃至狂妄的内心世界昭示于世人。她评述说：“你也能发现他个性的另一些方面。比如他是一个无须争辩的犹太人，又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德国人。作为一个犹太人和德国人，又移居在一个对犹太人和德国人另眼相看的国家里，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难题、矛盾和不满，也许还有隐藏着的人情味。你

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基辛格身上具有电影《蓝色的天使》中那个爱慕马琳·迪特里希的人物的成分。他是一个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做到的英雄。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位腼腆的、善于撰写平淡无味的历史书和关于控制原子能文章的哈佛大学教授，竟然能够成为与总统一同统治国家的大人物，调整大国关系和制止战争，这是我们想去解开的谜，冒险活动蒙上了平凡的色彩，就是个谜。”

4. 一肩担政治，一肩担女人

每当美国总统夫妇举行晚会时，总要精心挑选一些影视明星出席作陪，以使晚会更加生动有趣。而在这样的社交活动中，基辛格总会表现极佳，引来许多当红明星的热辣目光。

他是个很有女性情缘的人，经常在白宫吃饭，但不在那里睡觉，因为不能把女人带进去。虽然已经离婚九年，但他的风流韵事被精心编成了各种版本，无论是演员、模特，还是制片人、记者、舞女，基辛格都爱不释手，绯闻不断。

然而也有人认为基辛格对谁都并不喜欢，他所以这样行事只是为了耍“花枪”，以此增加他的社交魅力，使他更有名望，报刊上会更多地刊登他的照片。就这个意义来说，基辛格是在美国被人们议论得最多、最出风头的人物。他戴的那种近视眼镜，他的那种犹太人的小卷发，他身上那种灰色西服和蓝色领带，以及那种讨人喜欢的假天真的神态，一时都成为时髦的标志，许多人争相模仿。

法拉奇问基辛格，您是一位冷静的、能充分控制自己感情的数学家，您的思维从不受别人干扰，外表是一个冷冰冰的人。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您一面担当重任，一面风流有加，您怎么能使自己受到严肃的毛泽东、周恩来、黎德寿等人的认真对待，而同时却又被别人看作是





轻率地勾引女人的花花公子？您不为此感到窘迫吗？”

基辛格断然否定了这一点：“我同黎德寿谈判时，为什么要感到窘迫？在同黎德寿谈话时，我知道应该跟他讲些什么。在同姑娘们在一起时，我知道该怎样对待她们。而且黎德寿同意与我谈判并不因为我是品德纯正的典范。他与我谈判是因为有求于我，正如我也有求于他一样。无论是对黎德寿来说，还是对周恩来和毛泽东来说，无论过去和现在，我觉得花花公子的名声对我都有用，因为它可以使人放心，可以向人们表明我不是老古董。总而言之，风流的名声使我感到有趣。”

法拉奇说：“我认为您不应得到这个名声，因为这只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际。”

“确实有一些事情被夸大了，但我承认有一些是事实。重要的不在于到底有几分实情，不在于我在女人身上花了多少精力，而是女人在我的生活中起多大作用，是否是我生活中最关心的事。然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对我来说女人只是一种娱乐和消遣。谁也不会对业余消遣花费过



基辛格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居高临下，发问对方。

多的时间。只要看看我的日程表就可以知道，我在她们身上花的时间是有限的。我还可以告诉您，我更愿意去见我的两个孩子，我们通常在一起过圣诞节。我每个月去波士顿看他们一次。”

“您反对结婚吗？”

基辛格不紧不慢地说：“结婚还是不结婚，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也可能我会再结婚。但是，您要知道，像我这样严肃的人要与另外一个人共同生活是很困难的。一个女人和我这种类型的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非常复杂，对我来说要解释这些事很困难，我不是一个能对记者吐露真情的人。”

法拉奇从来没有采访过像基辛格这样避而不答或对问题不作确切解说的人，因为他从来不让别人深入了解自己。正如基辛格所说：“我是个相当腼腆的人。另一方面，我觉得我还是相当沉得住气的。有人把我描写成一个苦恼和神秘的人物，也有人把我描写成乐天派，整天嘻嘻哈哈。这两种形象都不准确。哪一个也不是我……我不告诉别人我是什么样的人，对谁我也不会说的。”

看来，只有和美女在一起的时候，被复杂的国际事务搅得筋疲力尽的基辛格才能感到轻松和愉悦。

因为过去有一位法国女记者在撰写《亲爱的亨利》一书时，曾追求基辛格并使他狼狈不堪。他担心法拉奇可能使自己再次处于尴尬的境地。他的设防无疑使法拉奇很恼火，她心里愤怒地说：“天知道我会爱上你！”

这次内容庞杂的采访是这样结束的。尼克松打来电话，问基辛格能不能到他那里去一会儿？“当然可以，总统先生。”他站起身，告诉法拉奇等他一会，说完就走了。

两小时后，法拉奇还在那里苦等基辛格回来。他的助手走进来，不





好意思地解释说，总统要去加利福尼亚州，基辛格博士陪同他一起走了。星期三晚上以前不可能回华盛顿。他表示最近不可能再接受采访。

法拉奇知道，这次采访恐怕要画上句号了。

法拉奇走出白宫，穿过白宫南面绿树掩映的大草坪时，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美景，同基辛格的形象连在一起。

5. 历史不记载没有发生的事

《新共和》周刊全文刊登了法拉奇对基辛格的长篇采访记。华盛顿、纽约和几乎美国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基辛格访问记所引起的轰动和它所产生的后果，使法拉奇十分惊讶，又在预料之中。

法拉奇认为，自己低估了基辛格这个重量级人物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可能产生的反响。她不知道，他们会晤的一个多小时内，讲得都是骇世的新闻，许多事情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持久话题。据白宫人士说，至少有五六位白宫里掌权的大人物，看到报道后火冒三丈，都说没见过基辛格这样狂妄吹牛的人！

尼克松总统看到报道后对基辛格大为恼火，为此拒绝见他。基辛格给尼克松几次打电话，请求会面，还登门到总统在圣克利门蒂的家中拜访，都无济于事，总统家门紧闭，对基辛格亮出红牌。因为作为总统，他感到基辛格给了他一记耳光。他不能原谅基辛格所说的话：“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

新闻界对基辛格一贯是宽宏大量的，这一回却相反，各家大报记者都谴责基辛格发表这样的言论未免太傲慢，也失之轻率。人们纷纷奚落和评点他：

作为总统的使者，基辛格怎么可以把一切功劳都归为己有？

怎么可以把尼克松置于旁观者的地位？这不是越俎代庖吗？

当一位微不足道的教授以西部电影中亨利·方达的风度进入白宫处理事务时，美国总统虚位了！

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就可以进入总统的房间叫醒总统；他能建议并主导发动战争或结束战争；他自认为能改变甚至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在这个五十岁、戴着黑边眼镜的人面前，所有的人们都黯然失色。这不能不使全美为之惊愕！人们说，基辛格又被漂亮女人弄得不知所云了。

最不留情的报纸还用漫画进行调侃：基辛格穿着牛仔服，骑着马去沙龙。另一些报纸刊登了脚登马靴、头戴大沿帽的亨利·方达的照片，下面写道：“孤独的骑马牧者”。

恼火中的基辛格约请一位专栏作家前来采访进行澄清，但这正像画中国画一样，越描越黑，弄巧成拙。基辛格愤怒地对外界说，接见法拉奇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抨击对方歪曲了他的回答，曲解了他的思想，拿他无辜的话做另类文章。他的做法惹得法拉奇起身反击，并给基辛格发了一份电报，责问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基辛格先生，别忘了讲话已经被录在磁带上，磁带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也可以帮助您恢复正确的记忆！”

两个人的吵架持续了两个多月，双方都很不愉快。

尼克松最终与基辛格言归于好。1975年，经过复杂的谈判过程，历时14年的越南战争实现停火，美国战俘被交换回家。有人说，这是美国在“一个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后来，基辛格取代罗杰斯担任了国务卿，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越南的黎德寿拒领这个和平奖时，这笔钱悉数归为基辛格。法拉奇闻讯后不无遗憾地说：“可怜的诺贝尔，不幸中的和平！”

基辛格说过，要发生的事情总是要发生。人们对发生了的事情总是





这样说，而对没有发生的事情从来不会这样说，因为历史不记载没有发生过的事。

基辛格的名声和法拉奇的采访内容连在一起。数年之后，基辛格回忆起来仍痛心疾首，称这次采访是“一生中媒体打交道的灾难性的一次”。奇怪的是，法拉奇本人也觉得这次采访是她最糟糕的经历。

这大概因为采访者与采访对象棋逢对手吧。

……

基辛格卸去国务卿的职务后，先在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员等要职。后开办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被授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1987年3月任美国—中国友好协会两主席之一。2002年11月被布什总统任命为调查“9·11”事件的独立委员会主席。

2005年春天，已届82岁高龄的基辛格做完心脏手术两个多月后，再次应邀来访中国。自从20世纪首次来华后，他都记不清楚来华次数了。他说，大概已经有40多次吧。



第三章

神秘莫测的抵抗首领

——法拉奇与阿拉法特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是20世纪最为世人瞩目的政治事件。巴以战争冲突不断升级。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组织多次重创以军，他的名字也为世人关注。

出身于开罗贵族之家的阿拉法特，经历曲折，性格倔强，爱恨交织。他给法拉奇的最深印象是裹着花巾，一绺胡须，很难觉察到一个抵抗领袖常有的威严。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首领，实际上是最神秘莫测的人。法拉奇后来写道：“阿拉法特不是共产党人，他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他只是一个军人，一个爱国者，而不是思想家。”在世界文明的冲突和嬗变中，我们的领悟胜于言传。





1. 是一只猛禽，还是一头羚羊

这是1972年3月的一天。是时，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和以色列的武装斗争处在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关键时期。全世界舆论对之或热烈支持，或冷漠不解。由于当时巴解组织尚处于保密阶段，将总部设在了约旦，所以，法拉奇在经过几个月的联络和准备之后，终于来到这里，和该组织的领袖阿拉法特开始了这次面对面的采访。

在这个戒备森严的总部里，曾策划了一次次对以色列军队的打击。由于白天这里挤满了巴勒斯坦游击战士，阿拉法特处在繁忙之中，法拉奇把约会时间商定在寂静的晚上10点。



头顶花格头巾，留着浓密的胡子，这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的显著标志。为了土地与和平，巴以流血冲突达半个多世纪，阿拉法特为此奋斗了一生。

法拉奇记述当时的情景：“当你还不知道他的身份时，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人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他身边跟着一名卫兵。那名卫兵是你从未见过的美男子，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潇洒的风度。卫兵是那种穿着保护服的人，但他的保护服却像燕尾服一样高雅。他双颊凹陷，金发碧眼，自然使人想到这个美男子是善于博得女人欢心的西方人。阿拉法特无比自豪地把这个人带在身边。除此，阿拉法特身边还有一个穿便衣的家伙。”

陪同阿拉法特的还有一名翻译，负责记录谈话和核对法拉奇的记录。这两个人跟着一起走进了为采访选定的房间。室内有几把椅子和一张写字台。阿拉法特把随身携带的微型冲锋枪放在写字台上，坐在那里微笑，显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他的灰绿色风衣上闪烁着一枚徽章，上面有两名越南水手的图像和“反对美国法西斯主义的黑豹党”的字样。这是两名自称为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加利福尼亚青年送给他的。

当阿拉法特准时来到时，法拉奇犹豫了片刻，因为第一眼看上去，从他身上丝毫觉察不到一个领导人常有的、给你带来芳香或给你一记耳光那样的亲和及威严。但是这张脸，是一个标志：中东最著名的游击战士阿拉法特。

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胡子，每个阿拉伯男人都有的那络浓密的胡须，还有肩上的枪。枪托上还贴上了一个有趣而雅致的绿色标志。他的脑袋上戴着花格头巾，身材矮小，大约只有一米六零。法拉奇说，他的手脚也很小，令人感到靠那双脚来承载粗壮的腿和宽大的臀部、多余的脂肪，似乎有点不太相称。

法拉奇描述道：“你能在黑暗中，在数千人中准确无误地认出这张古怪的面孔，当然也是一位明星的面孔。它会使人想起一只猛禽，或一头狂怒的羚羊。实际上，他几乎没有颧骨，也没有下巴，只有一张红色





厚嘴唇的大口，一个咄咄逼人的鼻子和两滴墨水似的亮而凸出的大眼睛。要不是隔着镜片，这双眼睛会使你入迷。”

阿拉法特就是用这样的目光，彬彬有礼而又漫不经心地瞧着法拉奇。他以客气而近乎亲切的语调用英文低声说道：“晚上好！”他的声音有点像一种哨声。

2. 抵抗运动的设计者

阿拉法特生于耶路撒冷，出身于贵族家庭，在家境优裕的情况下度过了青年时代。1947年，他参加了反对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的斗争，同时进入开罗大学学习工程学。在那几年中，他还成立了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法塔赫的核心，就是在这个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大学毕业后，阿拉法特赴科威特工作，在那里创办了宣传民族主义斗争的报纸，加入了称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小组。1955年，他重返埃及，到军官学习班学习，专攻爆破学。1965年，他参加创建法塔赫，并取了阿布·阿玛尔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缔造者”，或“缔造之父”。后来，他被选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当法拉奇问到他的经历，阿拉法特两手一摊说：“谁知道！总要有人去任职吧，这个人或那个人去当都一样。”

一个人即使隐瞒了自己的历史，别人也会感觉到他的过去。因为他的经历会在他的脸上和眼睛里留下烙印。但是，从阿拉法特的脸上，人们却只能看到大自然母亲赋予他的一个特殊的面具，很难找到他过去留下的痕迹。

阿拉法特说：“关于我，唯一应该说的是：我是个普通的巴勒斯坦战士。1947年我和我的全家就成为巴勒斯坦战士。正是在那一年，我觉醒了，明白了在我国发生了何等野蛮的侵略，类似这样的侵略在世界

史上也是从未见过的。”

“那时您有多大年纪？我向您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关于您的年龄众说不一。”

“我已经说过，别提任何关于个人的问题。”

法拉奇进行劝解：如果您连年龄都不愿说，那么您为什么始终把自己置于世人瞩目的地位，为什么允许世界把您看成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首领呢？

阿拉法特大声说：“我并不是抵抗运动的首领！我不想成为抵抗运动的首领，我可以发誓。我仅仅是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说得确切些，我是一名受权作为发言人的成员，也就是说，是受权转达其他人集体决定的一名成员。把我看作首领是莫大的误会，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没有首领。事实上，我们现在力图实行集体领导，这会遇到困难，但我们仍坚持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不把责任和威信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必要的，这是一种现代的思想。如果我死去的话，那么您的好奇心将会得到满足，您将了解到我的一切。”

法拉奇说：“我并不认为您的同志们会让您去死——这是极为高昂的代价。从对您采取的安全措施来判断，他们认为您活着远比死去更有用。”

“不，恰恰相反，我死去远比我活着有用。是这么一回事：我的死将作为一种动力，大大地推进我们的事业。我还要附带说一句，我死去的可能性很大，也许就在今晚或者明天。如果我死去的话，这将不是一场悲剧，另一个人将代表法塔赫在世界上战斗！我做好了死的准备，并不在意自己的安全。”

在法拉奇的笔下，阿拉法特是这样的人：“他天生不讨人喜欢，是个易于发怒的人。要对他产生好感是困难的，首先是因为他用沉默来拒





绝那些想从感情上亲近他的人。他的热情是表面的，他的殷勤是形式上的，任何一件小事都足以使他变得充满敌意、冷淡和傲慢。只有当他发怒时，他才兴奋起来。到那时，他的声音就由小变大，双眼成了仇恨的源泉，似乎想把他的敌人一口吞掉。其次，是因为他的回答缺乏根据和诱惑力。”

“我认为在采访中，重要的不是提问，而是回答。对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即使你向他提出

世界上最平常的问题，他也能做出非常出色而深刻的回答。反之，如果是个普通人，即使你向他提出世界上最尖锐的问题，他的回答也很平淡乏味。”法拉奇对阿拉法特似有偏见，她说：“向一个理智和感情互相干扰的人提问，你有可能一无所获。”

3. 无数支蜡烛照亮阿拉伯民族

阿拉法特除了使用强硬的语言以外，常常用暗示或影射的话，或不包含实质性内容的话来作答。他不善考虑别人的观点，即便在抽象



岁月没有消蚀法拉奇的思考。

地讨论问题时也是如此，有时还充满外交辞令。由此法拉奇感叹，一个相信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受到基督教熏陶的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是何等的困难。

法拉奇问，巴勒斯坦意味着什么呢？巴勒斯坦的国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它的地理位置也已经不复存在。在英国人和以色列人施政以前，在这里的是土耳其人，巴勒斯坦的地理边境究竟在哪里呢？

阿拉法特回避了古老的边界问题：在我们的宪法中没有谈到边界的问题，是因为提出边界的是继土耳其人之后侵略我们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从阿拉伯观点来说，不能说边界问题。巴勒斯坦是浩瀚的阿拉伯海洋中的一点。我们的民族是阿拉伯民族。这个民族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红海，以至到更远的地方。自1947年灾难发生起，我们所要的就是解放我们的土地和重建巴勒斯坦民主国家。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各个组织之间的团结是外界关注的事。法拉奇问道，你们内部之间，比如法塔赫和人民阵线之间是否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呢？这些分歧是否会影响对以色列的斗争的整体性？

阿拉法特用国际上一些反抗者阵营内部的构成来说明：我们之间包括持有各种意识形态的战士，我们的区别只是一些斗争方法的不同。每一个革命都有它自身的问题。在阿尔及利亚革命中也不止存在着一个组织。我知道，欧洲在抵抗纳粹主义者时也有多个组织。在同一个越南，存在多种抵抗运动，越共就像我们的法塔赫一样，不过是个多数派而已。我们的法塔赫集结着90%以上的抵抗战士，在被占领的土地上进行着艰苦的战争。当然，我们的战士正在团结起来，因为我们的目标没有不同。

为什么以色列同巴勒斯坦的战争大都是以色列胜出，除去正义和非正义因素不论，还有哪些成因？法拉奇提出了这个敏感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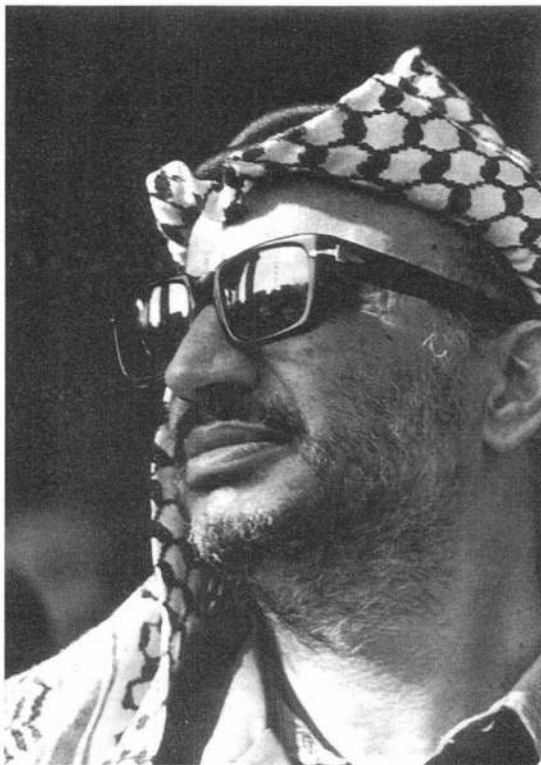


阿拉法特对此的解释是：“他们的某些战术是值得尊敬的，也是聪明的。但作为人，我不能尊敬他们，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野蛮的，在他们身上丝毫闻不到人性的气味……至于1967年的胜利，完全是美国人援助的结果，给以色列源源不断地送去钱财，还有最强大的武器和最先进的技术。以色列最好的东西都来自帝国主义的支持。”

“他们之所以取胜，从来不是由于自身的优势，除了外援，还总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弱点。”

法拉奇不解：“他们还是有出色的士兵吧？”

“不，他们不是出色的士兵。在白刃战中，他们非常怕死，没有一点勇气。他们用飞机进攻很出色，因为我们没有飞机。他们用坦克进攻很出色，因为我们没有坦克。但一遇到面对面的战斗，就逃之夭夭。在卡拉马战役中是这样，在后来的萨菲尔



阿拉法特在黎巴嫩：风尘仆仆的游击战士。

战役中也是这样。跨过防线，他们就用40多辆坦克向前冲，进攻的序曲是重炮猛轰，进行狂轰滥炸，用直升飞机发射火箭。但经过25小时的战斗，我们又把他们赶回到防线那一边。因为我们在短兵相接时，比他们勇敢。我们用我们的原始武器从背后把他们围住，在肉搏战中，我

们不怕死！”

阿拉法特谈到此时，开心地笑了，对自己的事业和为之奋斗的巴勒斯坦战士充满敬意和自豪。他的话，说明了在现代战争中，技术装备和道德观念的矛盾和对立。

阿拉法特用了一段富有诗意和外交辞令的话，表述他的这种感情：“1965年燃起的武装斗争的烈火，相当于点燃了一支蜡烛，它在漆黑的夜里闪烁着光芒，而现在我们有着无数支蜡烛，我们照亮了整个阿拉伯民族，甚至阿拉伯民族以外的地区……”

4. 爱国者，而非思想家

法拉奇建议回到以色列人的话题上来。她问，到目前为止，你们在战斗中打死了多少以色列人？



1993年9月13日，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拉宾、美国总统克林顿三巨头握手言和，拉开了中东历史上新的一幕。





“我不能给您提供确切的数字，但以色列人承认，他们在同巴勒斯坦游击队交战时，人员的伤亡百分比高于美国人在越南伤亡的百分比，当然，这是就伤亡人数同本国人口的比例而言。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的事实是：1967年战争后，他们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数突增了10倍。总之，在他们同我们作战或冲突之后，人们就会听到大量以色列人死在汽车里的消息，连以色列的报纸也这样说。因为以色列的将军们从不肯承认在 frontline 损失多少人，而说成是交通事故。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据美国的统计，在卡拉马战役中，他们的伤亡是1247人。”

“你们付出的代价也同样沉重吗？”

“对我们来说，损失算不了什么，我们对死并不在乎。从1965年到今天，我们死了900多人。然而，还必须考虑到死于空袭的6000市民和在监狱中受酷刑折磨致死的我们的骨肉兄弟。”

法拉奇说，900人死亡可以算多，也可以算少。这取决于战士的总人数，巴勒斯坦游击队一共有多少人？

阿拉法特顿时严肃起来：“要告诉您这个数字，我必须得到军事委员会的许可。我相信，我不会得到这一许可。但是我可以告诉您，在卡拉马战役中，我们仅有392人在对付15000名以色列人。”

法拉奇有些吃惊：“15000人？也许您要说的是1500人吧。”

“我说的是15000人。不言而喻，其中包括用重炮、坦克、飞机、直升机参战的士兵和伞兵。单就步兵而言，他们拥有四个连和二个旅。”

法拉奇充满置疑：“您不是一个公正的人。我现在就在这里，正在听您讲话。这次采访结束后，我将逐字逐句地报道您对我说的话。”

“我们所说的话，你们西方人绝不会相信，你们只听他们说的，只信任他们，只报道他们所说的话！欧洲人一直是站在他们那边的。也许

你们中的某些人开始了解我们，但实质上你们还是站在他们那边。”

法拉奇解释道：“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仅仅是旁观者。但即使作为旁观者，您也不能强求我们去反对犹太人。在欧洲，人们常常喜欢犹太人，您也不必为此感到惊讶。我们见过他们受迫害，我们迫害过他们，我们不愿意这种事情重演。”



无情未必真豪杰。阿拉法特62岁时组建了家庭，1995年喜得“千金”。图为阿拉法特与女儿扎赫娃。

“说得不错。你们应当偿还欠下他们的这笔账。但是你们想用我们的鲜血和土地，而不是用你们的鲜血和土地偿还这笔账。你们甚至继续无视这样的事实：我们丝毫不反对犹太人，我们只是同以色列结怨。犹太人将会在巴勒斯坦民主国家中受到欢迎，当时机来到时，我们将为他们提供在巴勒斯坦定居的选择。”





法拉奇说：“虽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能与以色列等同，但以色列不能不与犹太人等同。人们不能要求以色列的犹太人再次在世界各地流浪，最后进入集中营。这是不合理的。”

阿拉法特有些愠怒了。“然而现在流浪在世界上的是我们。既然你们如此关心犹太人，要给他们一个祖国，那么把你们的祖国给他们好了。你们在欧洲和北美有着辽阔的土地，你们别要求把我们的土地让给他们。我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我们不会为替你们偿还债而出让它。”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良心发现的。但直到那天来到之前，我们最好别见面！”

法拉奇在采访中，常遇到对方撂挑子不干的情况，她善于避重就轻，适时调转话题，以求柳暗花明之效。她扭转话题，问道，您总是戴着墨镜有什么原因吗？

“不，我戴墨镜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是睡着还是醒着。我可以告诉您说，我戴眼镜时，总是醒着的，只有摘下眼镜时，我才睡，我睡得很少。我已经声明在先，请您不要再提任何个人问题。”



法拉奇眼中的阿拉法特。



1994年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

法塔赫严格保守其领导人的秘密，从来不负责提供他们的传记资料。至于阿拉法特的日常生活，人们只知道他还没有家庭，此外什么也不知道。当他不在阿曼的兄弟家居住时，便在基地或在他所到的任何地方过夜。这是游击战争的需要，还是提高身价的姿态呢？法拉奇决定不放过这次难得的采访机会：“我还提一个问题。您还没有结婚，在您的生活中没有女人，是因为您愿意像越南的胡志明那样生活，还是因为您对同女人一起生活感到厌恶？”

“胡志明……不，可以这么说，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女人：我已经同一个女人结了婚，她的名字叫巴勒斯坦。”

采访持续了90分钟，其中大部分时间浪费在翻译阿拉伯语上，因为阿拉法特坚持通过译员回答问题。他这样做是为了字斟句酌，更加准确。

无论两人感情交流的内容，还是军事或政治上的讨论，这90分钟使法拉奇感到非常扫兴。

在法拉奇后来的文章中，她写道：“阿拉法特不是共产党人，他也





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他只是一个军人，一个爱国者，而不是思想家。”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品评和回味法拉奇的这些话，真有无尽的意蕴。

……

2004年11月11日凌晨3时许，已身为巴勒斯坦总统、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的阿拉法特在巴黎郊区贝尔西军医院病逝，享年75岁。

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以后，阿拉法特的身份已经公开，经过巴勒斯坦历史上的首次大选，1989年4月2日他担任了巴勒斯坦国总统。时过境迁，物换星移，这位总统在他的拉姆安拉官邸里被以色列包围了近3年，后因病被送往巴黎就医。有记者问及阿拉法特逝世前后的情况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鉴于法国医院有关病人信息的保密规定和阿拉法特家人的意愿，不便透露细节。

阿拉法特被安葬在他生前的官邸内，巴方的宗教领袖将取自耶路撒冷的泥土抛洒在他的棺椁上。斯人已去，但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存在折射出20世纪中后期的中东历史，并继续影响着这个不平静地区的现在和未来。法拉奇当年的采访则是对这个历史人物的重要解读。



第四章

牧歌的琴弦弹奏政治

——法拉奇与西哈努克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殃及柬埔寨的平静。在美国支持下，柬埔寨军事领袖朗诺发动政变，废黜并取代了和平中立的国王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只身流浪海外，在拒绝承认朗诺执政的国家里，过着受人尊敬和爱戴的生活。他在南斯拉夫总统为他安排的布里俄尼岛上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

法拉奇戏称西哈努克：可以放弃一切，唯独不能放弃进食，而且食必珍馐美味。其喜欢食物的程度可以同他热爱自己的祖国相比拟。回顾这段历史，犹如拿出一个古玩，重新来掂量掂量，从中可以窥见法拉奇和亲王的政治史观。





1. 田园牧歌式的国王

“我过去的生活有点奇特。我喜欢赛车，热衷于追求享乐，指挥爵士乐团……我爱吹萨克斯管和单簧管，谱写过曲子，到小城镇去同我的人民一起演唱。那时的柬埔寨没有战争，我能够根据我的思想和爱好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中管理国家。我有一辆兰恰牌小轿车，一辆阿尔法·罗密欧小轿车和一辆梅尔切德斯小轿车。”



美丽而又神秘的柬埔寨王国，洋溢着田园牧歌的情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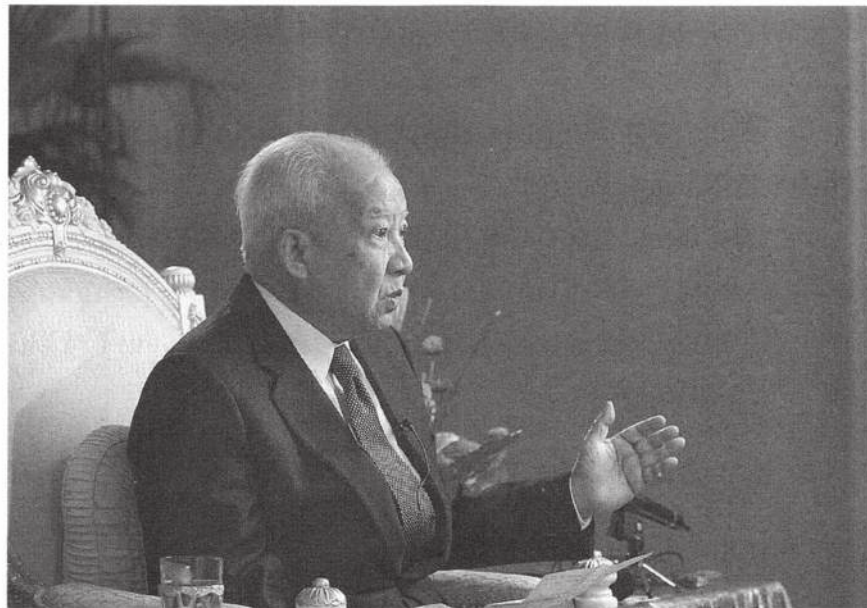
“这究竟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柬埔寨人爱好音乐。为什么一个国家元首只能一本正经地去接见大使，而不能组织舞会和狩猎呢？我让人们又唱歌，又劳动。我让我的部长们乘卡车到农村去帮助农民收割稻子，建造粮仓，修筑堤岸，掘土翻地。手拿锄头也是一件乐事。”

“在亚洲，一旦取得文凭或能提起笔杆，便自以为是个知识分子了，

认为弯腰参加体力劳动是有失身份的事。这就是所谓的高贵阶层。当然，这一阶层的人会把我说成是伤风败俗者，他们不会想到参加劳动是接近和了解群众的聪明方法……”

西哈努克和法拉奇见面后，先自己进行了大段的表述。看来布里俄尼岛上的休闲生活使他很满足，此前他已在全球旅行数周，即将取道罗马尼亚，回到北京并在那里长住。

“我那时还干其他的工作。譬如，写剧本，并作为导演将它搬上舞台，又作为演员参加演出；从事文化事业，为红十字会募集资金，我以此为乐事。我还担任影片导演，许多人认为我的影片一文不值，但是我推崇电影，是为了教育人民，就像影片《吴哥上空的阴影》那样来教育人民，而不是仅仅讲述无聊的爱情。您听说过那部片子吗？”



西哈努克在接受采访时，抑扬顿挫，声情并茂。





当法拉奇摇头表示不解时，西哈努克介绍说：“它以故事的形式描述了195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贿赂我手下的一名将军而策划的一次军事政变。由于法国使馆和中国使馆提供了情报，我粉碎了这一阴谋。实际上，我的秘密机构一文不值，因为它是由朗诺领导的。背信弃义的那个军官逃到了森林里，我的士兵们跟踪追击，杀死了他。我做了些什么呢？我从中汲取了电影的题材。我既是这部影片的导演，又在影片中担任主角。我以此来表明美国威胁着我们的独立和中立，迫使我们同它结盟。我拒绝反共，愿意同所有的人结交。电影可帮助我说明上述的一切。”

听西哈努克讲话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安慰，西哈努克是一个你愿意怎样形容他都可以的人。法拉奇说，他是一个无常的人，一个冒险家……国际社会上有人认为他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丑。但即便你这样评价他，你也不能否认在一个只产生灰暗、迟钝的政治人物、缺乏想象力的时代中，他是个奇迹。连美国人也承认这点：“像西哈努克那样的人生活在当今地球上绝无仅有的。”

西哈努克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正如他自己坦率承认的那样，他不是个有才能的政治家，而是个感情丰富的艺术家。他更乐于创作歌曲，而不是去主宰别人的命运。他不否认自己作为君主的历史，也不掩饰自己曾是个恶习很深的轻浮子弟。

2. 流亡元首的精神家园

“您在北京什么都不缺吗？”

“我什么也不缺。但是，一个像我这样忍受侮辱和诽谤的人，您真的以为还会把赛车和寻欢作乐看得很重吗？一个像我这样为自己的祖国每天遭到260次轰炸空袭而难受的人，您真的以为他会为失去甜蜜生活

和爵士乐团而惋惜吗？我丝毫不感到惋惜，无心回想过去无忧无虑的生活。往事一去不再复返。如果我重新得到我的兰恰牌小轿车、阿尔法·罗密欧小轿车和梅尔切德斯小轿车，我将不知道用它们来做什么，我几乎会把自己看成个小丑。”

“殿下，您现在还吹奏萨克斯管吗？”



几多思虑，几多迷惘的亲王。

西哈努克摆了摆手：“我不再吹奏了，我也不再吹单簧管。但周恩来给了我一架上等的钢琴，这样我可以继续作曲。在这三年中，我写了好几首歌。其中有一些歌在中国学校中演唱。我还写了其他许多歌曲，献给我的朝鲜朋友、北越朋友、老挝朋友、非洲和阿拉伯朋友。我还经常参加体育运动，打乒乓球，还要求中国为我放电影。开始他们只给我放映中国的革命影片，现在他们也给我看法国、英国和意大利

的影片。中国人如此慷慨大方，我到承认西哈努克的国家去旅行需要两架飞机，一架供我和30名随行人员乘坐，另一架载运我的行李，他们都答应了，给我提供了一架总统级的飞机伊柳辛62和另一架四引擎飞机伊柳辛18。机组人员都是中国人。”

法拉奇用自己的价值理解来阐述西哈努克所说的这一切。她问道：“殿下，您难道变得如此穷困了吗？”





西哈努克对此满腹怨声：“我早已身无分文了，既没有汽车，也没有住所，一无所有。我仅存的东西是在朗诺发动政变时留下的一个小小的行李。要是中国不帮助我，我连身上穿的衣服也没有着落。朗诺集团没收了我的全部财产，甚至把我的狗和我妻子的首饰也都拍卖了。有人说莫尼克把首饰安全地存放在香港，这是可耻的诽谤。她从未去过香港。她的首饰都留在金边。朗诺的军官们把这些首饰连同她的衣柜和我的汽车一起都卖掉了。我成了一个比无产阶级还穷的人。”

世界舆论把西哈努克一行人称为在北京的流亡政府。这个政府的开支即不是该政权过去在银行存款支出，也没有来自某个国际组织的资助，其大批资金如何而来？谈到这些，西哈努克充满感激地说：“我们的全部费用都由中国人支付。他们不仅承担我一家和跟随我而来的一百多名柬埔寨人生活所需的开支，还承担我在世界上开展外交活动所需的费用。他们考虑得十分周到。为了避免给人以养活我们和恩赐的印象，避免有损我们的尊严，他们把我们当做一个现任的政府，签订了明确的财政协议。协议规定向我们提供长期无息贷款，偿还期是柬埔寨取得彻底解放后再过30年。我们将于2004年偿还他们为我所花费的钱。不仅如此，我们将可以用美元、瑞尔，或其他任何货币支付，且不必一次全部付清。如果某一年我们缺钱，那也没有关系。”

或许是法拉奇想通过西哈努克向周恩来表达她来华的愿望，法拉奇问他：“殿下，您经常同周恩来见面吗？”

“经常见面。他是最真诚的朋友。他是个高尚文雅的人。他关心体贴别人，懂得人情世故。有人不理解我这个非共产党人怎么会成为周恩来的朋友，我回答他们说：‘他可是个比我这个亲王还要亲王的人。’当我需要见他时，就打电话问他：‘我可以来找您吗？’他回答说：‘不劳您的驾，我来看您，马上就来。’我提出异议说：‘不，您有那么多

事要做，应该由我来拜访您’。他就说：‘不，您别客气。我现在就停止工作，马上到您那里去。’后来他来了，还留下来同我们一起吃饭。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时间来看我。他日理万机，中国政府所有的繁重工作现在几乎都落在他的肩上。”



柬埔寨实现停火后，西哈努克亲王率领柬最高委员会代表团于1992年4月再访中国。

西哈努克对周恩来有着发自内心的敬佩，他深情地回忆着一个个细节：周恩来邀请他和莫尼克去吃饭。让他们尝尝家常便饭，然后一起到花园去散步，天南地北地聊天。他说，这种友谊可以追溯到十年前亚洲国家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那次会后，中国派技术人员到柬埔寨给予支援，最后悄声离开，既没有大肆宣传，更不扶植叛乱分子。“当然，当他请求我帮助北越人和越共游击队时，我也是非常愿意的，这不违背我的利益。”





“殿下，您向周恩来谈起过您过去的事吗？”

“从来不谈我当花花公子时干的事，不能谈我有几个宠妃的情况，因为我不相信周恩来能够理解。中国人慎重和严肃，他们从不触及某些话题，至多也不过是暗示一下，而口气是那么的郑重。他们不像我们那么随便开玩笑……”

法拉奇的问话使西哈努克陷入了回忆：“我有5个宠妃，13个子女中的11个是她们生的，现在有两个在柬埔寨，同红色高棉游击队一起在战斗。我的妻子莫尼克仅生下两个儿子。我的祖父有60个妃子，我的曾祖父有300个妃子。与他们相比，我有5个妃子不算多。我的父亲情况不同，他除了妻子、即我的母亲外，只有一个妃子。”

“我1941年至1955年当国王期间，母亲不愿意我结婚，因为她不喜欢出现第二个王后同她竞争。她说：你现在结婚还太年轻！她只允许我有妃子，很快我就有了5个宠妃。实际上，在我退位后同莫尼克结婚的日子里，我感到这样很好。现在我已经51岁，已满足于只有一个妻子的生活。这不仅因为莫尼克聪明并且长得漂亮，有教养，能理解人（当然我希望她是忠诚的），还因为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占有5个女人。我也不能把她们收留在北京，因为中国人马上会为这一丑闻而感到愤怒，或者他们会让我吃避孕药！”

西哈努克的法国妻子莫尼克公主对这次采访并无好感。几个月来，她一直担心丈夫和法拉奇之间将进行的这次会见。她对口无遮拦的丈夫说：“谁知道你会对她说些什么，谁知道她会诱惑你说些什么！”但是西哈努克耸着肩膀回答说：“我喜欢冒险！”

“我们不谈这些了。美国人喜欢一些无聊的事，而真正的西哈努克并不是个迷恋于后宫的人。他是一个在1954年禅位，而让人们自由选举的人，是一个成功地使柬埔寨保持和平田园的人，他还是一个有洞察



平和、安详的西哈努克，对未来充满憧憬。

力，并善于向那些‘聋子’们提出下述忠告的人：你们别受美国人的诱惑。跟他们走，什么都不成！”西哈努克说这番话时，呈现出发布政治宣言般的神态。

3. 是美国废黜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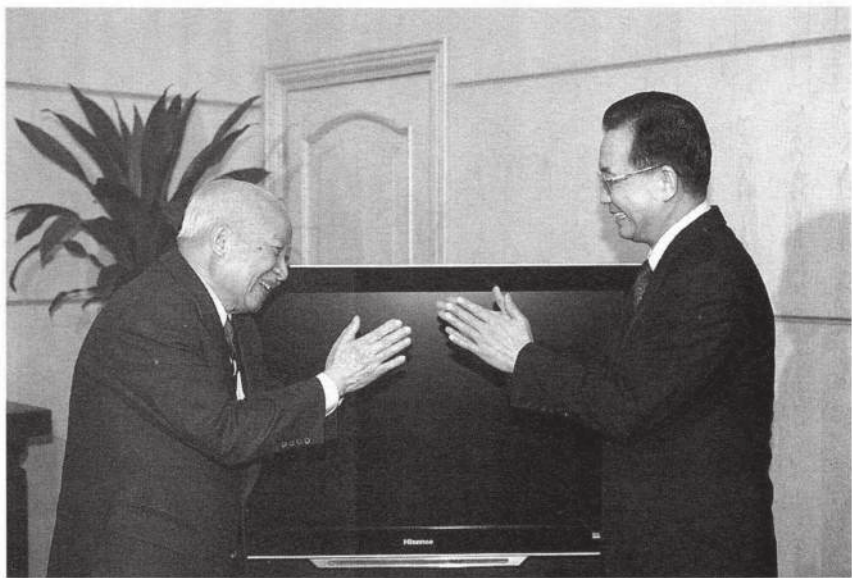
西哈努克曾经成功地使柬埔寨在16年中没有发生任何战争，然而他遭到废黜后，这个国家陷入一片火海。在西哈努克的心里，这个变化“归功”于美国。

“从我还是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时起，我就憎恨美国。我永远也忘不了1953年我与他们的初次接触。那时，有人告诉我说，美国人不同于法国人，他们信仰自由和民主，不搞殖民主义。于是我飞到华盛顿，要求同杜勒斯会晤，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要求他支援，他却傲慢地回答





我说：“您回家去吧！陛下，再见吧。”从那天起，我就憎恨他们这帮人，憎恨他们的假民主、假自由和在基督教文明的幌子下的帝国主义行径。”



西哈努克最近一次来华访问。 摄于2006年1月20日

在西哈努克一片激愤的情绪中，法拉奇问：“殿下，您是个天真幼稚的人吗？”

“有时天真幼稚得像个孩子。我的外交手腕似乎表现得不正派，给人居心叵测的印象，但实际上，我连耍滑头都不会。因为我总是害怕暗箭伤人，总是担心同对手当面翻脸。更糟糕的是我说话太直白。这是不择手段呢，还是天真幼稚呢？每个政治家的生活中都有错误，但是信任朗诺，受他的骗这样的错误是不应该犯的。”

“我以逊位来向群众表明，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称为圣权的东西。谁都不是由上天派来统治人民的。在我执政期间，柬埔寨定期举行

选举，从红色高棉游击队到极右派，人人都参加选举。我把政府各部的职务分配给从红色高棉游击队到极右派的所有人。也许我有点别出心裁，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是个艺术家，生来就是如此。但我只是个聪明人，不当别人的奴仆。”

是时，在远离布里俄尼岛的地方，基辛格和黎德寿正在进行和谈，外界认为，柬埔寨是黎德寿和基辛格会谈中的一个砝码和牺牲品，西哈努克在这个事关国家前途走向的问题上，曾义正辞严地声明：“我们不是北越的卫星国。河内接受停火是河内自己的事，不关我们的事。”在和法拉奇会面时，他介绍说，他曾给黎德寿先生发去了一份正式电文，对他说：“先生，您是个伟大的外交家。您善于为您的祖国谋利益，但是我恳请您别考虑为我的国家谋利益。请您不必为我们操心。”

“殿下，您从未谋求同基辛格谈谈吗？”

西哈努克有些无奈：当然想同他谈谈。他来到中国时，我通过周恩来转告他，我很高兴见他。他回答周恩来说，尼克松没有授权他来见我。他去河内时，我又通过范文同转告他，他以同样的话回答。我一点也不了解基辛格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只是通过别人对他的议论和您所写的采访记才对他有所了解。我还试图通过塞内加尔总统、几内亚总统和摩洛哥国王同尼克松进行接触。他回话说对我传去的信息都不感兴趣。后来他后悔了，为了同我达成妥协，他命令朗诺释放被囚禁在金边的我的母亲和我的子女。可是为时太晚了。我的母亲是个伟大的女性，她传话给我说：“你不要做出反应，让他们把我们重新抓起来吧！”

法拉奇诱导性地说，世界上有个说法：听西哈努克说话，越听越好听；人们讨论他的话，越讨论越不能理解。殿下，您是否觉得自己最近几年变了很多？

“我没有变。尽管现在我不在金边，而在北京生活，但我始终是原





来的西哈努克。他的信念坚定不移，人格不变。举例来说吧，我并没有成为共产党人，还是粉红色的，而不是红色的。我并没有沉默不言，而是继续不顾一切后果地竭力表明我对各种事情的看法。我无意作为一个流亡的花花公子而告终，而愿意重返金边。”

西哈努克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对成为裕仁天皇式的人，或者成为精于养马术的伊丽莎白式的人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

4. 谁都不是最终的胜利者

法拉奇和西哈努克决定见面已有数月之久，两人之间的书信和电报来往频繁不断。只要是北京来的电报，法拉奇不用打开就能知道是西哈努克的。他曾在红色高棉游击队占领下的柬埔寨做过一次旅行，这是向朗诺发起的一次绝妙的挑战。当从报上获悉他好端端地回来的消息，法拉奇想见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电报和书信的来往成倍增加。

在采访了西哈努克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后，法拉奇设问：“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西哈努克的回答颇具辩证色彩：“就目前来说，谁也不是胜利者。在越南不存在第三种力量，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共产党。南越将成为共产党的南越，这种命运是无法摆脱的。非共产党国家可以感谢美国人帮助自己成为共产党国家。我常常说：威胁东南亚的不是毛泽东和胡志明。如果整个印度支那都变成共产党的天下，那么大家必须感谢美国人，感谢美国人的错误、美国人的过失和美国人的罪行，它专门保护和扶植腐朽的、专制的和反人民的政权，只要这个政权反共就行。本来唯一能摆脱共产党命运的国家是柬埔寨。但他们把我赶走的同时，就为共产主义进入柬埔寨打开了大门。”

“殿下，您能肯定红色高棉游击队爱您就像您爱他们一样吗？”

“我已经说过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超过我，为此他们取代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没有说过他们是我的朋友。我还没有天真幼稚到那种地步。红色高棉游击队一点也不爱我，这我知道。他们把我置于他们一边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值得的，是因为我可以为他们效劳，没有我，他们就没有农民。在柬埔寨，没有农民的支持是干不成革命的。我十分清楚，等到我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用处时，他们就会把我像樱桃核那样吐掉。在这里有个红色高棉游击队的代表同我在一起。他从早到晚跟着我，我知道这个人是被派来监视我的。我知道他对我恨之入骨，这个人是最可怕的敌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他们有朝一日要暗杀我，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他们不是正在为反对我的敌人而战斗吗？”

说到这里，西哈努克顿了顿，又说：“中国人以无穷的智慧告诫我必须善于分清主要的敌人和次要的敌人。对中国来说，主要敌人是苏联，次要敌人是美国。因此它必须先顾及苏联的事，然后再顾及美国的事。而对我来说，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和朗诺法西斯主义，次要敌人是共产党人。结论是：我选择了次要敌人，同他们站在一起去战胜主要敌人！”

5. 没有选择的自由思想家

布里俄尼群岛犹如亚得里亚海中14颗璀璨的明珠，有着古罗马和东罗马时期的建筑遗址，生活着斑马、印度牦牛、索马里羚羊、犀牛等动物。岛上有名的建筑是奥匈帝国时期普拉军事基地的防御城堡，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高175米。作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当时的南斯拉夫铁托总统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在贝尔格莱德款待西哈努克亲王，并安排他去布里俄尼岛。亲王为此而感到高兴。





西哈努克谈兴不减：我将来要建设一个受人尊敬的柬埔寨，像中国那样的柬埔寨。如果这会使它变得过分严厉的话，也只好听天由命；如果我过去用电影和歌曲播下的欢乐种子会在柬埔寨被夺走的话，也只好听天由命。实际上，我是个悲剧人物。我代表着所有那些被紧夹在两个营垒之间，迫不得已仅在仅有的两种解决办法中作选择的自由思想家……

西哈努克依然深情地爱着这个虽然属于他，但也给他带来不少痛苦的国家。他说这种感情来自他的伟大的母亲：“她是个独断专行，别具一格的女人，但由于她的智慧、尊严、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她又是非凡的女人。她教我懂得了热爱独立，憎恨殖民主义。法国人把我推上王位时，以为可以把我像木偶那样任意摆布。母亲却说：‘在法国或其他强国的胯下当国王是一种耻辱。’”

“当一个人丧失了一切时，他唯一能保留下来的是尊严。我也是出于尊严而重回战火中的柬埔寨的。早在三年前，我就希望到柬埔寨去。但是去那里的唯一通道是胡志明小道。我的行程取决于北越人。北越人说：‘西哈努克亲王，我们不能送您去，美国人轰炸得太厉害，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死亡可能性，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我还恳求过范文同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是西哈努克亲王的密友，但一个性格是铁，一个性格属木棉。

总理说：‘你们让我冒这个险吧！’范文同一口回绝：‘不，我不能承担这个责任。’我还给红色高棉游击队发了一份电报：‘你们愿意帮助我吗？’他们回答说：‘殿下，没有必要去冒险，应该等待。’后来，对胡志明小道的轰炸停止了，我给共产党人发了第二封电报，他们同意了。于是，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开始了艰苦而奇妙的旅行。”



吴哥窟亦称“吴哥寺”，是柬埔寨的佛教古迹。19世纪中叶后重新修整。西哈努克曾设想他今后的生活：“在吴哥定居安身，再也不去执政……”

胡志明小道纵贯越南、老挝两国全境的崇山峻岭，大部为热带森林覆盖。为了把大批作战部队和物资输送到南方，北越组织数十万民工，把这条只能人背肩扛的羊肠小道建成了可以通过重武器的战略交通网。虽然美国五角大楼用计算机系统研究了整个胡志明小道的网状构成，包括每个交叉路口和溪谷，使用了当时所有的高科技手段：空投特种部队、设置地雷和人迹嗅探器、声音传感器，为了毁灭丛林植被，还大量喷洒化学脱叶剂，并用 B-52 型轰炸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 3630 多次轰





炸，但小道畅通无阻。

“这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在河内组成的车队有150人之多。范文同给我派来了一支装备有重炮的防空部队和一个流动医院，以防不测。医院设施齐全，有内科和外科医生、护士、血浆等等。他甚至还为我们配备了一组厨师。他们乘坐卡车，我们乘坐刚从莫斯科运来的苏制吉普车。我们走的小道紧靠老挝边境，美国的侦察机，还有飞往柬埔寨去空袭的鬼怪式轰炸机、B-52轰炸机一直盘旋在我们的上空。但是这里有着世界上最美的景色之一，它尽收眼底，我们在几天中尽情地欣赏着。我们常常要停下来排除小道上的地雷，定时炸弹不时发生爆炸。晚上，我们在两棵树之间挂起尼龙吊床来睡觉。第九天，我们到了同柬埔寨接壤的边境，受到了红色高棉游击队的接待。”

“殿下，等战争结束，您离开北京的时候，您将去何处定居安身？”

“我将设法买一辆梅尔切德斯·奔驰牌小轿车，在吴哥定居安身，再也不去执政。即便在红色高棉游击队的挽留下，我继续担任国家元首，在吴哥定居也是非常合适的。那里有一个机场，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将来我去金边只是出于礼宾活动的需要，但在此之前，我要到那里去亲眼看看绞死朗诺。‘患难之中识敌友。’我现在看清了敌友。我不愿意到那些抛弃了我的国家中去，也不允许它们的领事、大使和代表到我的国家来。”

“殿下，您身上的政治色彩不是很浓厚吗？”

“是的，我在政治中陷得很深……今后我能贡献的最大力量是把我这个人、我的声望和知识用于柬埔寨，我也能心安理得地光荣而死了。我打发走了法国人，保卫了国家的独立，我为代表着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今后我将少问政治，少去冒险，将会生活得更好。”

西哈努克进行了一番自省：我不喜欢我这个人的一切。如果我能重



法拉奇仿佛带着透视眼镜冷观世界。

新投胎的话，我真的不会选择昔日的我。我非常清楚我所热爱的东西，可是事与愿违，我不得不去当国王和从事政治。

“政治是个可怕的齿轮装置，你陷进去之后就

别想再出来。我陷进了这个装置，做了不少蠢事，犯了不少过错。我在想，如果我不搞政治，只从事歌曲创作，我的一生将会更加光辉夺目。”

法拉奇在评价这次与西哈努克的谈话时写道：在采访他之前，一点也不理解他。没有把政治家的责任感同他的花花公子的行为调和起来。通过这次采访，法拉奇和世界一起了解了真正的、充满矛盾的西哈努克。他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试图求得平衡，千方百计防止战火蔓延到自己的国土，可谓用心良苦。他明知自己的军队不是越南共产党军队的对手，就装聋作哑，任由他们使用柬埔寨边境上的一块狭长地带，向南越和美军出击，实为不得已而为之。

两人作为朋友而相见，又作为朋友而分手。在长达7个小时的采访结束时，西哈努克向法拉奇许诺，说服周恩来总理给法拉奇发签证，让她来中国访问。法拉奇非常高兴，并答应他，如果能到北京，就给他带两公斤新鲜奶油鹅肝作为对亲王的酬谢。分手时分，西哈努克赠送给法拉奇书籍、照片和唱片，唱片中灌制了西哈努克创作的新歌。





但法拉奇白白等了几年，始终没有得到中国的签证。西哈努克没有能说服周恩来，不过他给法拉奇发了一封电报，感谢她所发表的采访记。法拉奇在微笑中阅读了那封篇幅很长，内容很亲切的电报，这是唯一一位屈尊来电感谢法拉奇为其作报道的国家元首。

西哈努克后来的命运跌宕有加。红色高棉取得政权后，实行残酷的极端统治，西哈努克也受到冷落和闲置。区区几年后，红色高棉在人民的反对浪潮声中销声匿迹，西哈努克作为象征性的国王形象再次登场，国家总算有了新的和平。

金边南部的维多利亚海滩依旧潮涨潮落，皇宫内5千多块银砖铺成的地面，仍光可鉴人。虽然这个世界在变好，但回首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国家、种族和任何个人谁都不是赢者。



第五章

统治五亿人口的伟大女性

——法拉奇与甘地夫人

印度总理甘地夫人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女人。她通过民主的方式荣登总理宝座，统治着近5亿人口，打赢了遭到美国反对的与巴基斯坦的战争。

法拉奇认为，在掌握着世界命运的领导人群落中，除极少数外，大都是些毫无光彩的平庸之辈。在缺少伟大人物的时代里，出现甘地夫人这样一匹飞腾的骏马是耐人寻味的。

她称赞甘地夫人是当代真正的“皇后”，是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是因为两个坚强的女性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

法拉奇对甘地夫人的报道引起了世界的强烈反响。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读了采访记后很生气，要求法拉奇也到他那里去听听另一方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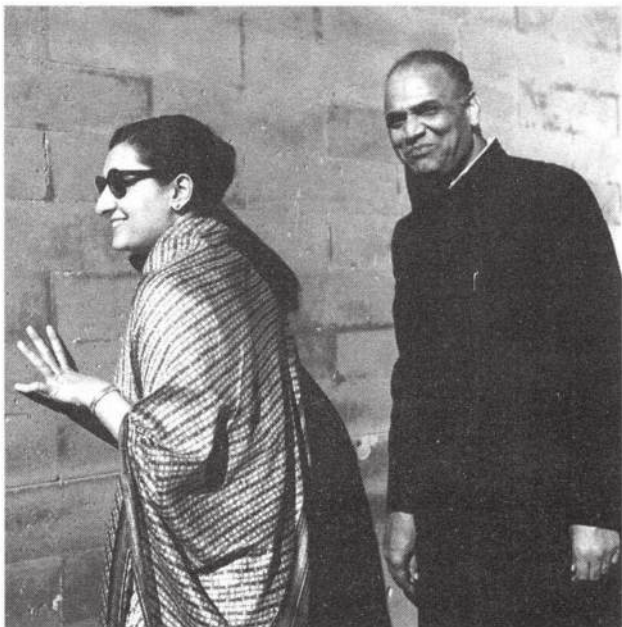


1. 那双淡褐色略带忧伤的眼睛

甘地夫人的相貌同她的品格一样动人。她有一双淡褐色略带忧伤的美丽眼睛，脸上挂着一丝奇妙莫测的，能引起人们好奇的微笑。她那卷曲的黑发左侧，夹着一绺奇特的灰发，犹如一支银色的光束闪闪发亮。她身材苗条又矮小，只穿印度妇女习惯穿着的莎丽服，外面套着西式的小毛衣。这是法拉奇走进甘地夫人办公室时的最初印象。

1972年2月，法拉奇在政府大厦的办公室里与甘地夫人如期相见。这是甘地之父尼赫鲁当年的办公室。一间宽敞、朴素的屋子，一张陈设简单的写字台。法拉奇进去时她迎面站起来，跟法拉奇热情握手，然后又重新坐下，没有任何开场白，只有探寻式的凝视。

法拉奇说，甘地夫人，我有许多问题要向您提出，有涉及您个人的，也有涉及政治的。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许多人害怕您，说您对人冷淡，甚至冷酷？



1954年10月21日，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和女儿甘地夫人在天坛的回音壁前俯耳倾听……

甘地夫人思考了片刻，从印度的国情民风上进行了解释：“他们这样说是因为我过于直率。我从来不浪费时间浪费在娓娓动听的闲谈上，不像印度人通常所做的那样，让谈话的前半小时在问候声中去，我不愿讲那些娓娓动听的话，这样就不容易得到理解。人们认为我冷淡，也与我的坦率有关系，我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表现出来，从不考虑别人会有什么反应。”

法拉奇笑了，她高兴地说：“我想从最糟糕的问题开始。您刚打赢了一场战争，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次危险的胜利，而具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少。”



两个相邻大国的两位杰出女性——宋庆龄和甘地夫人。

“生活总是充满着危险，我认为只要看来是正确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要是在看来正确的事情里包含着危险……那么，就应该去冒险。我一贯遵循的哲学是：从不考虑一个必要的行动会带来的后果。”





法拉奇问：甘地夫人，我说您的胜利中包含着危险，不仅指的是孟加拉，而且还指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现在那里吵嚷着要闹独立。我听说在加尔各答就发生了农民武装斗争。列宁曾这样预言：“世界革命将席卷上海和加尔各答”。

“这是不可能的。印度正在和平地民主地起着变化，共产主义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如果不是我这个政府，而是右派政府的话，那就存在危险。事实上在印度，当人民认为我的党向右转的时候，共产党人才增加。人民是对的，因为面对向右转的威胁，它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投靠极左。但是目前人民看到了我们的努力，看到困难正在得到解决，共产党人就丧失了力量。至于西孟加拉的农民武装问题，已完全被控制，而不会发生什么遗憾的事。”

甘地夫人历经政治风雨的磨难，曾经坐过13个月的监狱。她在牛津大学就学时，就加入工党，结识了一位孟买来的年轻律师甘地，他也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1942年2月，他们在新德里举行了婚礼。六个月后，英国当局以颠覆罪逮捕了他们。1947年尼赫鲁担任总理后，甘地夫人回国照顾失去配偶的父亲。

17年中，甘地夫人更多地跟父亲在一起，被人们称为“印度第一夫人”、“民族的女儿”。她和她的父亲一起外出旅行，接见国家元首，召集国家的各种重要会议。1956年她进入国大党执委会，两年后成为该党的主席。尼赫鲁去世时，她接替总理职务已水到渠成，以355票赞成、169票反对而选举获胜。

甘地夫人的政治经历同以色列的梅厄夫人有不少共同点，两个女性都是通过参加政党活动而上台执政。两个人的婚姻也都不尽美满。梅厄为了执政而牺牲了她所热爱的、并共同有过两个孩子的丈夫。两位女政治家的经历都说明，在政治的五彩光环下，常掩饰了女性生活的悲情。

法拉奇把这一点翔实地表述在她的采访记中。

2. 女人眼里的战争

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战火刚刚熄灭，法拉奇自然不会绕过这个热点问题。



1954年10月21日甘地夫人参观北京市妇女生产合作社，她称此行是在探寻印度妇女解放之路。

甘地夫人对此解释说，巴方的1000多万难民先后涌入了我们的国土，我们收容不了这么多人，不能容忍一个无限期的不稳定局面。为了我们的利益，必须立即制止它，于是就有了这场战争。可是，如果考虑一场真正战争的开始，那么是巴基斯坦人首先发动进攻的。他们发来的最初的几枚炸弹是在那天下午五点钟落在亚格拉城的。我可以事实向您证明，我们遭到了突然袭击。周末是我们可以离开德里的唯一时间，那个





周末我去了加尔各答。国防部长先去了巴特那，准备再去南方的班加罗尔。财政部长到孟买去了。武装部队司令去了什么地方。我们大家都必须赶回德里。因此，我们的军队不是在几小时后，而是等第二天大家商议后，才开始反攻。也正因为如此，巴基斯坦人开始占领了一些地区。

和甘地夫人这样一位受过非暴力教育的人谈论战争，谁都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发生印巴冲突的那些日子里，甘地夫人是怎么度过的，她有什么感受？甘地在谈话中显示了这样刚烈的性情：

“谈到非暴力，我有许多的故事。印度独立不久，巴基斯坦入侵当时受印度土邦主掌管的克什米尔。土邦主逃跑后，克什米尔的首长阿卜杜拉请求印度援助。当时的印度总督蒙巴顿伯爵回答说，要是巴基斯坦不向克什米尔宣战，印度就不能向克什米尔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领导人决定签署一项保证与巴基斯坦交战的文件。非暴力的信徒、圣雄甘地也签了字，大家选择了战争。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在应该保卫别人或自己的情况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上许多战争发生在同一民族和部落的家族，乃至兄弟之间。由于印巴两国的历史渊源，也出现了许多战争与亲情交融的特殊场景。甘地对法拉奇说：“占领达卡后，巴基斯坦的军官和印度军官在一起握手。我知道您对此会感到惊讶，但是您明白吗？1965年以前，在我们的军队和巴基斯坦的军队里，可以遇到彼此是兄弟的将军，他们是一个家庭里的兄弟，或者一边是叔父，另一边是侄子；或者这里是一个堂兄，那里是一个堂弟。有那么一段时间，巴基斯坦和印度驻瑞士的两位大使还是两个亲兄弟呢。”

甘地夫人把这些现象视为英国人强加的分治所造成，这种分治肢解家庭，瓦解民族。“令人悲痛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在英国人的统治下这里也存在着敌对集团，也有过交锋。后来我们知道，这些交锋是由那

些分治我们、毫不关心我们的人挑起的。外国人一直希望分裂我们，即使在印巴分治后也是如此。要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能团结在一起……我不是说要成立联邦，而是说像意大利和法国那样作为两个友好邻邦，那么双方都会进步得更快。”

西方报刊一直强调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根本矛盾是源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甘地解释说，我们一直认为双方因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敌意是错误的。少数民族不可能被一个国家消灭，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应该生活在一起。在当今世界，人们怎么可能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互相残杀呢？今天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关心，这些问题是贫穷、个人的权利、技术的发展，它们比宗教更重要。对于那些头脑发热，叫嚷宗教危机或说类似蠢话的人，我是不理睬的。

3. 非教徒，不结盟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宗教包括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一种成功的宗教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且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较大的影响。多数宗教是对超自然力量、宇宙创造者和控制者的相信或尊敬。作为世界上最信仰宗教的民族中的一个领袖，甘地夫人有何诠释呢？法拉奇和甘地夫人谈到了宗教学的话题。

“我不去庙宇，也不拜佛，我不干诸如此类的事。但是如果把宗教理解成信仰人而不信仰神，理解为努力使人变得好些，使人生活得更幸福，那么我算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

甘地夫人表示不信神而相信人的力量，这种宗教观的树立，在印度这个宗教文化盛行的国家里，需要很大的勇气。法拉奇由此认为，甘地夫人身上体现着许多西方的现代思想。

在法拉奇到印度采访甘地夫人前不久，印度与苏联签订了印苏友好





条约。这对一直宣称执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来说，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甘地夫人解释说，不结盟意味着不属于任何军事集团，不受任何国家的影响，保留与所有国家友好的权利。签订印苏条约后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这个条约使得我们对苏联的态度不同于对别的国家的态度。可是，条约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不会阻挠我们成为其他国家的朋友，也不会禁止我们去发挥不结盟的作用。这项条约签订一个月后，有人问周恩来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周恩来回答说：“现在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我看不出为什么一定会有不同。”

法拉奇问：“那么那些认为您比您的父亲左倾的人是有道理的？”

“我不把世界分成右和左，不在乎谁是右派、左派或中间派。我对这样或那样的招牌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解决问题，达到我的目标：使人们有更高的生活水平，消除贫困和经济落后。我们在银行国有化时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我不赞成华而不实的国有化或者把国有化视为医治一切不公平弊端的良药。当我们第一次议论国有化时，党内由于一派赞成一派反对而不



法拉奇最多时一天抽 60 多根烟！
她似曾常在烟雾缭绕之中。

不知所措。为了不使党分裂，我建议暂时妥协，给银行一年的时间，让他们证明国有化有无必要。一年过去了，我发现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钱源源不断地流入有钱的工业家或银行家的手中。于是我提出银行必须国有化，根本不考虑这是社会主义还是反社会主义，而只认为这是必要的行动。谁要是仅仅为了表现自己是左派而搞国有化，我认为这样的人是愚蠢的。”

甘地夫人进一步解释说：“世界形势的变化很快，也许 20 年前你想干的事，今天已毫无用处，完全过时了。但印度有一直没变的国情，就是仍然存在着极大的贫困，很大一部分人没有从国家的独立中得到好处。”

贫穷总是和膨胀的人口出生率连在一起的。印度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第二人口大国，为了实行计划生育，限制人口，国家采取了对男性强行施行绝育手术的制度。作为西方人士的法拉奇对此不解，追根溯源。

“在遥远的过去，印度人口稀少，人们对妇女的祝愿是‘望你多子多孙’。在我们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中对这种祝愿大加渲染，我内心也认为应该让人们愿意要多少孩子就生多少。但这个观念现在看来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应该保护家庭、保护孩子们，他们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应该受到爱护，不应该生下他们以后让他们去受苦。过去穷人生孩子就是希望从他们身上得点好处。这种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不能用武力加以改变，唯一的途径是采用计划生育。男性绝育是计划生育的最彻底、最保险的方法。”

甘地夫人向法拉奇强调说：“您可能认为节育很残暴，但我认为对一个已有了八九个孩子的男人来说，做绝育手术没有什么坏处。”





4. 圣女贞德是我的梦

印度历史上的妇女几乎与世隔绝。在印度各邦，妇女不能在街上露面。信奉伊斯兰教的女人出门时，须用“帷幔”把自己蒙起来，用一块厚重的被单布把眼睛遮住。信仰印度教的妇女出门时得坐“多利”，这是一种关闭得严严实实，像灵车似的密封轿子。印度的进步女性为改变这种习俗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虽然甘地夫人也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她否认自己从来也不是女权主义者：“我的母亲倒是女权主义者。她觉得，生为女人，是她一个不利条件。她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她与年龄相仿的弟弟一起长大，自在地生活，但在她十岁以后一下子结束了。家里让她屈服于‘妇女的命运’，告诉她‘这不能干，这样不好’，从早到晚，让她闲在家里洗衣做饭。她讨厌无所事事的生活，后来，当外祖父外出时，妈妈乔装成男



上个世纪中下期，民族解放战争遍布全球。

人，和弟弟骑马逃跑了。妈妈为争取妇女的权利战斗不息，直至死去。她参加了当时所有的妇女运动，发动过许多次起义。她是一位伟大的女

性。今天的妇女一定会非常喜欢她。”

甘地夫人一旦同意会见你，就会表现得令人意外的直率。无须别人的恳求，便滔滔不绝。她甚至回答了那些她不可能回答或不应该回答的问题。在实在无法正面回答的情况下，她就简单地对问题给予肯定或否定。对于个人问题她说起来毫无拘束，通过她那深情的、抑扬的声音把自己和盘托出。

“甘地夫人，我们该谈个人问题了。像您这样一个女人是跟男人在一起自在些，还是跟女人在一起自在些？”

甘地夫人笑了，回答说，对我来说完全一样，因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都同样对待。我把他们看作是人而不去考虑性别。这里需要考虑的是我接受的教育非常特殊，我是一个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和一个像我母亲这样的女人的女儿。我像男孩子一样长大，和男孩们一起爬树、赛跑、摔跤。在男孩们面前，我没有羡慕，没有自卑。我也喜欢洋娃娃，可我是让它们表演起义、集会、逮人的场面。我的洋娃娃几乎都不是要喂奶的婴儿，而是袭击兵营和被投入监狱的男男女女。

“圣女贞德是我童年时的梦想。我记不得在哪里读过有关她的事迹，但是她对我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我渴望为我的国家献出生命。”

当年尼赫鲁在监狱中给她写过这样的信：“我的月亮，你还记得你曾深深地被圣女贞德所吸引，并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样吗？在印度，我们正在创造圣女贞德时代的历史。我和你能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如今这封信被编入印度的两本教科书中。

谈到这些情况时，甘地说：“我从幼年起遭受的困难、艰辛和痛苦造就了我。经历过艰难的生活是一种特权。我童年时是一个瘦弱、多病、易激动的女孩子。警察闯进我们家捉人后，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只留下我一人独自生活，我很快学会了独自度过困境。8岁时，我





独自去欧洲旅行，往返于印度和瑞士、法国、英国。我对正义的痴心追求来自我的父亲，而他又是从圣雄甘地那里接受这种意志的。事实上从来没有人强加于我任何事情，也没有人向我灌输教条。事情都是我自己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发现的。例如，我的父亲很重视勇气和毅力，他蔑视那些没有勇气的人，但是，他从不对我说：‘你要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每当我去做困难的事或在赛跑时赢了男孩子，他就自豪地用微笑给我鼓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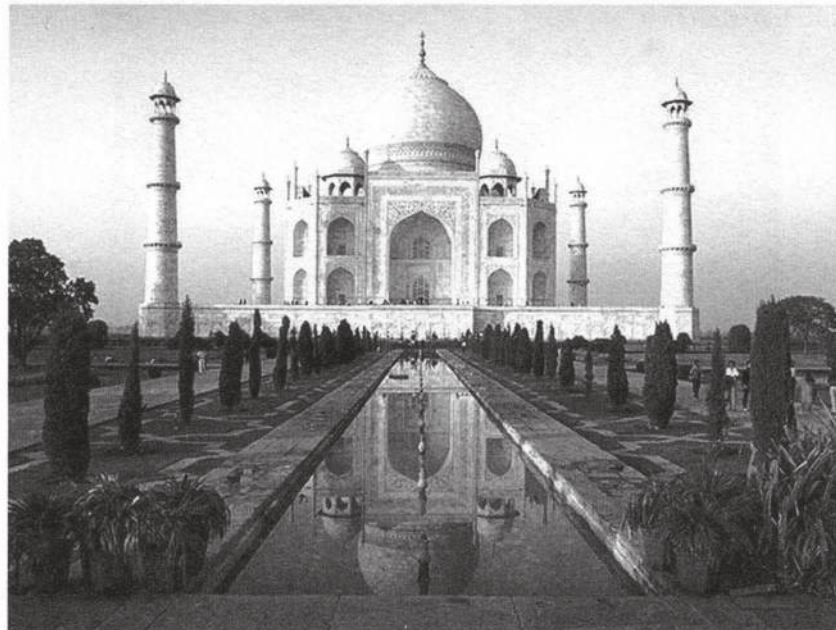
法拉奇的经历同甘地夫人多有相似，她十几岁时也曾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她们所讲得这代人中共有的“特权”，使两人平添一种贴近感。痛苦是生命的盐粒。法拉奇此时也许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他也曾投身抵抗运动并被捕。两位坚强女性共同的成长之路，成为采访注定成功的主要因素。

5. 幸福只是一片飘零的落叶

全面地了解甘地夫人是一件复杂的事。因为构成她性格成分的因素太多。男人们往往很难接受她，而女人往往由于她的巨大胜利而感到宽慰和扬眉，因为这种政治上的胜利，否定了任何为父权制和男人统治进行辩护的理论。

“一直到18岁，我都不愿意结婚，因为我愿意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解放印度的斗争。当时我认为结婚会影响我去尽我的责任。”甘地夫人回忆说。“18岁后，我开始考虑结婚的可能性。但事实上，没有人赞成我的婚事。甚至连圣雄甘地也不满意。您知道，我的未婚夫信奉另一个宗教，对于这一点，整个印度都反对我们。每天，邮递员都把一大口袋信倒在地板上，这些信我们都来不及读。有些朋友看了一些信后对我说：‘某人要把你们切成碎块，某人虽然已有妻子，但愿意与你结婚，

他说至少他是印度教教徒。’后来圣雄也参与了论战，这是从我最近发现的他的一篇文章中知道的。他恳求人们不要再纠缠这件事，希望人们放弃狭隘的思想。”



泰姬陵是印度古老文明的象征，是莫卧尔王朝第五代皇帝沙贾汗为其爱妻泰姬·玛哈尔修建的陵墓。它始建于1631年，历时22年才完成。

“您的丈夫已去世多年，您从来没有想过再结婚吗？”

“要是我遇到我喜欢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也许我会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即使我遇到了这样的人，我也排除再结婚的可能。我的生活是如此丰富，为什么要再结婚呢？”

“我是个善尽美的家庭主妇，因为当母亲一直是我最喜爱的职业。在当母亲和家庭主妇方面，从来没有要我做出过牺牲，我享受到每分钟的乐趣。我发疯似地尽心抚养我的两个儿子，把养育他们看成是一种超级工作。事实上，今天他们已成了两个很好的男子汉。我从来理解不了





有些女人由于孩子的原因，而摆出当牺牲品的样子，不参加其他活动。在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照常担负我的工作。当时，我是儿童福利会印度委员会社会助理。”



纯真的法拉奇与戏谑的法拉奇。

是时，印度社会上对父女蝉联总理颇有微词。有人说，天下哪有父亲为女儿准备总理位置的？甘地夫人如何走进政治，继而摘取了丰硕的政治之果，成为法拉奇心中的悬疑，但她不能绕过它。面对犀利的提问，甘地夫人解释说：“他是总理，我照料他的家，当他的女主人，自然就意味着我陷入了政治，因为经常与政界人物来往，了解其中的手腕和秘密。它也意味着，我迟早会陷入直接尝试的圈套。”甘地夫人对家族政治，或子承父业的社会现象并无非议，这或许代表了许多政治家的观点。

甘地夫人的丈夫住在勒克瑙，父亲尼赫鲁住在德里。因此，甘地夫人曾长期往返于德里和勒克瑙之间。这样的生活多有不便，而夫妇两个同样强硬和固执，谁也不愿让步。甘地夫人说：“对他来说，当我父亲

的女婿是多么不容易，别忘了他也是议会的议员！他曾经决定离开勒克瑙，到德里我父亲的家里，与我生活在一起。但是，作为议会的议员，他怎么能在总理家里接待客人呢？他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另外找了一个小住宅。他这里住住，那里住住，有时跟我们在一起，有时独自生活，生活也并不容易。”

甘地夫人此时充满了对以后岁月的畅想。她说，将来印度摆脱贫困、实现公平和民主时，将居住在一个村庄里，或者去学习人类学，或者再去学习历史。总之，不会过无聊的生活，即使它充满各种困难……

法拉奇和甘地夫人谈了两个多小时。采访结束时，甘地拉着法拉奇的手臂，好像老相识似的一起走出办公室，直到把法拉奇送上了出租汽车。经过走廊和走下楼梯时，甘地一面跟法拉奇说说那那，一面漫不经心地回应着官员们对她的致意。

两天后，法拉奇发现采访中还有些遗漏，就敲开了甘地夫人的家门。这是一所简朴的别墅，她与儿子拉吉夫和桑贾伊一起住在这里。

家中的甘地更加平易近人，早晨经常出来接见那些找她请愿、抗议和向她献花的人。法拉奇敲响门铃，她的秘书应声而出，一会儿甘地走了出来。

“咱们喝杯茶吧！”两人坐在面朝花园的起居室里又谈了一小时。期间，甘地叫来了正在草坪上玩耍的、皮肤黝黑的漂亮男孩，温柔地抱起他，低声说：“他是我的孙儿，是世界上我最爱的人！”看着这位强有力的女人，动情地簇拥着一个小男孩，会使人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这是一个致力于维护自己命运的强权女人的另一面。

法拉奇对甘地夫人的报道引起了世界的强烈反响。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读了采访记后很生气，要求法拉奇也到他那里去听听另一方的声音。

……





80

法拉奇向世界投不信任票

1984年10月31日，甘地夫人步行前往政府大厦南区的总理办公室。突然，她的一个警卫用冲锋枪瞄准了她，随着一阵枪声，8颗子弹射进了她的腹部和胸部。立即采取的抢救措施没有能挽救她的生命，当天下午1时20分，她告别了她所热爱的印度，永远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她的一生，后来被拍成一部电影，评论家们称这部电影是“印度的史诗故事”。



第六章

明星的传奇制造

法拉奇的妹妹说：“我姐姐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是一本敞开的书。这书是用中文和梵文写成的。”对一些西方人来说，中文和梵文意味着些许神秘。

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千至3千美元水准的时候，是社会整体步入富裕之前的一个动荡期。从这个时期开始，民众的造星、追星成为时尚，因为社会形态的转换和经济社会带来的相对富足，使人们有了个体想象的空间。走向富足以及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是“造星”的土壤。

法拉奇是怎样搭建自我的舞台，使自己成为明星的？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1. 我的舞台，我做秀

法拉奇作为20世纪最优秀的女性之一，跻身于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最优秀的文学家的群落中。作家圣·阿里科说，法拉奇取得了一般新闻工作者用150年的时间也不能完成的新闻业绩，不愧是多事的20世纪中后期世界历史的重要见证人。她展示了那么多的明星，同时成功地塑造了自己。

法拉奇从一开始就找到了一种适合表现自己的写作方式，并逐步完善和滥觞：



法拉奇美丽的家乡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

聚焦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吸引人的情节过程。

法拉奇知道，医生的生意依赖病人的痛苦，教师的生存靠学生的无知，记者的扬名则靠悚人听闻的事件。在全世界诸多重大事件中，她冲锋在前，不惜舍身于危难险重的最前线。她闯入炮火中的战场，进入暴乱的城市中心，风头强劲，义无反顾，因而在她的文中，不断出现人事和情感的刺激性冲突高潮。冒险、冲突、巨变的历史事件使法拉奇的文

章精彩纷呈。读者在她的作品中与她共同经历重大的惊险事件，共同体验爱情的甘苦，共同分担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考。这也是她崇高的职业精神之所在。

1968年9月，第19届奥运会在墨西哥城举行时，大规模反政府学生运动借机爆发了。法拉奇赶赴那里，坚守在这个重大历史舞台的中心。在参加一次遭军方野蛮镇压的学生示威活动中，法拉奇身受重伤，倒在采访的火线上。

毫不掩饰地穿插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

以第一人称的身份介入，通过生动、有力的叙述将自己的形象凸现于读者面前，仿佛许多作品的主角就是她自己，而不是她所报道的对象。后来，她又不断对之加以锤炼、改进，使这一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如同森林中的蘑菇，每次雨后都长上一茬。读者在她带有仪式性质、洒脱地表现自己的惯常行动时，能够深入地观察和理解她，并感应她在自我剖析时的那种乐趣。在采访著名演员梦露时，她将自己寻找梦露的过程活灵活现、细致入微的描绘出来，让读者与她一起体验寻“梦”的激动。她采用第一人称的报道方式，把自己的声音、悬念融入叙述，让读者把她为一睹女星风采而进行的艰辛历程，当作中心话题来谈论，以衬托她的不竭追求。梦露尚未登场，一位明星般的女记者却脱颖而出，梦露倒成为了引子。美国众多的读者为法拉奇而颠狂，读者群关注着法拉奇的努力，记者们四处追随把她作为报道对象，她让读者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在文章结尾，邀请梦露到她家做客更使报道充满了喜剧化的色彩。

以强烈的主体意识介入新闻报道。

行文爱憎分明，好恶概见纸端。法拉奇在报道过程中体现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以此为主导思想，使文章平添鲜明的个性风格和气息。她





说：“我是一名演员，一个自我中心者。只有把我放入报道中，该报道才是最好的。”她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感情倾向融入报道过程，对所写人物自由地，有时甚至随意地进行道德评判，而极少借助纯粹的记录性陈述，也不承认新闻报道中存在着绝对的公正与客观。她说：“记者写报道的时候只能凭自己的良心。”所谓的客观性是虚伪或假想出来的。

她的文章自始至终都令人激动，而拒绝平和。《法拉奇报道：血洗之夜我不幸受伤》讲述她的历险经历：“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我听到



从担任记者起，法拉奇就开始著书立说。

人们在呼喊……我左边那个人受了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水管，水向我们喷射过来，我们……浸泡在被血染红的水里。”作品具有历险小说的特征，率直有力，引人入胜，但都是我听我见，附带的照片有力地补充和说明了她的个人形象。作者在这里树立了她的英雄形象：面对专制主义，一位追求自由与公正的女记者毅然挺起了胸膛。

不时甩开读者，使读者视线发生偏移。

法拉奇在自己的报道中，不失时机地甩开对方，插入自己的评论，使读者的阅读视线为之所动。在报道美国宇航局和宇航员的活动时，为了亲身体验在密封舱的感受，她进入阿波罗号太空船。进入伊始，她就

弃宇航员和美国空间技术成就的报道而不顾，由这艘太空船，联想到二战期间曾经囚禁她父亲的昏暗囚室，从这个基点发散开来，她向读者阐释了人类面对孤独与恐惧时的不同态度。

在这次采访中，宇航员提及他在二战中曾在意大利上空作战，并参加过对佛罗伦萨铁路的轰炸。法拉奇接过话头讲述起自己在一次空袭中经历的恐怖，并引发了对航天技术的道德评判。在这个时刻她忘记了这位宇航员当年轰炸的对象，正是她的家庭所极力反对的纳粹暴政。她的这种发散型思维，似乎很有益于她寻找提问的角度，丰富文章的内容，但有时忽略了报道对方的主旨。



凝视中的法拉奇。





以评论为取向的新闻作品。

在西方新闻业中，欧洲与美国的新闻风格不同。欧洲新闻工作者有很深的文学功底，记者的观点常常夹杂在报道之中，其报道和言论很难区分，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新闻被称为“评论取向的新闻业”。而美国的新闻业则强调“以信息为取向”，其新闻工作者一般避免直接来做价值判断。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和法拉奇一样，都以时政记者著称，其采访风格也相近，但华莱士顶多提问尖锐，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法拉奇的作品中离不开她的自由评点。

法拉奇曾这样表示，写作对自己是一个无比痛苦的过程：“我是个写起来很慢、很小心的作者。”因为她的文章加入了许多评论内容。她的采访稿篇幅都很长，很多都是因为她其中夹杂了个人的“私货”，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她的观点和立场。

法拉奇上述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有失客观中立，对受众的判断会有一些的干扰。但是，一个负责任的记者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零度介入”，不带任何思想和评判？如果记者预先具有某种观念，那么他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观念？

多年前，艾丰在他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曾这样解释宣传性现象。他说，宣传性现象是一种带着主体意识，即指导思想去参与报道的特殊社会现象，是由于宣传和传播的交叉影响而产生的，或者是为了满足某种宣传目的而人为制造的。它分为三种情况：为宣传目的而安排，但并未歪曲和改变事物本质的合理的宣传性现象，这类现象有时还集中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为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而人为设计制造的，用来掩盖或歪曲事物本来面目的不合理宣传现象。前者是记者经常要借助和使用的，后者是需要警惕和防范的。而利用合理的宣传形式，插进不合理的宣传内容是半合理宣传现象，需要记者进行谨慎的材料分析。总之，要重视

“正象”，抛弃“废象”，洞察“歪象”。这是对记者文字水平和思想阅历的检测。

神话是与某种仪式联系在一起的叙述故事。法拉奇就是现代神话创造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她不是产生于那些包装和经纪人的手中，而是自己把握着行文的话语权，坚实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2. 提问式的攻击利器

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关系的风云录。法拉奇早年的闻名，为她有机会采访到各国的政治巨头奠定了基础，而她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瓦文萨、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又为她增添了重量级的砝码。面对



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
——法拉奇“较劲”的人

这些有能力改变历史进程的巨擘，她始终摆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仿佛她是和这些巨人脚下的千百万计的民众们站在一起，是他们的代言人和利益维护者。阿里科说：“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她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始终言辞尖锐，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这是法拉奇自我身份的准确定位。

法拉奇每次采访前都认真构想预案，准备工作细致而严谨。采访中她





认真精确记录现场的每句话和典型的场景，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转机深化内容，捕捉对方神情和对话中的蛛丝蚂迹，力图使自己的采访记具有纪实之美。她的采访多变无章，有时甚至可以称作特殊的谈话技巧：有时出其不意提出一些让人无法拒绝的问题，使对方应对不暇；有时旁敲侧击，引而不发，使对方不知不觉地掉进设下的圈套；有时在炮火般的问话中，让对方在急锋应对时，不经意流露出真实的想法。法拉奇在采访基辛格时，诱使基辛格发表了著名的“牛仔”言论，并因之饱受社会抨击，徒增“牛仔”之辱——这是法拉奇良好专业素养的体现。

法拉奇的采访，与其说是采访，毋宁称之为与各国重要政治领导人的角逐斗智。“权力，能使某些人意识到自己去指挥别人或惩罚不从者。我不理解权力，却理解那些反对、谴责，和拒绝接受权力的人，特别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法拉奇不仅如是说，而且向往绝对自由，极端藐视权威和权力，认为那些领袖和将军们手中的权力大都是不人道和可憎的。所以，她采访这些人物时，才能抛出尖锐甚至尖刻的问题，不为尊者所讳，令对方头疼不已。她在采访中常常与采访对象争论起来，把提问变成正面攻击——这是法拉奇采访成功之底蕴。

歌德说过：“人格和坚定性”比“聪明博学”更重要。法拉奇拥有桀骜不驯的个性和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她不仅以言辞雄辩的新闻个性而著称，更以坚定的人生信念，以民主、自由和平等为自己的信仰，而获得广大的认同，不卑不亢的采访风格在这里只是她坚定信念的一种外在形式，一篇篇独树一帜的政治访问记无一不贯穿着这样的原则——这是法拉奇放射出的最宝贵的精神力量：挑战权力，拒绝谄媚。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时候，谈到妇女不能上学、工作，甚至去海滩不能穿泳衣时，她似有戏谑地问：“可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



霍梅尼比他的肖像更高大。

面对中东强人、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法拉奇不惧强权，同样尖锐过人。当卡扎菲高傲地说“我是福音”时，她不屑地打断并质问他：“停住，你说什么？你信真主吗？”卡扎菲不明白她的话，又问：“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法拉奇说：“噢，我以为你就是真主！”卡扎菲被气得像发怒的狮子哇哇大叫，吓得在场的摄影师和翻译人员都有些发抖，而法拉奇镇定自若，正襟危坐。卡扎菲这个北非沙漠中的“猛虎”此时也泄气了，只好跌坐在沙发上，气呼呼地继续接受采访。

从《风云人物采访记》中，不难看出所有的采访无一不是围绕着

“这不关您的事，我们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马上就对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扔在霍梅尼脚下。霍梅尼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地冲出房间。

她长坐不起，连霍梅尼的儿子企求也没用，直到霍梅尼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她才同意离去。





法拉奇设计的轨迹进行，她如同中国的皮影戏艺人，在采访中自如地指挥调度着各路精英，在舞台上表演正反戏。“你就像一头愤怒的公牛！”西班牙最著名的斗牛士对她说：“你提出的问题就像那些牛角对着我一样。”

法拉奇以进攻的个性式采访直掘真相，表现了难得的勇气与独立人格，使自己的爱与恨表现到极至，虽然有时她持绝对主义的观点，过于偏执，而影响了她对客观事物的理性判断，但这种纯个性的风格掩盖了她的视觉误差，偏执在这里等同于淋漓尽致。偏执常常恰到好处地把问题廓清到极限，更能使人明确利害而趋同。

3. 激情冲荡的感情张力

法拉奇以极大的勇气，渲染自己的激情，身体力行自己的坚定信仰。从20世纪的越南战争到本世纪的海湾战争，在跨世纪的一次次采访中，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法拉奇的感情张力。每个具有正常心智的人都会被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那种激情、真诚与正直的力量所震撼和感染。

她采访以色列的沙龙时，指控他轰炸平民。“我经历了这个时代的所有战争，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在顺化或河内，我也没有见过像在贝鲁特发生的那么惨无人道的轰炸”。

沙龙抗辩说，他的军队只轰炸了该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地。

她又正词严：“您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轰炸了闹市区，有住宅、医院、报社、旅馆和大使馆！”

当沙龙为是否轰炸伤及儿童而迟疑不决的时候，法拉奇拉开皮包，取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群从1岁到5岁的儿童的尸体！

“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这只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戎马沙场、驰骋政坛，法拉奇当年曾对他进行了翔实的采访，并当面怒称他为杀害阿拉伯人的“刽子手”。

无助的手张开着，在企求怜悯！”

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时对她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来那么多资料，从来没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法拉奇表示自己的工作从来都是感情的冲动，而不是为了名利。“我永远不会为钱写作。”她坦承自己的写作动机源于心理上、政治上、知识上的强烈情感趋动。她说，“比如关于越战的书，对我来讲，它其实不是关于越战的，而是关于战争本身（我一直感兴趣战争的无意义、愚蠢和残酷）；关于堕胎的书《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是源于我自己失去的一个孩子。而《一个真正的人》的写作是源于我的伴侣的去世以及他所带来的悲痛。”





法拉奇聪颖睿智，爱恨交加，充满了激情。她游移、刁顽的目光中，闪现着伟大的文明精神。她是世界上极具争议的著名新闻工作者。

法拉奇的新闻作品能让人感受到她独有的胆识和气魄，领会到她敏锐的嗅觉和浓厚的感情。同样，她的文学性作品中丰富的感情色彩充斥于审美意识中，无时不在感动人、说服人、让人为之折服，激发起人们对于人类未来美好与公正生活的向往。正如阿里科所说：“法拉奇把自己造就成了明星，她是现代神话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犹如当年的格瓦拉、海明威一样，贴上了鲜明的时代标注。

明星的产生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既要有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也要有客观的条件机遇。法拉奇的人生经历常人无法企及。她出生在一个拥有反叛精神的家庭。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父亲爱德华多是一名自由主义者，投身反抗墨索里尼的统治，并因此被捕、遭受折磨。在家庭的启蒙和影响下，法拉奇10岁时就加入抵抗组织，为抵抗组织运送爆炸物、传递情报，还负责护送越狱的英军和美军战俘到安全区。这个当时梳着两个小辫，看上去纯真无比的女孩，亲历严酷的二战，领略了苦难和坚强。后来她任多家报刊战地记者，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光彩只有在荒凉背景下才能更显夺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恶劣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蓬勃生气，一俟合适的环境衬托就会成为美德。宝贵和丰富的经历，加之高度职业化的历练，塑造出了交相辉映的法拉奇。

《风云人物采访记》确立了法拉奇“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地位。她的大多数访问磁带被珍藏在波士顿大学的图书馆里。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起，美国许多大学新闻系的教授们必以《风云人物采访记》为教材，向学生们传授法拉奇的写作风格和采访技巧。

《华盛顿邮报》把此书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

《滚石》杂志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文集”。





意大利的古老文化，滋养了法拉奇在新闻写作领域富有创造性的灵气。

《花花公子》杂志也忍不住评论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记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

在采访世界风云人物的过程中，法拉奇本人也成为神话般的人物，她的一次次采访是制造神话的某种发展过程，并赢得了全世界同行的敬佩。在公众的心目中，她的经历近乎神话，而她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在不断地重塑和强化着这个神话，凸现着一个为追求真理与自由而正直无私、不惧死亡的新闻工作者形象。随着对“法拉奇明星现象”的理性阅读，我们将体会到，明星就是这般地造天成的。



第七章

为文学撕扯的记者心灵

新闻的视点让法拉奇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和剥离事物，赋予作品更深的穿透力。

文学的底蕴为她拓展了广阔的表现空间，使她的作品展现出了许多记者“写不出”的东西。

她从小博览群书，梦想当一名世界闻名的作家，现实却使她选择了记者的职业，她成了锋芒毕露、喜欢主宰的“法拉奇”。于是，她几乎在每一部作品中都交替抡着新闻和文学的“杀手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独特的“两栖”人：既是新闻工作者又是文学巨匠，是隐身于新闻工作者队伍中的作家。





1. 新闻和文学的“杀手锏”

法拉奇是著名的记者，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她在风云舞台上，挥舞着新闻和文学两个“杀手锏”，使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都蜚声世界，成为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在这颗明星的强大光晕下，人们难以在她的作品中区分新闻和文学之分野。

新闻的视点让法拉奇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和剥离事物，赋予作品更深的穿透力。文学的丰富底蕴为她拓展了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使她的作品展现出了许多记者“写不出”的东西。

法拉奇的新闻作品有着鲜明的欧洲新闻写作风格，也受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新闻学流派——新新闻主义的影响。新新闻学流派倡导新闻要提供比事实更重要的东西，即写作的风格与质量，使受众在阅读新闻时不仅获得事实，更重要的是获得阅读时的审美愉悦。分析法拉奇的新闻实践，她是一位新新闻主义理论的践行者，强调新闻不仅要关注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和焦点人物，更要显示作家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使文章中浸染自己的风格和气息。

这种新闻观深深地渗透到了法拉奇的新闻实践中，加之她有着极好的语言天赋，十几岁就掌握了三门外语，并苦心钻研历史和哲学文献，熟读康德、托尔斯泰等大师的著作，使她得心应手地运用文学技巧布局谋篇，许多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学审美。



法拉奇深沉的目光凝视世界。

用场景、画面组合的横向和纵向结构，叙述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使报道过程生动、曲折而有波澜。这种方法避免了新闻报道中常用的依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过程的先后顺序，用所谓新闻几要素来安排结构的呆板套式。场景描写是法拉奇新闻作品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拉奇在对事件的叙述中，常常借用摄影技巧，将一个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画面剪接、串联、组合起来，这种视觉场景的建立，加上多种叙述和意识流的方法，生动地展现了报道对象和主题，使报道富有活力。

在《离开沙岬岛的擦鞋男孩得到了新生》一文中，把不同画面安排在同一场景里的技巧，得到了充分展示。文中写一位被指控谋杀和抢劫了贵族的罪犯：“他穿着一件格子花呢夹克和一条灰色裤子，有一种不为人注意的优雅和高贵。他一边抽烟一边读报。不远的板凳上放着一个盛满茶水的保温瓶。听到我从小窗户的那边对他说：‘晚上好’时，那个长条身影像军人一样敏捷地跳起来，把手中的报纸和香烟扔在了一边，然后扬起脸看着带栅栏的窗。这是一张奇异的禁欲的脸：双颊下陷，两眼深黑，一脸靡菲斯特的黑色络腮短胡，直长到耳垂下面。这张脸看上去像个逗号，逗号的中间带有表情”。作者剪接了一个个画面，将他们串接起来，使作品产生了一连串电影画面定格的效果。同时，运用意识流手法及细描的技巧，使作品中呈现出一个活动的连续场景，人物的形象、神态、动作跃然纸上。文章读起来像一篇情节生动、故事曲折的小说，人物栩栩如生，富有趣味性、幽默感。新闻作品中的文学因素彰显法拉奇的报道与众不同，独具审美特征。

用文学描写的手法构思新闻。法拉奇善于用拟人、夸张、比喻的形式，穿插背景和细节，制造出像短篇小说一样的新闻作品，使人领略到浓郁的文学韵味。在一篇描写佛罗伦萨野鸽的作品里，法拉奇运用拟人的手法对领头鸽进行了描绘：“它是只令人肃然起敬的鸽子，在修道院





单调乏味的生活，始终保持着高贵的姿态；日落时分，当晚祷的钟声响起，佛罗伦萨所有的野鸽都去向它朝觐。”当人们为了保护佛罗伦萨的户外艺术品，决定实施灭鸽计划时，野鸽群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它们带着弃儿的悲伤神情，行动驯服，步履卑微……它们像退伍军人一样警觉清醒，像靠救济金度日的市民一样贫困潦倒，像一家之父一样忧心忡忡。它们很清楚自己肩上担负着悲惨和不公正的命运。”法拉奇笔下的野鸽形同有血有肉的人。生动的细节描写，透射出人类的残忍。这种独特的视角，使作品更加细腻逼真。



法拉奇的部分作品封面。

叙述与议论结合，融作者的思想、观点、风格和气息于报道中。法拉奇把写文章当作供自己表演的舞台，在叙述中掺杂着丰富的个人感受，在不牺牲准确性原则基础上，尽情行使了对材料增删取舍的自由。比如，她对基辛格的描写是这样的：“我发现他毫无诱人之处：粗壮的矮个子，顶着一个羚羊般的大脑袋。”对英迪拉·甘地的描写：“她的相貌是动人的。她有一双淡褐色的略带忧伤的美丽的眼睛，脸上挂着一丝奇妙的、高深莫测的，能引起人们好奇的微笑。”从中可看出法拉奇

对这两个人物的不同态度与观点。法拉奇的新闻作品是个人的思想、观点、气质、情感、风格的混合物。深刻的思想、过人的睿智使作品更具穿透力。

善于使用新闻作品中鲜见的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第一人称的亲历式报道完成作品。她将个人经历的点滴细节插入作品，以对话的形式，或面对面的叙述方式，宣泄自己的个人感受和判断，以真实性和亲切感获得读者的信任。在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法拉奇本人既是事件的亲历者同时也是讲述者，其作品相当于亲历者与读者“面对面”的讲述和聆听。在报道战争的作品中，法拉奇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自己的危险经历，大量使用子弹、呼啸、叫喊、受伤、鲜血、浸泡等字眼，使人如临其境，感同身受。

文学手法的广泛运用，使法拉奇的新闻作品独具个性风格。她的文学创作经验锤炼并丰富了她的新闻表现技巧，使她能够用思想者的眼光洞察世界，用文学的手法表现世界。虽然法拉奇有时对新闻与文学之间“度”的掌握并不全部适当，有时以文学手法冲淡了对事物本来面貌的反映，以法拉奇式的真实来展现生活的真实，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

2. 新闻界借去的作家

法拉奇开始悄悄向一些报刊投稿并频频发表时，就觉得自己生来就该担当记者，置身于社会时局之中，发出自己呐喊的声音。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尽管她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却对作家的敬佩和向往与日俱增。她多次对人说，不愿意把自己仅仅看成是一个新闻记者，而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甚至在暗地里的自我陶醉时，把自己划入世界文学大师的行列。因为创作典范式的纯文学作





品，已成为她心中持久的梦想。

她博览群书，立志当一名世界闻名的作家，这个自我认同的“心结”牢牢地埋在她的心中。可缘于种种原因，她不能抵达彼岸，现实迫使她选择了记者的职业，成为一个锋芒毕露、热衷驾驭世界风云的“法拉奇”。于是，她几乎在每一篇作品中，都不断变换着角色呈现在读者面前，她既是新闻工作者又是文学家，是隐身于新闻工作者队伍中的作家。

法拉奇希望自己成为一位严肃的作家，即使在从事新闻工作时，尽可能寻求向作家角色的突破。这种突破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取自一种生命冲动，欲求冲破内心的束缚，完成内心世界中快意的表达。正如法拉奇自己所说：“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把自己当作一架只是机械地记录所见所闻的机器。”

对法拉奇而言，以作家为自我实现的人生目标，使她产生了无数外在和内心的矛盾，其作品成为各种冲突和矛盾的症结点。她的一生始终处于两者无尽的撕扯中。

《风云人物采访记》出版后，法拉奇声名大噪。但当人们同她谈起这本书时，法拉奇却并不为动，甚至有些反感：“请不要把我的工作和我的本性都放在专访这个框子里。专访只不过是我的工作的一小部分，只是我人生的一瞬。”

她强调：“当我采访第一个首脑要人时，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我的采访对象很多是看了我的书知道我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后才接受我的采访的。采访名人首先是对一个作家写作上的挑战，而不仅仅是记者职业的挑战。采访工作始终是我全部工作的一部分。我从小就沉湎于小说创作，至今也是文学创作的动力在吸引我、支撑我。特别是当我生病时，我发现我更爱生活，每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朋友的每一丝微

笑，都给我的生活和文学创作带来灵感。近年来我开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回首我的人生，我认为我不是靠采访名人才成为名人的。”

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新闻采访只是她全部工作的一部分，记者身份也只是生命的诸多符号中的一个。与记者相比，她更在意自己的作家身份。采访政界要人的成功，依靠的是自己作为作家的作品、才能和声望。采访名人不仅是对记者职业的挑战，更是对一个作家写作能力上的挑战。文学成为她安身立命的根本，只有在文学中，她才能获得自我认同。



法拉奇保持着她一生不变的嗜好。

法拉奇完全明白记者和文学之间的区别，她拥有小说家特有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在报道写作中的运用是她的文章具有特别引力的原因。而新闻不仅束缚她的想象力，也束缚了她的自我表达和宣泄，即新闻对她的生命冲动造成了压抑，使她只能将其提炼而出的思想传达给读者。法拉奇说：“记者必须尊重事实，结果文学冲动就被束缚在新闻原则的紧身衣里。”法拉奇认为，只





有文学才是自己穿的“鞋”，能够走出自我，走向生命的冲动，从而感到身心的满足和舒畅。

法拉奇说，她“喜欢讲自己如何将整部作品重写了三次，如何每天坚持工作10到12个小时，甚至周末、圣诞节和复活节都不休息的经历”，“在书中，她抓住每一个机会透露和评价自己所受的身心折磨”。在这里，她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已经摆脱了记者身份的作家，“跻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狄更斯之列。”她渴望自己的艺术形象是“富有教养的20世纪的小说家”。



铿锵玫瑰：以铿锵著称，以玫瑰流芳。

法拉奇有一段引用率很高的自述：

“要想理解我的情况，就必须想一想吉卜林、杰克·伦敦和海明威这样的人。他们的职业是记者，但是与其说他们是记者，不如说他们是新闻界借去的作家。看看吉卜林从印度发出的通讯吧。可怜的吉卜林，

他必须完成新闻采写任务。但他却把新闻稿写成了一篇故事。他看到了记者看不到的东西。”

这段话意在说明，法拉奇与吉卜林、杰克·伦敦和海明威一样，都是著名作家，是“新闻界借去的作家”，具有“文学的眼光”，“看到了记者看不到的东西”。法拉奇与他们有太多的相似，理应相提并论。

耐人寻味并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一位高产作家和记者，法拉奇却不喜欢书评作者，称书评家是“失败的作家，结果唯有艳羨和嫉妒作家”。在她看来，用一篇小的文章对一个花了几年心血创作的大部头作品评头论足是不公平的，真正的评论家应该是读者。她也不关心评论家如何评论她的作品。她说：“一个作家需要时间来检验他的价值。生活中的成功对作家来讲毫无价值，那仅仅是时髦、宣传和知名度。一个真正的作家生前身后都应该只是个作家，其作品也应该是超越语言界限的，是全球性的，超越时空的。”

3. 双性气质的绝妙统一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坚强和柔弱、强硬和温柔，不仅作为性格的两面统一于一体，也作为人的基本需求而融于一身，不论某一方面表现得多么突出，另一方面表现得多么隐而不露。法拉奇给人们的印象大都是强悍和坚硬，但她温柔和内向的潜质，仍可从她充满文学性的作品中集中而突出地释放出来。

在《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中，她写道：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你已存在：为了战胜虚无，一个生命降临到世界。当时，我睁开眼睛躺在黑暗中，我蓦然确信你就在那里……当你再次撞击我时，无限的惊奇便在我的心中涌起，我感到像掉进了一口深井……这是对你的恐惧，对突然把你从虚无中抛出，让你附着在我身上





的这件事情的恐惧。我从不曾急切地期望着你的来临，尽管我知道你终会诞生于某一时刻。我在这种意识中，一直在久久地等待着你。但我仍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可怕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哪怕是点一点头，使用一种暗示。我的母亲就曾这样要求我给她暗示，这也就是她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理由。”

在《男子汉》中，她以第二人称的形式自我描述：

“夜幕降临，你开始感到倦意。你竭力把自己一分为二：一面是因这些沉思而感到痛苦，另一面是因自豪地把生死置之度外而高兴，这两方面都在耗费着你的精力。手铐重压在你身上，你抬不起腿，睁不开眼，困倦无比……”

她的叙述充满柔情，舒缓而伤感。这种叙述语气贯穿整部作品，形成了故事主体中的汨汨潜流，显示出与新闻报道完全不同的语调和情绪，表现了法拉奇某种压抑、内向的女性柔情，充分展示了她身上具有的双性气质。

法拉奇的作品中，大都以“你—我”的对话模式展开小说的叙述。这种“倾诉模式”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也不同于“我”隐退在文章后面的叙述。在上述两段引文中，前者的倾听者是自己未出生的孩子，后者的倾听者是已死去的情人。这种倾诉形式，多为女性使用的一种模式。德国著名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在他的著作《我与你》中指出，人之间有两个主要关系，“我—它”和“我—你”。前者称为“客观的经验”，后者称为“相逢的关系”。“相逢的关系”更能使“我”表达自己。法拉奇的这种表达，是自我表现、自我认同的需要，也是释缓压抑，放飞内心的需要。在这种表达和释放中，她找到了自己“诗意的栖居之所”。一位外国哲学家说过，一个人的思维能力表现在他能够容纳两种对立思想的能力。从哲学上解释，就是说能够把矛盾对立的双

方加以综合的能力。事物的两极扩展得越远而又处于一个统一体中，那么就愈能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生命力或能量。一个交响乐队，能演奏频率很高的音调，也能演奏很低的音调，而不仅只演奏中频，那么这个乐队是优秀的。如果能听几十赫的低音，也能听上万赫的高音，那么这个耳朵的功能即为神奇。一个桥梁跨度大了，才能称为大桥。法拉奇身上就有着这种“大跨度”的特点。

她把新闻和文学成功地衔接在一起，各取所需，应用自如。有时短兵相接，有时曲径迂回，有时设伏打围，进退自有章法，表现了天马行空般的思维素质。





第八章

神话背后的傲慢与偏见

有一位记者问美国某新闻巨头：“新闻媒体有没有偏见？”对方反问道：“地球是不是圆的？”

法拉奇虽然宣称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其作品被誉为“20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但她毕竟有着某种偏见和局限。

阶级本能的偏见，使她不能在所有事情上客观公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她常以失衡的价值观去评判他人。

作为世界新闻界的“强人”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法拉奇被一些人称为“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也有一些人认为她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鼓手。

1. 阶级立场的歧见

只要生存在利益趋动的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正像恩格斯所说，每个人都要受到三种限制：一是时代的局限，二是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限制，三是思维能力、智商的限制。作为时政类新闻记者，法拉奇有着鲜明而坚定的阶级立场。这种立场派生了她的许多偏见，有时新闻的客观真实、全面公正等职业原则和操守，被她义无反顾地抛置在自己的情感之后。



波兰首都华沙，始终保持着老城和新城的布局，宏伟的宫殿、城堡，高大的教堂箭楼，一览无余。

波兰曾是20世纪东西方冷战的一个交汇点。在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作为持不同意见者，起身和执政的波兰共产党叫板时，法拉奇应时对瓦文萨进行了采访。老实说，法拉奇对瓦文萨在采访中的表现很不满意，本能地感受到瓦文萨傲慢、无知且充满攻击性，对她也没有应有的尊重。她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不为之骄傲的





采访，这也是我第一次不够真诚。”她在把录音带上的内容转写成文字稿时，感到左右为难：

“我该不该写下真实的瓦文萨，说他是教堂的傀儡，为人傲慢、无知，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帮了俄国人和波兰共产党一个忙，因为他们想击垮他和团结工会。要么我应该像别人一样说瓦文萨是个好人，为波兰民主的诞生倾尽绵薄之力？”

思考的结果是，出于维护西方所谓民主的立场，为了无碍于波兰建立“自由社会”，法拉奇摒弃了自己的真实观点，公开发表在杂志上的采访记里找不到丝毫贬低瓦文萨的记录，甚至有违当时的真实情况和言论。这种违心的话语权，不应该属于法拉奇，这是其阶级本能和偏见的不自然的反应。后来，她对共产党人、波兰副总理拉科夫斯基的采访记，更证实了她对共产党人的仇视与偏见，以至使她再次抛弃了她宣称的公正原则。

法拉奇对拉科夫斯基的印象不错：“他看上去是个聪明人，是个开明的共产党人，是个像恩里科那样的民主的共产党人。”但是她对他的尊敬到采访记发表时就消失殆尽了，法拉奇在采访记的背景材料中写道：

“我本可以对他更宽容些的，但政治考虑再次左右了我。他是共产党员拉科夫斯基。我不能信任他。”

法拉奇不肯让自己所写的文章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材料，殊不知，她的文章使她成为了另一方政治的宣传工具。

1969年，法拉奇造访越南领袖、被称为“常胜将军”的武元甲。怀着对美国在军事上受挫的懊丧，法拉奇仿佛不甘心美国在军事上的失败以及南越阮文绍军队的无能，在采访记中着力为美国和南越鼓气，并不失时机地攻击北越，甚至对武元甲将军的相貌评头论足，进行刻薄的描写：

“他的脸颊臃肿，布满青筋，从而使面容成绛紫色，这不是一张惹人喜爱的脸。”“他那令人兴味索然的面目：大嘴巴、小牙齿，扁耳朵、大鼻子，一头黑发几乎罩往了半个脑袋，前额消失在黑发中……”

“他的两只小手臂不停地挥动着，表现了一个自吹自擂者的得意神态。”

法拉奇这样毫无掩饰地任意挥洒对采访对象的情感，完全缘于她某种思想观点和政治情绪。比如，在采访基辛格时，她被对方的态度和语言所激怒，此时谈及武元甲，是作为基辛格的对立人物而存在，所以武元甲就成为了比基辛格讨人喜欢的人，她甚至在对话中对武元甲多有褒义，这又显示出了法拉奇行文的游移和不确定性。

2. 东西方文明的价值偏差

法拉奇的出身背景和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她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阿拉伯国家时有敌视与不公。

在法拉奇的采访记中，她随意用“恐怖分子”的字眼称呼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创始人和领导人，讽刺伊朗人穿着“中世纪的长袍”。这种对阿拉伯文化的不理解和不尊重，同法拉奇西方文明的优越心态相结合，带来其心理天平的倾斜。在比较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后，她甚至得出结论：“我伟大的阿拉法特先生，你的祖先，除了几个漂亮的假面具和一本他们一直都在摧毁我鲜明个性的书，他们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

对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最为著名的领导人物阿拉法特，西方媒体对他进行了大量的片面宣传。法拉奇作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代言人，在1972年见到了阿拉法特并进行采访后，在前言中不无偏见地写道：“我早就料到，采访阿拉法特绝不会得到足以使人难忘的收获，更不可能获





得有关他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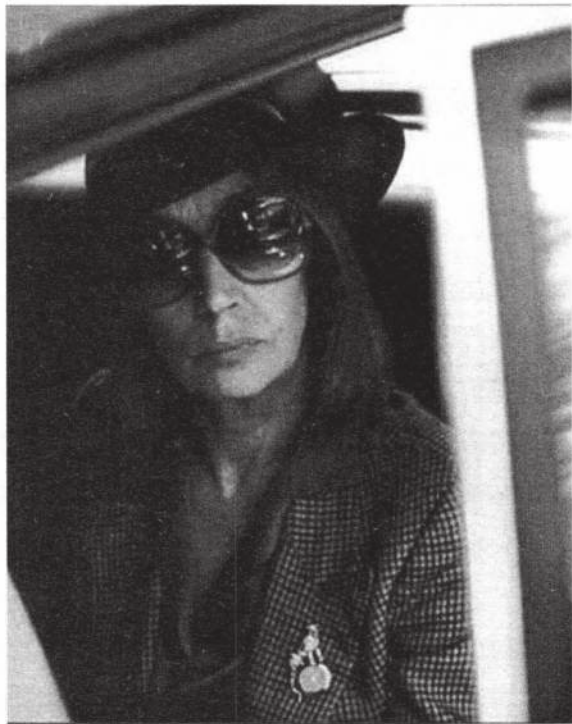
“一个相信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不再相信战争的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是何等的艰难。当然，还因为这后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厌恶仇恨，而前者则信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准则。实际上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现。”

这个“受到基督教熏陶的、厌恶仇恨”的文明的欧洲人是怎样表现对方的呢？在前言中，法拉奇对阿拉法特的描写就多有藐视：

“第一眼看上去，他并不像一个掌权者或是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人……”

“他身材矮小……连手和脚都很小：太小了。几乎难以支撑住他那粗壮的双腿和那由宽大的臀部、多脂肪的腹部组成的肥硕身躯，在这五短身材之上是一个戴着头巾的小脑袋。”

会面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的，当时在场的有一位身材高挑、风度潇洒的保镖，法拉奇借此大做文章：“也许是因为阿拉法特无比自豪地把这个人带在身边，我更自然而然地想



有时狂飙激进，有时低沉保守，谁也不能把法拉奇的“脉”。

到这个美男子不仅仅是一名卫兵，拿我们的话说，是他的一位非常亲热的朋友。”

这是法拉奇对阿拉法特同性恋传闻的一种暗示。一方面表明了法拉奇采访中有失职业道德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阿拉伯国家偏见之深。

1973年10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地区产油国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展开以石油为武器的抗争，反对以色列和西方的支持者，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作为西方新闻记者的一员，法拉奇本能地仇视来自产油国的这场正义斗争，完全袒护西方的立场。1975年8月，法拉奇在吉达采访沙特的石油部长亚马尼，整个采访录就是法拉奇充满偏见的最好佐证。

在采访记前言中，她满怀仇视和偏见地写道：“这些新的米达斯国王，可以用我们在几年中付给他们的亿万美金买下整个世界，他们可以威胁、讹诈和凌辱我们。”

法：像1973年伊朗国王迫使您强加给我们的那次臭名昭著的涨价吗？

亚：……当你们的小麦、大米和食糖的价格涨了4倍，汽车的价格涨了2倍时，石油仍维持着40年代末期的价格，使我们继续遭受着剥削，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法：亚马尼，你们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到了使用代替性能源时，我们将不再需要你们。

当亚马尼谈到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困难时说：“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我们还缺水，我们……怎么说呢？”法拉奇幸灾乐祸，甚至是恶狠狠地来了一句：“像渴得要死的米达斯王？”在采访结束时，法拉奇仍意犹未尽：“很可惜，您的狡猾刻毒的微笑没有被我的录音机录





下来。”

法拉奇在中东采访的文章内容和篇数不菲，但她不经意间就流露出一种不恭和挑衅。她在伊朗裹着黑色大长巾，进入只允许穆斯林入内的清真寺内。在描写禁区内做祈祷的教徒时，她用讥诮的方式不客气地批评：“我以为他们在做瑞典式肌肉关节体操！”

晚年，她甚至在另一本书《理性的力量》中写道，伊斯兰教教义在充满爱的地方散播仇恨，在自由的土地上宣扬奴役。

意大利一位法官旋即要求法拉奇对其诽谤伊斯兰教的行为接受审讯，但是这桩官司始终没有被提交诉讼。

由法拉奇反伊斯兰教文章引发的轩然大波，并没有使她感到惊奇。在她的一生中不断引起东西方舆论的纷争，最终她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者之一，居住在西方的中心地区纽约。

3. 世界上从来没有精英

法拉奇认为“政治的本质是邪恶”。她在《风云人物采访记》中这样写道：“不管是专制政府（领导人）还是民选总统，无论是杀人如麻的将军还是深受爱戴的领袖，在我眼中，权力都是一种不人道、值得憎恨的现象……我总是对权力采取反抗的态度。”

她说：“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聪明，有远见，有韧力，他们只不过更能钻营，更有野心而已。”因为这种结论，所以她俯视和敌视一切权力和权威。

能够与法拉奇对话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时候，对话自然地走向碰撞和冲突，甚至干脆和被采访者争论起来，这个时候，采访俨然变成一场辩论会。这让那些受人之尊的政要们非常恼火，又百般无奈。此时的法拉奇“既令人恼怒又令人钦佩；既让人讨厌又叫人喜爱”，而她

从形形色色的对话中洞察对方斑驳混浊的灵魂隐秘，并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决定我们命运的并不比我们优秀。”进而她对一些并不出色的人，仍“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感到遗憾”。



“常胜将军”武元甲多次出现在法拉奇的采访记中。

遭遇法拉奇采访的人，大都会身不由己地被她引入一个由她控制的世界，只有被她牵着鼻子走而无其他选择。最后，许多被采访者都会为接受采访叫苦不迭，琢磨着能否把这段采访给删掉或“掐”了。所以，有家杂志这样评述：“在法拉奇采访的世界政要中，很少有人没被她伤害过。”

1971年，在采访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法拉奇诱使布托说了一句“印度总理甘地的智慧比不上她父亲尼赫鲁”，这句话无论对布托还是





温和和内向的潜质——法拉奇的中年之光。

对巴基斯坦都是灾难性的，刚刚结束战争的印巴两国正在进行和谈，这句话的广为传播，使刚复的甘地引为受辱，双方开始互不相让，从而葬送了谈判的光明前景。

当美国的基辛格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如日中天时，法拉奇心里却没有把他当成人物，故意刺激贬低他，说他完全被尼克松总统的影响盖住了。结果这位国际政治大师的自尊心被刺激得膨胀起来，狂言自己是一个“独自骑马领着一支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的“牛仔”，还承认越南战争“毫无意义”。这段言论还殃及了他与尼克松的亲密关系。

被法拉奇设下陷阱并中计的不乏其人。在采访当时的南越总统阮文绍时，法拉奇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

这句话勾起了阮文绍对童年的回忆，动情地诉说起小时候家庭生活的艰难。法拉奇话锋一转，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待阮文绍醒悟过来，已经晚矣。他不得不开出一份“谦虚”的家产清单，而从这份清单上，读者仍能嗅出阮文绍腐败的味道。



法拉奇有着丰富的人生履历，她领略了过多的痛苦和悲伤，从未停止向自己心灵深处的探寻。

法拉奇的采访有时会急于把自己的观点展现出来，丝毫不顾及被采访者的感受。她采访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时，讥讽其政治宣言“太小，无足轻重，简直可以放进我的粉扑里”。在采访拳王阿里时，阿里当着





她的面打了几个饱嗝，法拉奇就把录音机扔到他身上，扬长而去，并称阿里“像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傲慢”。

政治其实不过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普通领域，政治领袖们和其他各界的领军人物们，姑且也称之为领袖的人们，并无太大的区别，越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工逐渐明细的时候，越把他们融合在一起。汽车业巨头、石油大亨、钢铁大王们和政治家的素质就一定要有高下、尊卑之别吗？法拉奇对政治和政治家的偏见，恰恰说明了她对政治的一种误解和迷信，或者是由迷信而生发的心理逆反。

当有人指责法拉奇把她的采访当作对大人物的调查审问而失之偏颇时，法拉奇认为自己仅仅是问了一些其他记者没有勇气问的话。其他记者追求的是客观，而她追求的是“正确”和“诚实”。她承认自己不能够，也从未做到过对所见所闻仅仅做一个冷酷的记录者。她说：“在我每一段记者职业经历里，我都留下我的心和灵魂。我对所见所闻的参与是个人的，对于这些事件我必须采取立场。”她对《时代》周刊记者



1966年写作中的法拉奇。

说，“每一个采访都是我自己的一个肖像画，是我的想法、气质和耐性的混合物。所有这些导致了那些问题的提出。”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她的这种类似今天社会上“愤青”类的采访方法和内容。《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研究员安替就直言自己不喜欢法拉奇，声称对“愤青”类的作品没有兴趣。安替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人批评她的采访风格，指责她“不仅想做一个出色的采访人，更想做一个救世天使”。法拉奇回应说，在记录这些事件时，她不仅仅是一个记者，也是历史学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拉奇的传记作家阿里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法拉奇之法为法拉奇立传。他在写作《女人与神话——法拉奇传》伊始，遭到了法拉奇的诸多限制。法拉奇亲自拟定提纲，筛选资料，在审稿时，把所有不利于自己形象的部分尽情删除，并当面烧掉那些被她删掉的部分，唯恐他日后私自使用。阿里科气愤至极，心想：你在稿件发表之前从不让被采访者过目，我何尝不能？他未经法拉奇授权，就把书稿交付出版商，并用多种文字出版。全书的本质意义是讲解了一个意大利女人如何掏空心思，构造自己神话的故事！

4. 对女性政治家的例外推崇

法拉奇的偏见不仅存在于政治立场的分野上，还表现于对不同性别的政治家截然不同的态度。尽管法拉奇对自己被归入女作家的行列气愤不已，宣称她厌恶女权主义者，但这丝毫不妨碍法拉奇过着一种解放的生活，并在作品中体现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与倾向。

女权主义的立场以及对女性政治家的偏袒，是法拉奇在许多采访中的鲜明色彩，这使她采访的公正性颇受质疑。

在她的采访中，男性政治家往往处境尴尬，形象多有不佳。她用尖





叫和争吵从男性政治家那里获取更多的事实与真相。而对女性政治家则不然，她和采访对象往往会亲密有加，给人一种温馨和充满爱意的印象。

1972年法拉奇在耶路撒冷对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的采访持续了14个小时。对这位有“中东铁娘子”、内阁中“男人”之称的梅厄，法拉奇心里几多佩服，如同“一见钟情”。甚至由这位狂热的女政治家身上，联想起自己的母亲，情不自禁地写道：

“她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代表这样一类妇女：她们平易近人，谦虚；她们从自己充满痛苦、烦恼和辛劳的丰富阅历中汲取了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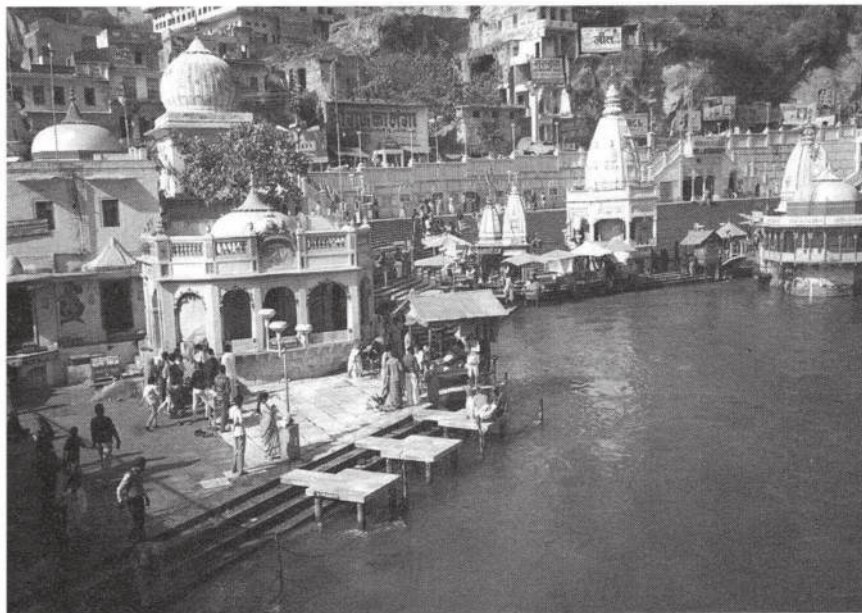
批评家们认为梅厄长得丑，常给她画讽刺画，但法拉奇却认为梅厄是个慈祥的老太太，而且是“百分之百的淑女。”

法拉奇对同为女性，性格与自己有某种类似的梅厄夫人的脉脉温情，使得这次采访有失公正原则，她甚至没有向梅厄问及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问题。

同样的偏爱也发生在当时印度总理甘地夫人身上。对于这个1971年在苏联支持下，赢得对巴基斯坦战争的印度女总理，法拉奇推崇有加，与对巴基斯坦布托先生的嘲讽形成了鲜明对照。

法拉奇何以对女性政治家如此宽容和推崇呢？我们可以从日本著名记者下村满子对法拉奇的专访《人生每天都是壮丽的冒险》中，求得其解。

法拉奇说，“我认为政治本来是女性的工作，女性可以比男性干得更漂亮。这是出于非常简单的历史和社会学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女性管理，指挥家庭的一切，而在治理政府这件事，实际上同指挥一个大家庭没有什么两样。对于女性来讲，可以说是她们另一个拿手的领域。我坚信不疑本质上女性比男性贤明。”



美丽而迷人的印度城镇留下了法拉奇探访的足迹。

作为在国际政治、外交和新闻界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法拉奇一个个地遭遇巨人，并且一个个地战胜他们。在她的心目中，这是否是一个女性代表与男性部族的角逐对抗呢？

虽然有些女性读者认为法拉奇显得有些“怪异”，但在大多数公众的心目中，她凸现着一个为追求真理与自由而不惧死亡、正直无私的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形象。或许，勇敢、坚韧再加上傲慢与偏见才是真实的法拉奇。





第九章

散步也揣着炸弹的情人

那个叫阿莱科斯的脸上印有疤痕的希腊男人，迈着坚定的步子出现了。他的眼里闪着奇异的光泽，手里拿着一大束玫瑰。见过无数大场面、大人物的法拉奇顿生紧张。一种爱情的恐惧感如触电般地掠过了她的心头。

法拉奇和她的采访对象阿莱科斯闪电般地相爱并结合，惊动了西方世界。从此，她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位视死如归的激情斗士连结在一起。

阿莱科斯37岁时死于非命。久久地跪在亡夫冰冷、僵直并残存血迹的遗体前，法拉奇总感到有一种不真实的恍惚。她的耳畔一遍遍地响过苏格拉底自尽前的一句名言：“该走了。咱们分道扬镳吧：我去死，你们去活，哪条路更好，只有上帝知道。”

1. 乱世情殇一沙鸥

法拉奇的目光很少关注女人自身的问题。其所思所想之深邃和久远，甚于男性。比如：历史究竟是由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创造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还是取决于个别人的意愿？她甚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审慎的辨析。但法拉奇的心中，从来没有熄灭所有的温情与蜜意。

1973年，在雅典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味的采访，使法拉奇经历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刻骨铭心的恋情。

希腊抵抗运动的领袖和政治活动家阿莱科斯因谋杀希腊军政府独裁者帕帕多普洛斯，被判处死刑，后被改为监禁。法拉奇供职的报社派员去采访他。法拉奇知道后，主动揽下了这桩事。于是，这个34岁、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男人，成为43岁的法拉奇亲自导演的爱情故事的男主角。

阿莱科斯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既是天才又是疯子的人物。他本质是个诗人，并把诗人的激情贯注于政治之中，厌烦和平安宁的生活，与偏执和危险为伍。没有斗争，他就会像缺乏阳光和水的树木那样枯萎。

法拉奇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如约而至。很快，那个叫阿莱科斯的脸上印有疤痕的希腊男人，迈着坚定的步子出现了。他的眼里闪着不容置疑的奇异光泽，一只手还拿着一大束玫瑰花。见过无数大场面、大人物的法拉奇忽然觉得有些紧张。一种爱情的恐惧感如触电般地掠过了她的心头。

在此之前，阿莱科斯与法拉奇从未谋面却神交已久，惺惺相惜。他蹲铁牢的时候，为了得到法拉奇的书，竟采取绝食斗争，最终以自己的几度昏迷赢得了胜利“果实”。而关于阿莱科斯的说法，法拉奇早有耳





闻。他为推翻独裁暴政被捕后，被囚禁在 1.5 米宽、3 米长的水泥牢房里。残酷的刑法，无休止的折磨，三天三夜等待执行死刑的来临……当军政权慑于国内外舆论而赦免他时，阿莱科斯不签字，不领情，轻蔑地向对方宣告“无论是罪名还是赦免都是你们强加的”！法拉奇知道，军政权仅仅为了不使阿莱科斯成为英雄，才没有枪毙他。而阿莱科斯被关在死牢的经历，使他视折磨为甜药。

法拉奇在发表的采访记的结尾，是这样几句话：

法拉奇：阿莱科斯，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

阿莱科斯：意味着有勇气，有尊严。意味着要相信人类。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还意味着斗争和胜利。你看呢？

法拉奇：阿莱科斯，我说人应该像你那样！

法拉奇在阿莱科斯出狱后，到他的家中和他做彻夜之谈。他们都不习惯和平安宁的生活，都把危险和死亡看成是生活的兴奋剂。共同的人生经历和性情，使两人相见恨晚。阿莱科斯把沉重的爱给了法拉奇，而法拉奇把阿莱科斯的英雄传奇推向了世界。

法拉奇和阿莱科斯闪电般地相爱并结合，惊动了整个西方社会。它再一次昭示着，什么也不能阻挡女人对爱情的追求。爱是女性之船永不降落的帆。

这件事的新闻价值能持续多久？它真的是个很浪漫的童话吗？阿莱科斯对法拉奇所付出的爱从不讳言：“我无意单纯追求爱情生活的欢乐，倘若只是寻求个人的欢乐，世上有不知其数的女人能满足我的欲望。”他渴求锥心刺骨的爱情，更需要风雨同舟的战友。法拉奇从此把命运与这位视死如归的激情斗士连在一起。

阿莱科斯作为英雄，以极顽强的毅力和勇气面对酷刑，宁死不屈，却无法解脱法拉奇独自在生活中的艰难，从不帮她分担生活的悲苦，却



罗马，世界著名的文化之都，哺育了众多的杰出历史人物。法拉奇和阿莱科斯曾居住在这个城市。

毫不珍惜法拉奇的付出。他困窘时，会埋怨责怪法拉奇，丢下一堆牢骚怨语；需要她时，甚至提出一小时内为他准备好一艘游艇的要求。他听到法拉奇怀孕的消息后，先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以嘶哑和结巴的声音和法拉奇商量，打胎的费用如何分摊，甚至建议两人各出一半。

这个和情人散步时口袋里也会揣着炸弹的冷漠男人，却始终是法拉奇的最爱。在陪伴阿莱科斯的日子里，法拉奇躲避追杀，防范偷袭，过着和这个男人一样的恐怖生活。她矛盾过，徘徊过，感叹“爱的锁链是自由最沉重的羁绊”，但仍坚定地选择和阿莱科斯为伍。





1976年5月1日，当局的一次预谋的车祸，为阿莱科斯年仅37岁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久久地跪在亡夫冰冷、僵直的残存血迹的遗体前，法拉奇“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总感到有一种不真实的恍惚。她的耳畔一遍一遍响过大哲人苏格拉底自尽前的一句名言：“该走了。咱们分道扬镳吧：我去死，你们去活，哪条路更好，只有上帝知道。”

2. 《男子汉》宣言

阿莱科斯死后，法拉奇在回忆和思念的情愫中，开始构思一部有关他的书。她要写出爱情与女性命运之间的关系，在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中，对人类的困境作出悲凉而哀婉的表达，同时体现爱情的历史感和时代气息。

她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我从来不接电话，甚至听不到电话的铃响。我写啊写，写啊写，与世隔绝，不吃饭，不谈话，不中断。”晚上她几乎不吃东西，每天60多根香烟几乎扼杀了她吃饭的欲望。“当我最终躺到了床上，总会遭受失眠的折磨。我无法停止思考。甚至沉睡中还会梦到那本书。”

历时三年多后，一部4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性文学作品《男子汉》终于问世。翌年，由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在她饱蘸激情的笔下，阿莱科斯又一次有血有肉地诞生了，像一尊别样风格的纪念碑，存于世间而永不毁灭。

这是一部有很强的纪实性和传记性风格的文学作品，按时间顺序叙述了她与这些希腊抵抗领袖之间长达三年的私人生活，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不乏作者的炽热爱情和对暴政的猛力批判——

主人公是抵抗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1967年8月，在袭击希腊军人政权总统帕帕多普洛斯的行动中被捕；



阿莱科斯：一张硬汉的脸，一腔热血的情。

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1973年，他被特赦出狱；两天后，法拉奇前往雅典对他进行采访，随即与他结为生活伴侣；1976年5月1日夜，刺客制造一起车祸，杀害了本书的主人公。作品以主人公阿莱科斯的生活和斗争经历为线索，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希腊人民为反对军人独裁政权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为读者展示了发生在希腊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由于作品完全以阿莱科斯的传奇性经历为题材，以政治敏感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捕捉重大的政治事件为创作背景和题材，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当代生活中曾经存在和发生的真人真事，使这部文学类的长篇作品尽显时政风格，像一面镜子，鲜





126

法拉奇向世界投不信任票

明、生动而又真实地映照出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极大地提升了全书的历史价值。



希腊首都雅典城的布拉卡商业街。这里建筑古色古香，云集着希腊风味的餐馆、酒吧，是法拉奇和阿莱科斯曾经光顾的地方。

法拉奇在描写阿莱科斯的坎坷生涯时，穿插的历史事件有：希腊军人政府的强权专制、对军人独裁者帕帕多普洛斯的刺杀、世界舆论对阿莱科斯的声援、希腊军政府为掩饰真相所下发的大赦令、发生在塞浦路斯的政变、希腊政府虚假的议会选举、谋杀帕纳古里斯。对希腊政治历史事件的真实描写为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创造了博大的空间，使主人公作为反叛战士的性格更加高大、突出。这些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也构成了主人公苦苦斗争的矛盾漩涡，在同邪恶势力的斗争中，主人公视死如归、拥抱死神的战士情怀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如果说女人是船，男人就是船上的桅杆。阿莱科斯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对军人独裁政权的斗争信念，对自己信

仰的追求，以及在遭受难以形容的非人折磨后仍不屈服的精神，都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抵抗运动战士的优秀品质。法拉奇对阿莱科斯形象的塑造无疑是十分成功的。身为阿莱科斯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法拉奇没有因个人的情感而放弃她的创作原则，没有把笔墨仅仅停留在对主人公英雄行为的渲染上，而是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做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剖析。

小说前半部分着重描写了他的勇敢、坚强和视死如归。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他性格中的另一个方面，即固执己见、孤傲不驯，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一一显露而出。他憎恨邪恶，却又主张宽容；不怕牺牲，却又留恋生活；渴望胜利，却崇拜死亡。他的性格时时处于矛盾之中，使人觉得他不是神灵，而是一个有缺点和错误的立体的人。在书的最后，作者介绍说，阿莱科斯在深受多年的打击后，有时也感觉自己已经衰老，被生活击败了。所以他不再企图潜入希腊组织地下活动，也不再去世界各地做徒劳无益的鼓动，有时甚至能冷静下来读书和思考问题……但这样的描写，并无损阿莱科斯的英雄形象，反倒使这一形象更趋完美和丰厚。

《男子汉》结构紧凑、激情充沛、情节跌宕，通篇充满了巨大的感情张力。书中的文字优美生动，散发出一种灼热的战士情怀。特别是作品始终以作者向主人公讲话的形式写成，有着独具的第二人称小说的特色，是作者的一部爱情史话和心灵自传。

法拉奇一生出版了3本小说，其中两本与一个男人有关。这本出版于1979年的纪实小说，两年中仅在意大利就销售了150万册，并获得意大利维莱吉奥文学奖。

3.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法拉奇和阿莱科斯同居后，他们的寓所时常受到政府便衣人员的





“光顾”。有一次甚至几天中，他们都在深夜用强光照射寓所的窗户，使两人的休息受到干扰。一次，阿莱科斯愤怒起身，叫喊着：“胆小鬼，有本事的出来，我来了！”起身要冲出门去。法拉奇在门口死死地拉住他，阿莱科斯急于甩开她，竟狠狠踢了正在怀孕中的法拉奇一脚。“啊，孩子！”法拉奇惊叫着。

法拉奇流产了，阿莱科斯被罪恶感笼罩着，连续几天没有回家。第四天他回家时，几乎变了样：两眼深陷，眼圈发黑，乱糟糟的胡子，浑身散发着酒气。法拉奇在这个人生的重大变故中，感受着特殊的凄苦生活。她一直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她深沉的母爱必然要倾诉笔端，于是，一本生动而充满女性情结的作品《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在次年面世了。这是法拉奇对自己未能出生的孩子的倾诉，是她唯一一次怀孕经历的悲喜记录。

这实则是一本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胎教”小说，有着时代背景和作者本人的明显烙印，纪实风格和小说想象自然映照。在这个未婚母亲和自己腹中胎儿的对话中，母亲向孩子无尽地诉说着自己的爱和恨、对痛苦的思索，对孩子缠绵悱恻的柔情和猜想。年轻的母亲经受着生理的痛苦、精神的折磨，但她充满了斗志，通过对肚子里孩子的诉说，借着喃喃自语汲取着勇气和力量。孩子就像她的朋友，她把自己对生与死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封面。

的怀疑、困惑向孩子和盘托出。

法拉奇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是她酝酿已久的作品，是她“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这颗精子”和“想象力这颗卵子”天然受孕的结果。该书的主题不仅涉及文学史上从未接触过的内容，即一个未婚母亲与她腹中胎儿的一段旷世未有的感情，而且涉及对人类生与死、爱与恨的深刻怀疑与痛苦思索。整部作品沉浸在时而低沉，时而舒缓，时而浓烈的感情里，随处可见诗化的语言、冷峻的思考。她寄予对孩子的希望：“我希望你具有上帝的特征，其次具有母亲的秉性，最后具有民族的特点。”

作者在书中写道：“我从不曾急切地期望着你的来临，尽管我知道你有一天终会存在于某一时刻。我在这种意识中，一直在久久地等待着你。但我仍向你提出了这样可怕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一天你会带着责备的心情冲着我大声哭喊：‘是谁赋予你权利，让我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什么？’孩子，生活就是这样一种艰难的尝试。”

“我恨‘爱’这个字眼，因为我在每一个地方，每一种语言中都能轻易找到它……我的确不知道我是否爱你。我不想通过爱来想你，我想用生命来想你。”

未出生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长的是个什么样子？法拉奇在猜测中期待着：

“如果你生为一个男人，我希望你成为那种我经常梦想的男子汉：对弱者赋予同情，对傲慢者给予轻蔑；对那些爱你的人抱以宽宏大量的气度，与那些想支配你的做殊死的斗争……我只要求你充分利用生命诞生的那种神奇优势，而决不应屈从于人生的懦弱……你绝不应该回避冒险：即使在恐惧使你退缩的时候也是如此。要知道来到这个世界，这本身就是一场冒险。一场过后你会为你生命的诞生甚感懊恼的冒险。”





法拉奇的笑靥充溢着女性鲜活的魅力。

女人怀孕后能否合法地做母亲，要取决于和她相关的男性。想无视男性的反对成为单身母亲，即使是激进和坚强的法拉奇，也无法回避社会偏见带来的压力、痛苦和孤独：

“我无法理解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当一个女人对别人说，她是合法受

孕时，每个人都会对她关怀备至……然而对我，他们却沉默不语、冷冷清清，要不就尽说些有关流产、堕胎的话。我把这称为阴谋，一桩意在让我们分离的谋划。”

也许是害怕面对母亲向她所描述的冷漠和残酷的世界、无法承载母亲过多的期望，或者不想再被父亲伤害，法拉奇怀中的孩子终于拒绝了母亲而无声无息地离去，和孩子相依为命的生活骤然中止，使法拉奇陷入极度痛苦。她从医院强撑回家，倒在床上不断地呻吟着，从内心的深处，迸发出一声声悲鸣。法拉奇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主题是死亡：没有后代而死等于死了两次，就像无花的植物、无果的树木一样可怕，这意味着永远的死亡。

在书的最后，主人公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濒临弥留之际，法拉奇这样写到：

“灯亮了，我听到了声音。有人在奔跑，在绝望地呼号。然而在另外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出生，成千上万的妇女成为母亲：生命并不止于你和我。你死了，我恐怕也要死去。但这无关紧要。因为生命没有死去，它存在，生命存在着。”

当曾经的生命消散成过往，法拉奇收到孩子父亲的一封信：

“我是来祝贺你，来告诉你，你赢了。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你摆脱了妊娠和分娩的奴役，而是因为你成功地挺住了他人的意志，包括上帝的意志。在我刚好相反……上帝是一个惊叹号，它把所有破碎的细片重新缀合在一起：一个人如果开始皈依上帝，就表明他慵倦了，再无力自恃。你还没有慵倦，因为你是怀疑的精灵。上帝在你心中是一个问号，甚至是无穷无尽问号中的一个。唯有那用问号来折磨自己的人，才能前进；唯有那些不屑于信仰上帝慰藉的人，才能重新开始：再次否定自己，再次推翻自己，再次把自己交给悲苦和悔恨。”





从这样一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能读出什么眉目呢？法拉奇在《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题记里说，“把这本书献给：那些不畏惧困惑的人、那些不知为何要以痛苦和死亡为代价来摆脱疲惫的人、那些把自己置于给予生命还是舍弃生命两难处境的人。”我们没有办法不折服于一个女人面对生命疑惑不解，仍然以一种积极的、永不言败的姿态对待命运的勇气和超人的生命力。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是社会现实、心灵忏悔与虚构故事的混合物。法拉奇的柔肠百转、缠绵悱恻都注入《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里面了。未出生的孩子，是她与阿莱科斯的爱情结晶。尽管男方一度说这是两个人的错误，但法拉奇的坚强母爱，阿莱科斯的心灵重创，使人仍然感到这个未曾出世的孩子是幸福的。

从时间顺序上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之前的法拉奇始终是一种强大、刚毅、坚韧的形象。《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之中的法拉奇，则第一次表现出她性格中的另一面：一个儿女情长、柔情似水的法拉奇。

从内容分析上说，该书的表现形式是大段倾诉衷肠的抒情，充满了女性的感情色彩。内在的本质则是贯有的鲜明立场，坚韧的斗志，对现实的非议和批判，对社会良知的强烈诉求。它使我们对生命存在的本身产生超乎以往的思考和启示。反堕胎积极分子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都热衷于研究《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并声称该书证明了他们在人流问题上的正确观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书的巨大影响力，它在社会的敏感问题上具有参照物的价值。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是法拉奇献给世界上所有女人的书，也是世界上所有男人值得细细品读的书。它刚柔相济，情感充沛，达到了女性觉悟的崇高境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法拉奇的代表性作品，它受到格外注重人权利益的西方社会的广泛推崇自不待言。



第十章

9·11 后的复出

“9·11”事件发生后，法拉奇发表了8万字的檄文《愤怒与自豪》。像夕阳中的迟暮英雄，她再一次站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前沿。

她形容“9·11”像电闪雷鸣，把她从安静的写作状态里惊醒，由过去同情弱者，蔑视强权，转而强烈抨击伊斯兰文明，拥护布什的战争新举。

法拉奇的复出在知识界颇有代表性。从社会背景来看，冷战结束后左翼阵营的分化、西方出现“新悲观主义”思潮，是法拉奇转变倾向的外在因素；从她的经历以及个人特质进行分析，知识分子的左翼浪漫情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等，是导致她右转的内在原因。





1. 向西方世界发出警告

法拉奇自20世纪90年代起“隐居”纽约，休养生息，闭门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

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时，她正待在纽约的家中。当她在电视上看到世贸大楼像一个火柴盒一样燃烧起来，听到现场的人们不断惊恐地叫着“上帝！上帝！”，一些人为逃生从近百层的高楼上跳下的时候，她再也坐不住了，又一次处在激情和思考之中。



不堪回首的历史回放——纽约世贸中心遗址。

《晚邮报》的编辑登门拜访，希望她就此事写一些文字。她不顾年逾古稀，复出江湖，拾起了尘封近10年的笔，在短短的时间里写出了声讨檄文《愤怒与自豪》。她说：“我为此工作了12天，没有吃，没有睡，一刻也没有停下来。在这12天里，我甚至没有感觉到饥饿和睡意。我完全靠咖啡来充饥，用香烟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必须指出，写作是

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一种消遣，不是一种发泄，也不是一种减轻痛苦的方式。因为我绝不会忘记，写下的文字既能做出大量善举，也能制造无数罪恶，既能救治，也能屠杀。”

一个社会往往有三种批评的声音：主流声音、合法的批评声音、极端的批评声音。法拉奇的批评被社会公认为是一种极端的批评。在这本书中，法拉奇不加分别地对整个伊斯兰文明进行了系统和辛辣的批判。

她指责伊斯兰民族拖家带口式的大举移民，称他们“不尊重我们的法律，却在我们的家里落了户，强行带来他们的观点、习俗和神祇”。她批判欧洲大陆“像一个娼妓那样向敌人出卖了自己”，成了欧陆“恐伊症”的代言人和右翼势力的新盟友。她在书中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穆斯林移民正在把欧洲变成‘伊斯兰的殖民地’，这将会终结欧洲文明，尖塔将代替钟楼，长袍将取代迷你裙。”

她甚至在这篇具有理性色彩的书中，再次向公众描述了自己采访霍梅尼时遭遇的尴尬与惊险：

当她去罗马的伊朗大使馆申请采访霍梅尼的入境签证时，伊朗人看到了她涂得很鲜亮的红指甲，他们认为这是妓女的象征，勒令她赶紧擦掉。到了伊朗城市库姆，她被所有的旅馆拒绝，因为穆斯林妇女不许在外面过夜。采访霍梅尼时，她必须穿着长袍、戴上面纱，为了换掉牛仔裤，她费尽周折，开始她想在汽车里换，但是翻译警告她，“你疯了？要知道在库姆做这样的事，是要挨枪子的。”于是这位男翻译把她带到了以前的皇宫，一个看守人领着他俩到了一个房间，刚要开始换衣服，门突然被撞开了，一个人冲进来，口中呼喊“罪孽！羞耻！”，因为《古兰经》禁止一个男人和没有结婚的女人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发生了这种事，只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杀头，二是结婚。于是一位负责任的当地人拿来一份临时结婚协议让她和那位翻译签署。虽然这位翻译已





经有妻子，而法拉奇根本不想跟一个陌生人结婚。

以《愤怒与自豪》而复出的法拉奇，与人们以往的印象大相径庭。她曾被普遍认为持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反对所有的侵略行为，有时呈现激进的左派分子和自由斗士的形象，强调人权，追求平等。但复出后，她的作品一改之前的风格，以极端的右派立场，猛烈抨击“欧洲阿拉伯化”和“伊斯兰主义”。她认为，自己的思想发生转变后的某些论断“有些残忍”，但“无可争议的准确”：

“因为当西方的命运，我们幸存的文明危若累卵之时，实际上，我们就是纽约，我们就是美国。我们就是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希腊人、葡萄牙人。如果美国被摧毁，欧洲也会被毁灭，我们也将被毁灭。”

“我也知道，有一小部分不同意我观点的读者，他们岂止是用一种恶毒的语言来写下了这样的话：‘因为法拉奇是一个病魔缠身、一只脚已踏进坟墓的人，所以，她才扮演了一个勇敢者的角色。’这真让人恶心。我不是在扮演一个勇敢者的角色。我本身就



法拉奇居住在自由女神像的不远处。自由女神像坐落于纽约市海港内一座小岛上，高达33.8米，以120吨钢铁为骨架，80吨铜片为外皮，总重量225吨，是法国赠送给美国的礼物，1886年落成。

是勇敢者，并且从来都是勇敢者。”

“这是一份写给欧洲人的起诉书，或反省辞。这些人将通过报纸读到我的文章。也许，他们会向我抛撒一些鲜花，但肯定也会投掷许多臭鸡蛋。”

她在书中写道：“你问我（西方和伊斯兰）两种文化有什么反差？说句实话，把这两种文化相提并论都会让我恼火。”她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欧洲不再是欧洲了，它成了‘欧拉伯’（欧洲和阿拉伯的混合体）——一个伊斯兰教的殖民地，实体、精神和文化都受到入侵。”

文明冲突论的首创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预言了世界八大文明之间可能会发生的冲突，但没有料到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会以如此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因此法拉奇对整个西方世界发出了警告：“美国倒了，欧洲也要倒，伊斯兰宣礼员会取代教堂钟声，穆斯林披风会取代迷你裙，骆驼奶会取代白兰地。”在这篇文章中，法拉奇激烈抨击伊斯兰教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强调与伊斯兰世界恐怖分子的战争无法避免。

如果没有“9·11”的惊世浩劫，法拉奇的新闻生涯称得起比较完美。住在曼哈顿的她已搁笔数年，偏又要在愤怒中放言数万字长文。但这一次她指责不同信仰者犹如“老鼠般繁殖增生”，公然宣扬对阿拉伯世界的仇视，甚至呼吁发动再一次十字军东征，鼎力支持布什发动的两次战争，是世人所料不及的。这大概也是法拉奇不甘寂寞，敢为人先的一贯风格的延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贯作为自由斗士为被压迫者鼓与呼的人，晚年成为了压制民族平等和人类自由的新保守主义者的宠儿。

哲人说过：“我年轻时不敢太激进，只怕年老时太保守。”法拉奇





的人生经历，似乎正应印了哲人的警告。这也是法拉奇的身后，争议不绝于耳的原因。

2. 《愤怒与自豪》激起千层浪

2001年9月29日，意大利一家报纸在删除其中对伊斯兰教过于极端的批评内容后，破天荒地用了4个整版另加四分之一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长文。

文章发表伊始，引起西方世界的极大轰动，报纸在短短4小时内卖出了约100万份，创下新闻史的新纪录。此后又迅速扩充成书，发行也逾100万册。

法拉奇的复出被舆论认为是“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有震撼性的事件之一”，西方媒体针对她的文章纷纷发表评论。《华尔街日报》最早发表了题为《意大利的拉什迪》的社论，盛赞“欧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



法拉奇的目光有着入木三分的穿透力，还具有某种思想意识的影响力，即用思想意识带动行为本身，穿越各种意识障碍，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

拉奇”。同时，法拉奇的言论遭到欧洲左翼媒体的强烈反击，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卡巴尼首先撰文，称法拉奇“激烈地从左派向右派转舵”，成为种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仇视者。双方由此开始迅速形成了左右两派对峙的阵营——

反对者派别：

2002年，法国有社团发起“反对种族歧视、促进人类友谊”运动，要求法院没收《愤怒与自豪》，或者在护封上印上警告性文字，就像烟盒上的“吸烟有害健康”。旋即，法国三个社团以“散布种族歧视和仇恨罪”将她告上法庭，并由此引发一场关于言论自由双重标准问题的讨论。

2002年，瑞士多个社会组织联合起诉法拉奇在《愤怒与自豪》中“想象的种族主义内容”，要求查封她的作品。瑞士官方在该国穆斯林团体的压力下，要求引渡法拉奇，但意大利司法部长拒绝了这一请求。

2003年，《共和党人》发表文章，称法拉奇为“摆出西方圣女贞德姿态的自我暴露癖者”。

2005年5月，意大利穆斯林联盟发起针对法拉奇的诉讼，指控她的一些言论冒犯了伊斯兰教。随后，意大利法官命令她接受2006年6月在意大利贝加莫的审讯，罪名是“诽谤伊斯兰教”。后来法官裁定法拉奇应当接受将于今年12月18日举行的审判。法拉奇对此的回应是：“假如他们想把我关起来3年，我会说或者做一些让他们要关我9年的事情！我一旦愤怒了什么都做得出来。”

2005年，两个意大利穆斯林组织给她发信，声言要像当年霍梅尼下令处决《撒旦的诗篇》的作者拉什迪一样，最终要杀死她。

2005年，意大利诺贝尔奖得主达里奥·福指出，她的著作吸引了很多“受极深偏见引导的人”。意大利法庭对她提出起诉，控诉她涉嫌





文化歧视，声称要收押她。

2006年，米兰的一个时尚画廊展出了大型法拉奇肖像，画面上她被斩首。

意大利歌手乔瓦诺迪写了一首歌曲，暗喻讽刺法拉奇，把她描述为“一个热爱战争的记者和作家，因为战争让她回想起过去美丽的时光”。

支持者派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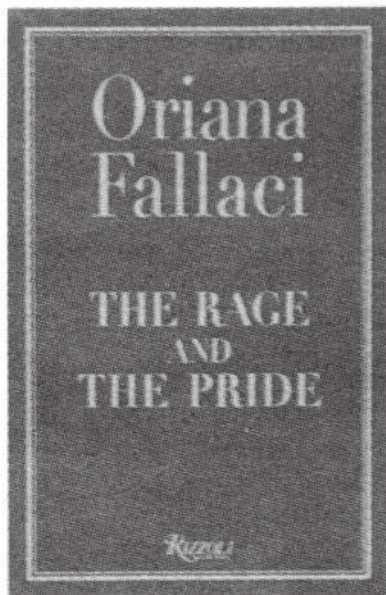
2002年11月，首届欧洲社会论坛在佛罗伦萨举行。法拉奇将论坛比作纳粹对佛罗伦萨的占领，号召市民抵制。支持者高举标语：“我们响应法拉奇！”

2002年，意大利周报《全景》的外籍记者兼专栏作家卡罗·洛赛拉曾在该杂志撰文认为，“《愤怒与自豪》足以使意大利重新明确自己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冲突中的姿态。”

法国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劳特赞扬法拉奇“以我们敌人的语言和行为审查敌人的作为——‘9·11’事件、杀害记者丹尼尔·玻尔、在阿富汗毁佛以及其他任何以伊斯兰名义犯下的暴行，而且不受那些让西方自惭有罪的苦行式的自恋主义者的胁迫。”

2005年，一个支持法拉奇的委员会搜集了大量意大利人支持法拉奇的信件，并以此作为法拉奇受到支持的证明。

法拉奇的著作在伊朗可以出版，但“愤怒与自豪三部曲”却遭禁。



《愤怒与自豪》（英文版）封面。

意大利报纸《自由者》曾发起运动，要帮助法拉奇成为终身参议员。当时的意大利总统在慎重考虑后拒绝。法拉奇回应说：“这对我恰是一个解脱，要是变成终身参议员，我到罗马都不知道坐到哪儿才不别扭。”

法拉奇的复出与右转，是否意味着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新仇旧恨？尽管受到众多的批评，但她意犹未尽，强硬有加，反而更加坚信自己是个勇敢无畏的说真话的人，甚至将自己比作14世纪被当作异端烧死的先知。她待在纽约的家中，享受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还警告意大利等国家：如果遭遇“9·11”的灾难，他们的状况要比美国糟糕得多。

在过后的岁月里，法拉奇又连续出版了《理智的力量》和《现代启示录》两本书，强化她的政治态度和文化观点，同样受到了整个西方知识界的关注。意大利著名左派学者翁贝托·埃科在《共和国报》上撰文，不点名地批评法拉奇的文化沙文主义，呼吁社会应倡导宽容。《纽约客》记者塔尔博特撰文说，那个叛逆的法拉奇已经不见踪迹，而是变成了一个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对移民持怀疑态度的“小资产阶级”。她甚至放弃了年轻时喜欢的裤装，穿起了裙子。

3. 法拉奇转向的社会成因

随着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垮台，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据此宣告，资本主义已经取得最终胜利。美国一位著名激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在影响广泛的《纽约人》上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已经结束。而一些右翼学者则干脆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形态”。

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走入低潮，影响到了全球左、中、右的各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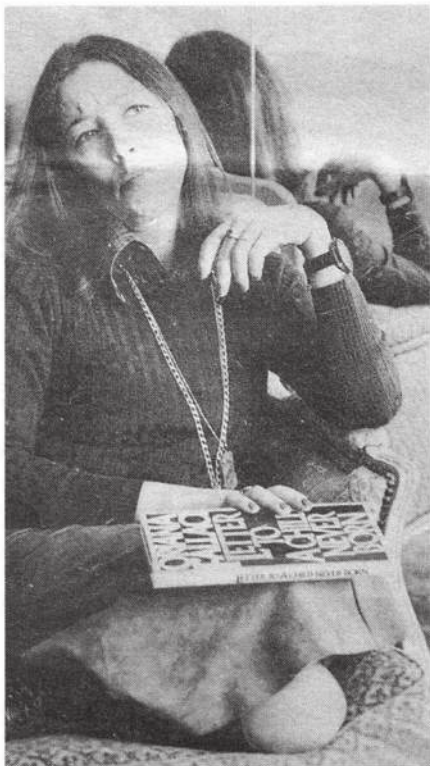




政治派别，不可避免带来思想和文化观念上的冲击和调整。西方左翼阵营由此分化，界限和阵营变得模糊不清，一些欧洲左翼的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试图把传统的左翼理论和主流的右翼理论结合起来，走介于“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和中国革命史上曾有过的过程和阶段有些相似。而另一方面，一些左翼学者认为理想幻灭，开始不同程度地倒向右翼。此种世界范畴的政治格局的变化，对带有激进左翼色彩的法拉奇也无疑产生了影响。她过去也对东方似有偏见，但这时则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了。

“新悲观主义”思潮的蔓延也对法拉奇产生一定的影响。冷战结束后，虽然东西方对峙的紧张气氛消失，但随着西方社会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和大量外来移民的增加，西方社会人口种族构成发生较大的变化，基督徒人数日益减少，穆斯林等其他宗教人数却在上升；外来新移民更多地保留了民族文化，而没有完全融入西方文化。有关数据提供了这样的佐证：

德国：欧洲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2004年女性平均寿命81.3岁，男性平均75.6岁，但人口增长率极低，2005年趋于零。只能靠移民维



法拉奇是眼光锐利、思想犀利的女记者和女作家，正如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所说：“社会是航行在大海上的一艘大船，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

持社会生产；

英国：2005年人口增长率0.28%，已进入靠移民刺激人口增长率的阶段；

卢森堡：20万劳动大军中，有10.5万来自国外移民，很多是居住在邻国每天跨国界上班的人；

欧盟：2005年人口增长率为0.15%，低于中国0.58%（官方统计数字）的水平。各个国家中都靠大量移民填补岗位空白。同时，基督教信仰者和做礼拜的人数锐减，呈衰落趋势。

面对这种人口和种族变化带来的“全球移民危机”，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一书中，忧心忡忡地写道：“美国社会将有解体的危险。”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说，“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美国“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些学者和政治家的言论，强化了西方潜在的民族和文化保护意识，在西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机感和恐慌情绪。“他们现在不是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灵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并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近年在美国出现的白人“民兵”组织、欧洲的新右派、德国的新纳粹、澳大利亚的反亚洲人浪潮以及“9·11”后的反伊斯兰行动等，都是这种意识强化的结果。

《我们是谁》一书的开篇中写道：“9·11”事件的当天，在美国波士顿的查尔斯街，挂国旗的只有一家，两周后这里挂出了17面国旗，还有一面巨大的星条旗横跨在街道的上空。沃尔玛超市售出的国旗9月11日为11.6万面，第二天有25万面，而一年前这两天售出的数字分别





为6千4百面和1万面。悬挂国旗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美国在国家遇到挑战的危难之际，强调国家和国民身份的特性意识。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认识法拉奇其人其事就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矛盾接踵而至，地区和民族冲突频繁发生，“9·11”事件后这种紧张关系达到了顶峰，又是新的一系列矛盾的开始。战争造就了国家，国家又制造了战争。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永世长存，只能推延解体和衰亡的历程。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有着这样的分析：“如果19世纪的特点是美国的国内冲突，即南北战争，20世纪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么21世纪的特点将是文明的冲突。”“苏联的解体使西方失去了共同的敌人，21世纪伊斯兰将是西方新的敌人。”

法拉奇的《愤怒与自豪》表达了对上述观点的认同，并反过来为这种思潮助澜，通过对过去和现实的分析，勾起了人们的许多历史回忆，促成在美国人心中形成“恐怖主义=伊斯兰=美国的威胁=民主的威胁=文明的敌人”的反射模式，并将注意力集中到不同文化间的分歧和矛盾上。

4. 极端主义的视界

作为一名记者，法拉奇试图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作为信仰民主和自由的西方知识分子，她又无法摆脱西方文化的束缚。这导致了她在两者之间游移和徘徊，而后者常常占据上风，侵蚀她试图坚持的公正态度。这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浪漫情怀所决定的。

以法拉奇在越战期间的报道为例。起初法拉奇眼中的越共堪称“为自由而战的骑士”，因此她站在越共一边，反对美国插手越南事务——“我不会带着维他命、给养和现代化装备来到越南的约翰尼之流哭泣”。

她为不知名的越共战士出版日记和发表爱情诗，描写美国士兵逃避兵役的种种丑行，还大胆揭示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的傀儡性质：“它像一只玩具，受主宰着别人命运的人的利益所摆布。”

然而，当美国老兵们批评她：“作为人文记者，站在敌军的立场上，不公平不负责任地把美国人贬得一钱不值。”法拉奇感到困惑，与此同时，北越政权企图控制她采访的行动引起法拉奇的不满，而越共处决被俘新闻记者的行为更令她怒不可遏，于是她对越共不再抱有自由斗士的浪漫幻想了。在她的笔下开始出现对北越领导人的讥讽和嘲弄。

法拉奇的态度转变表明她试图以浪漫主义的方式，从事她的报道和采访。她情感上的微妙变化，实际上来自于知识分子的不坚定的立场，长期以来受到的西方思想和理念的熏陶。同样的矛盾也体现在法拉奇对民主的态度和认识上。

法拉奇在诸多问题上的摇摆，表明她既想站在人道的立场上说话，又无法摆脱西方情结的羁绊；既要实现新闻的公正性，又无法挣脱既成认识的束缚。在《愤怒与自豪》中，我们看到的法拉奇似乎淡忘了曾经的“左翼”浪漫幻想，只剩下一颗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心灵了，她带着它大声疾呼：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把贱民变成了人民，因为它鼓励他们，甚至要求他们去管理自己，表达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幸福。它和共产主义的那些做法完全相反，后者禁止人们去反抗，禁止他们去管理自己，表达自己，不准他们变得富有，并企图通过缔造一个神圣的尘世之国以取代传统的国王。我父亲常常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君主制统治，是一种守旧派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抹去了人身上那种分明的轮廓。当你抹去一个人的轮廓时，它就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源于两者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作为





146

法拉奇向世界投不信任票

对自身文明坚定不移的西方文化代表者，法拉奇耳濡目染于西方世界对阿拉伯的片面宣传，既无法接受阿拉伯文明，更不愿予以理解。她曾经公开表示说：“我对中东毫无兴趣，中东文化引不起我的任何感慨，巴格达、大马士革、巴基斯坦，我都不想再去第二次。”她对阿拉伯文化心存鄙夷，认为“他们身上有一种狂热、一种教条主义思想、一种表演癖和一种黑手党的感觉，总之都是一些我嗤之以鼻的特征”。

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世界一边是天使，一边是撒旦，一切事物非“善”即“恶”。这种认识往往给人们带来极端主义的倾向和偏执的情绪，影响一个人的正常思维和判断。生长于基督教环境里的法拉奇曾说：“尽管我完全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但我还是被天主教文化所浸染，它仍然是我用来表达我自己的某种方式。”“每个人都是天使和野兽的混合体。”

法拉奇一直难于摆脱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的桎梏，那种“善恶分明”的思维模式导致她的绝对主义思想，并时而陷入非此即彼的极端主义视界。



第十一章

中国观点的法拉奇

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新闻从业者来说，法拉奇是一个楷模。她引发的同类示范意义是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每一个具有正常心智的人，都会感受到法拉奇作品中透露出来的真诚和正直的力量。这不是以谋取稻粱为职业者之所为，而是体现了时代弄潮儿的强健风骨。

“如果说法拉奇站在珠穆朗玛峰，我们充其量就是到了拉萨。她是一代宗师，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央视《面对面》节目的主持人王志毫不吝嗇对法拉奇的赞美和敬仰。

王志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在学生时代读到了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直到现在，一些做深度访谈的记者在采访之前，还会把这本书当成幸运符拿出来再翻翻。





1. 公允新闻的源代码

对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来说，法拉奇是伴随他们一起成长的行为示范和一个楷模式的人物。她在中国知识界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因为她的作品充满了激情和文明精神。

“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如果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您会选择谁？”

前一个问题是质询邓小平，后一个问题是逼问基辛格。在中国，没有人能想象出这是从记者口中说出的话。

没有独立人格，缺少平等和自尊意识的人，显然是不能、也不敢这么发问的。《人民日报》曾这样介绍法拉奇：她把采访看成是“一出有情节的戏剧”，她自己就在其中扮演着昂然阔步的角色。不畏权势、特立独行、追求自由平等的法拉奇，与对个体的尊重、对公民平等权利追求的社会发展趋向正相吻合。其表面上是犀利的提问，本质上则是在



法拉奇给世界留下的并非仅是她的肖像。她写道：“今天的历史发生之事都会被写下来，我因此而喜欢新闻业……”

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

有人说，身为外国人的法拉奇，自然容易做到“尖锐的提问”和“平等的对话”。事实上不尽如此。在伊拉克战争中，同样是外国人身份，著名的西方电视主播丹·拉瑟采访萨达姆，就因过于谦恭软弱而饱受批评，那时许多人怀念起法拉奇的风格。

勇敢而平等的人格是需要锤炼的。法拉奇把新闻的力量和自由人格的力量捆绑到一起，使她的作品表现出对社会良知和社会公正的强烈呼唤，在当代鲜有能与之媲美者。

采访世界上如此之多的一流政治家，且他们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性格、癖好又差别巨大，这需要采访者具有何等丰富的知识、多么超凡的激变和应对的智慧啊！尽管法拉奇身上时常露出一些女人通常的毛病，有时偏执、傲慢、独断、自我，但并不影响人们对她的喜爱与尊敬，她依然是政治采访中无人可及的佼佼者。在20世纪中后期，像法拉奇这样取得了非凡的新闻和文学成果、有着罕见的政治声誉和殊荣的作家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人了解法拉奇的程度胜过了解所有对中国进行过采访活动的西方记者和作家：两次采访邓小平，让法拉奇在中国家喻户晓；她的采访记被选入《邓小平文选》，意味着她的采访既得到了官方认可，又有着广大的受众。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分成三次被翻译成中文版本，多次再版重印，又扩大和延续了中国民众对法拉奇的认知。

《风云人物采访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新闻人，在上个世纪后期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手中，几乎人手一本。人们仔细阅读这本书，从中第一次看到了记者可以这样采访和写作，这样表达一个媒体和记者独立的立场，法拉奇成为人们难以企及的“精神偶像”。

“如果说法拉奇站在珠穆朗玛峰，我们充其量就是到了拉萨。她是





一代宗师，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节目主持人王志毫不吝啬对法拉奇的赞美和敬仰。王志的采访风格虽然并不为许多人接受和看好，但他研究和借鉴法拉奇的采访风格，初具法拉奇之风。《面对面》在央视节目排行榜中居于前列，也印证了法拉奇的采访风格仍为许多人所认同。

王志和业界内其他同龄人一样，在学生时代读到了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和一些做新闻的人一样，一直到现在，他在做重要的深度访谈之前，都会把这本书当成幸运符，拿出来再翻翻。“要采访首脑是容易的，不容易的是用什么立场来采访。华莱士总归是在代表美国，而法拉奇是独立的。”王志特别强调法拉奇的独立人



严肃俊逸，不失凝重。

格，因为法拉奇在记者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一名自由记者，为不同的媒体撰稿，而不从属于任何一家媒体或机构。

王志的例子是中国新闻界深受法拉奇影响的一个缩影。“喜欢她的人，说她是爱憎分明；不喜欢她的人，按照美国传统观念会问，你是在

报道事实还是发表意见？但对她这种以名作家身份来当记者，大多数人也没有要求她特别客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从专业领域分析了法拉奇，他还说，法拉奇在新闻领域的影响和成就至今也不可忽视，她是采访政坛风云人物比较优秀的一个人，她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她的作品对新闻界和政治界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法拉奇曾有过三次中国之行。第一次是1980年，行程的主要内容是采访当时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几个月后，她随意大利佩尔蒂尼总统的官方代表团再访中国，并和等候在她下榻饭店门前的中国学生们进行了座谈。第三次是1993年在妹妹的陪同下，自费来到中国访问。这一次她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见了众多中国记者，出席了当时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的官方晚宴，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以民主和自由为主题内容的演讲。是时，数以千计的北京学生们得到消息后，乘坐公共汽车前往中国社科院，不顾主办单位的反对，把整个演讲大厅及走廊挤得水泄不通。

法拉奇在演讲中说：“无论是战争时期，或是平时时期，我都忠于自己的原则，为了自由而奋斗不已。我的生活就像我的作品，我从未放弃过斗争。”她供职的报社曾要求她就某个政治集会写一篇讽刺性报道，而她坚持不接受偏见，“首先得听听他们会说些什么，我将基于他的演说来写。”为此，她不怕遭到解雇……

对于很多听讲的人来说，他们去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感受那种热闹的氛围，而是聆听一种思想，感受一种人格的力量。在演讲结束后提问时，一名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说：“我并不是来提问的，因为我从学会阅读起就一直阅读您的书，我已经知道您的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我感谢您，因为您的作品，教给了我们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勇气与自由……”





法拉奇在世界很多角落都代表着自由和勇气，是公允新闻的源代码。她的作品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鲜明的原则立场，善恶分明的价值和伦理选择，是对社会公正、公平的深度渴望和眷恋。她对人类文化事业的贡献，使她成为思想刀锋的磨砺者，情感极限的逾越者。

法拉奇作为一位新闻斗士，其名言是：“你曾经渴望战斗，你现在仍然斗志昂扬吗？就我自己而言，一息尚存，就要战斗。”她扎根于社会现实，穿梭于战火与硝烟，始终身体力行自己的信仰。

2. 法拉奇在中国

法拉奇在中国的传播，得益于新华出版社和一位对法拉奇情有独钟的资深译者毛喻原先生。

有着引进国外优秀时政和新闻读物传统的新华出版社，于1983年6月在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记》原书30多篇人物访谈中，选取了8篇进行翻译和编辑，出版了《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这是国内首次出版法拉奇的中文作品。时隔两年后的1985年8月，该社又选取了10篇专访进行翻译和编辑，出版了《风云人物采访记（续集）》。这两部书相继出版后，社会各界好评如潮，一时洛阳纸贵。1988年5月，该社将两本书的内容合一，同时又选取8篇翻译编辑，出版了《风云人物采访记（全译本）》。这些书均发行数十万册，被许多新闻从业者和高校新闻采访课奉为经典。

1979年法拉奇长篇纪实类小说《男子汉》在意大利出版后，国内资深译者毛喻原先生看到了法拉奇的英文版《男子汉》，立即译成中文，并由新华出版社在1982年推出中文版本。这本定价1.55元的法拉奇作品，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完整意义上的法拉奇原著。它的中文版书名被译为《人》。译后记中说：“全书结构紧凑、严谨，语言简练。然

而书中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和绝对自由等观点，中国读者当能鉴别。”

2000年新华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一位美国学者所著的《女人与神话》。这是一本未经法拉奇向作者授权，但作者硬是写出来的一本评述法拉奇的作品。

在对《风云人物采访记》和《男子汉》产生强烈的阅读崇拜后，毛喻原先生四处寻找法拉奇的其他作品。1989年，毛喻原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了法拉奇的又一部小说，英文版的《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他爱不释手，将整本书复印下来，边看边翻译成中文。两三个月后全部译完，书稿在朋友圈子里辗转流传。一家出版社找到他，希望能出版，毛喻原满心欢喜答应下来，但直到2002年，南方的一家出版社才出版了毛喻原翻译的这本书。毛喻原说：“如果说《风云人物采访记》和《男子汉》显示了法拉奇颇具男子汉气概的话，《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充分展示了她细腻、儿女情长的另一面。”

2002年底，一个朋友告诉毛喻原，法拉奇又有新书问世。出于对法拉奇的热爱，毛喻原托美国朋友给他快递来一本。这就是为西方文化激情辩护、猛烈抨击伊斯兰文化的《愤怒与自豪》。毛喻原照例把书翻译成中文，自己掏出数千元，印刷了100本，继续在朋友圈子里传播。他和出版社都试图联系法拉奇，但杳无音讯。

法拉奇在中国知识界赢得了广泛的尊崇和爱戴，这是任何一个外国人，在盛行挑剔和非议的世风中，都无法享用的殊荣。本章从“百度”搜索中遴选几篇，以表达在网络阅读层面中，在标示现代、科学的知识群体里，法拉奇的影响力和分量。

法拉奇让我感受到生命的跃动

我一岁的时候，法拉奇50岁，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爱穿男装和长裤





的奇异女子在我心中的烙印。

小时候有一本很挚爱的杂志《儿童文学》上面总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小作者，她说她喜欢法拉奇，喜欢她万水千山的从容步伐。她在文章中写到“那个黑衣的女子，时时影响着我，她宛若旋风走遍世界每个有新闻的角落”。我开始好奇，这是一个怎样的人间精灵呀。我开始在中学的图书馆成堆的卡片中寻找她的名字，追寻她的脚步，想了解关于她的一切。就这样，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给世人无数惊喜的女子，这是一个很茫然的小女孩心中的图腾吧。

我开始知道，10岁那年的法拉奇在防空洞被美军的轰炸吓哭了。她的父亲对她说“哭什么，坚强些，女孩子也不应该哭”。我还知道，战地记者培养了她的勇气，她走入越战，奔波于中东战争。她的文字没有雕琢，她的提问耐人寻味。她直面那些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物，以她的才识和柔韧走近他们。她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记录着历史的纷争和变迁。

我一直想法拉奇如果不遇到阿莱科斯，会有怎样的幸福与不幸。他们就那样相遇了，手拉着手走入了他们的天堂。阿莱科斯说，因为我会早早死去的，所以你应该爱我。法拉奇说，我被没有办法解脱的命运所吸引，因为命运已经超越了生存的本能，充满了捉摸不定的幸福。他们在对望的眼眸里找到对方的影子。只是为了守望，只是因为爱，没有任何杂质，就像九月的天空。

我喜欢坐在那里，跟她一起回到那个火热的年代。看着曾经的风风雨雨，有那样一种执著，然后泪流满面。我一直在想，我喜欢法拉奇什么呢？我不知道。面对这样一个速食的年代，我常常感到茫然。

不是吗？我们在高楼里孤独地拥着希望，茫然地注视着未来，徒留怅然于心底。我们标榜文化，却越来越漠视自己的内心感受。我们热衷

户外运动，却再也闻不到太阳的味道。我们越来越迷失在那些人为制造的光怪陆离的色彩中，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心灵家园。我们爱得虚华、缥缈；我们爱得世故、造作；我们爱得苍白、无奈。

法拉奇，如果今天你还写东西的话，你怎样让自己的灵魂世界更加明晰清澈？

6角6分的书永存

多年前，我在北京一家书店里以6角6分的价格淘到一本新华出版社出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如获至宝。我第一次知道人物采访可以这样写，看似高深的国际政治可以写得如此耐读，尤其她与政要们的“过招”让人看得津津有味。此后几年，这本书跟着我回到老家。几年后，它又跟着我来到北京。在北京几次搬家，这本书架里最旧的书一直被我珍藏。如今，它和一本本来不及看的、簇新的书摆放在一起。这本书被过去的新闻系学生奉为“宝典”，后来，这批最早的新闻毕业生一度占据了新闻界的半壁江山，以他们的亲身实践，试图推进着“中国法拉奇”的梦想……



世纪之交的法拉奇极目远望，身后为纽约的世贸大厦。

法拉奇的文笔和写作方法一直是很多记者竞相模仿的对象，几年前，我还在中央某大报上看到一位记者模仿法拉奇的文字，开篇第一句与法拉奇采访阿拉法特的开篇一模一样——





“当他准时到来时，我犹豫了片刻。我对自己说，不是他，不可能是他……”

法拉奇的文字总是第一句就很吸引人，即使你原本对她所采访的人物并不感兴趣，但她总是有办法抓住你，然后再不放开。

她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作为记者，她有足够的骄傲笑对她的同行；但作为女人，她是否同样满意自己的选择？我不知道……也许这样的女人不是用世俗的标准能够评价的。

像我初恋的情人

对法拉奇的记忆，可以追溯到读中学的“愤青”时期。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在课外读物上读到了她《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节选，马上被她优美、凝重、抒情、极其富有诗意的文笔所打动。后来，我多次到深圳的书店中寻找这本书，也到外地书店中的文学类书架中查找，都没找到那本曾经深深打动过我心的书，我曾一度怀疑是我记错了。

直到今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又去淘书。在书架前溜达时，顺手拿起一本银白色封面的书一看，竟然是《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当时，我真乐坏了，屏住呼吸，仔细抚摩封面，好像深夜捉到了蚰蚰的孩子，担心呼吸声音一大，会把它吓跑似的。

这本《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装帧设计和排版格式，都不是我喜欢的样子，但这都无关紧要，这本书像我的初恋情人，虽然分别多年后乍见时，感觉她的外貌已不复有当年的容光，但那种曾经有过的心动和心痛，还非常清晰，仿佛触手可摸。

我整整读了一宿。整个夜晚沉浸在法拉奇柔情似水的文字中，久久咀嚼，不忍掩卷。我一遍遍想象法拉奇：她应该是那种恬静、美丽的母亲。有时候她的想象天马行空，有时候，她的话意味深长。这正像法拉

奇所说，是她“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这颗精子”和“想象力这颗卵子”天然受孕的结晶。

3. 一个人引发的同类示范意义

在即将完成本书的时候，作者常常有意犹未尽之感。我感觉到，有一些由法拉奇派生出来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必须倾诉给大家。

这就是在中国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法拉奇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标本，有没有可能对我们同类构成示范意义，能否成为我们整个社会认同的范例。

收集和划分国内新闻界诸多名人的类型，发现有两种路径的归宿。就是说，从事新闻的人们，不管业绩曾经多么辉煌，他们的最终出路无外乎两条：

一是用新闻业界的成就奠基，其后进入社会的管理层面，成为有官方背景的、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的著名活动家。

二是在新闻业界浪潮的洗礼中，成为文学大家，亦或是专家和学者、名士。新闻是他们兴奋或失意的生命因素，他们在名士的范畴风光无限，体现着“巅峰体验”。

对上述两类起自新闻业界的名人，按个性风格划分，也可以区别出这样两种类型：

一是虽为知识分子出身，但把其气质和情结掩埋很深，很少有玉树临风的味道。官场之道对他并不陌生，社会运行的某些“套路”了熟于心。既讲人情义气，又深居简出；既不阿谀行事，也不冷落旁人；既有定量的交往，又总是保持足够的谨慎。他们具有政治家的思维高度和包容性，注意事物的平衡和稳定。知道自己是资源的管理和整合者，从不和那些文人们“煮酒论英雄”，有着士大夫达则兼济天





下的精神。

二是虽成为名流大家，但思想超前且充满个性。锋芒毕露，才华横溢，自恃清高，富有敏捷的观察力和悟性，待人以诚并善于沟通，但少于持重和练达；文思泉涌并恃才傲物，常招来些许微词。他们也沉醉于家国天下的构想，不时进入忘我感动的状态，但把历史交给他们的使命，理解成书写功名天下的激扬文章。

这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探询和解读的价值。文人的心性飘忽和情绪化的，但肩负社会责任和道义的人必须持重和练达。如何在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诉求和政治风云的谋略之间，在终极目标永不言弃的意志和局部问题常常妥协的态度之间，把握好“度”的程度，从而找到一个很好的临界点，使之既克服浮躁和意气用事，又抛弃一些既得利益者身上常见的暮气和官气，这是许多知识分子所欠缺的素养。

其实这两种人都和谐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当超女们想唱就唱，且唱得响亮时，我们社会的文化心理已经显示出足够的宽容。

在本书最后定稿时，恰逢我国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先生逝世。他因自己在科学界的打假行为，而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一个甘冒风险的人、一个同盟中的异端、一个被孤立和被谩骂的悲壮者。他和他的岳父——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同留学英国，同为科学大家，但两人有着根本区别：前者张扬，后者委婉；前者直来直去，后者含而不露。我想这除了两人的时代背景不同、生活出身不同、文化理念不同外，很难比较孰优孰劣。

这样就回到我们问题的现实上来，法拉奇值得我们效法吗？我们要效法她的哪些方面？我觉得在值得和不全值得之间，需要因时因势而论，注意选择好适宜生存并发挥自身价值的生态环境：

当我们具备她的才干，但社会不认同的时候，你要蓄势待发，学会

等待；

当我们具备她的才干，社会也认同的时候，你要奋发有为，大展宏图；

当我们不具备她的才干，但社会认同的时候，你只能滥竽充数，不求痛痒；

当我们不具备她的才干，社会也不认同的时候，你干不出名堂，最好转行。

我所陈述和表达的上述内容，可能有些过于表层以至不够全面，甚至不够严谨和科学，因为大多数新闻界人士都是处于不明朗的界定。这是个关乎人才学的话题，只代表作者自己。如果有人完全操法拉奇之法，去行采访之事，敲被采访者之门，那就可能闹了东施效颦的笑话。有人发明了王麻子剪刀，但剪刀的作用并不是用作杀人，倘若有人拿去行凶，那也不是王麻子的责任。

4. 让伪新闻从业者汗颜

时下一些新闻媒体的总编辑、记者和编辑们，读了法拉奇后，如果没有失掉良心和道义，可能会因之汗颜，甚至不敢再回头去看那些所谓成功的策划，那些专版上滥竽充数的非专业报道。这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的原因，也有媒体从业者的个人因素。

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认为：“社会是航行在大海上的一艘大船，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记录者、批判者、瞭望者，都是社会对记者职业角色的定位，然而，记者不是按照某个既定程序精确运行的机器人，要他记录他就秉笔直书，要他瞭望他就高瞻远瞩，他们是受个人主观客观条件制约、有着七情六欲的社会人。所以，各种形式的“问题新闻”就层出不穷。





苹果农药恐慌。1989年2月，哥伦比亚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中报道了这样一则不准确的讯息：施用过一种化学药品的苹果对儿童有害，并称这个说法来源于某环保组织。随后，先是各学校视苹果为瘟疫，后来“吃苹果得癌症”之说甚嚣尘上。致使几天内烂掉了价值1500多万美元的苹果，2万多名食品工人被迫失业。

假照片上的绝照。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出现了一张“最后一瞥”的照片。据说照片是一名遇难游客在飞机撞上大楼前瞬间拍下的，上面游客从容的微笑和急速冲向大楼的飞机形成强烈对比。这张剪接的照片通过互联网上的传播，引起全世界的巨大反响，欺骗了世人的感情。

抄袭6百篇次。2003年创刊已有152年的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长达7500字的文章“自曝家丑”：该报一位27岁的黑人记者杰森·布莱尔在过去的3年中为该报写的600多篇报道中，多半为捏造和抄袭之作。他只是通过互联网来造假，并提供虚假的差旅消费凭证来骗过上司。

记者行贿判刑。2003年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执导电影《2046》时，提出未经批准者不得进入现场以防“泄密”。某刊物记者梁崇基为拍摄独家照片，多次贿赂保安，拍摄并刊发了8家照片，因而触犯了香港《防止贿赂条例》，被判即时入狱3个月。

比尔·盖茨遇刺。2003年3月29日，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称，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出席洛杉矶一个慈善活动时遇到暗杀而死亡。很



法拉奇的晚年目光冷峻。

快，新浪、搜狐等各大网站相继转发这条消息，中国日报网站也转载报道。微软公司急忙发表声明，称此消息为假新闻，是上一年愚人节时的恶作剧。有关部门为此道歉。

假新闻大讨论。2006年11月初的记者节前后，首都许多媒体都发布了一条消息，称北京市公交集团拟于明年对主动在公共汽车上让座者实施奖励。北京公交集团负责人急忙出面否认：公司从没有这样的打算。但这则假新闻已引发了有关报刊上一场关于社会道德的大讨论：美德要用金钱和奖品来延续吗？

……

作者对新闻业界内发生的较大事件进行了简要的搜集整理，发现被全球所关注的虚假新闻数以百计。且近年来，假新闻高频出现，多现于世界级权威媒体中。这些注水的新闻，愚弄受众，欺骗读者。其成因有政府和行业、集团为自身的利益而“揽水”的作用，也有许多是媒体工作者的个人因素所造成。

这些“经典”的案例，衬托出重温法拉奇的现实意义。在2006年记者节前一天，《中国青年报》的特别报道专刊中，通栏标题是：“记者节，他们不再受尊重！”其下报道了几位记者涉嫌敲诈案开审的消息、新闻出版总署通报4名违规记者的追踪报道，以及“不良记者应终身出局”、“新闻伦理底线为何失守”的评论文章。

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也曾采访邓小平，其采访风格也强悍而凌厉，他说：“什么叫新闻？政治上的婆婆妈妈和家庭中的吵架拌嘴叫新闻吗？新闻从业者的良心是什么？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问题摆在面前，但我们更多的新闻从业者只把双眼盯在白宫的胸脯和好莱坞的屁股上，这不仅是渎职，也是可耻的逃避行为！”华莱士的采访风格也多有争议，大概就是不够理性和建设性，但他的敬业精神和业绩无人挑剔。





法拉奇不仅是一个时代的重要见证，是我们这个充满很多事端和不幸的世界的一面镜子，更在于她以作品的存在和行为的表达，给我们引出了一系列重大而饶有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氛围中有可能产生类似法拉奇的人物吗？为



法拉奇在一次社交活动中，边聆听，边思考。

什么我们许多人都无法与法拉奇的胆识、气质、抱负、善恶评判与价值选择相比呢？法拉奇及其作品给所有媒体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反衬出我们社会中一些浮躁的精英、名家们的卑劣与渺小。

其实，中国不是没有产生过法拉奇这样的记者。民国时期，面对“黑社会”的手枪，多有新闻界的前辈发自内心的正义，毅然捍卫新闻的尊严。此前还有邵飘萍、史量才等中国新闻史中的几个硬汉。但革命和建设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进入和平发展的新的世纪的今天，如何采用和谐的方式，建设和谐的媒体发展环境，发挥新闻媒体在推进社会发展中的推进作用，是个有着深刻的建设性意义的话题。

每个时代的发展观都会影响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思路和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政体和国情。处在政治文明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正在寻找和维护新闻的尊严以及应有的职业风范。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文化传统来选择自己的新闻管理制度。如同地理学所言，欧洲的气候滋润着法国的葡萄，美洲的土壤催生着美国的小麦，中国的水田，则生长着自己品牌的水稻。完全以国外的经验为笔，勾画我们的蓝图是有失科学的。

5. 我们是否还需要法拉奇

由记者造就传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在法拉奇曾经驰骋的疆场上，报纸杂志已不再有从前的影响力。电视让全球每个角落的事件，通过太空卫星信号，缩小为每个家庭屏幕上的画面。计算机网络、博客的诞生更带来消息发布的非权威性和个体化。传播媒介的电子化、影像化和数字化，使人类的社会活动无时无刻不被浩繁的新闻信息紧密包围，传统意义上的独家新闻已是仅供存照的隔日黄花。法拉奇当年咄咄逼人的采访，也将在电视和网络春笋般的话筒中渐行渐远。



以笔代剑的法拉奇，是匆匆而过的一个时代的倒影。

作历史变迁的纵向观，尽管今天和法拉奇的时代有了许多差别，但仍可以从她的身上观照到富有意义的借鉴性内容。虽然东西方国家的新闻观念迥异，人们对法拉奇的风格褒贬各异，但无可否认，人们对她独特而成功的经验是认同的。新闻规律和新闻内容不同，从来没有阶级属





性。新闻采访工作的一些经验，不是特定和专有的财富，而是人类社会
发展创造的精神产品。

新闻工作者的韧性原则。很少有人遇到比法拉奇更多的困难和挫折，她迎难而上，越挫越勇，有着不屈不挠的韧性。新闻工作的特点是个体创造，整体完成，没有个人奋斗的主观努力，没有很高的工作效率，没有敬业进取的职业态度，最好远离这个职业。法拉奇仅在越南战场上就奔波了8年，用生命记录了当时全世界为之瞩目的焦点地区的时局变迁，表现了新闻工作者良好的职业精神。虽然她的身影像孩子一样脆弱，但她的意志超凡的坚强。她从来没有往自己的碗里“吐口水”。

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法拉奇深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但从来没申请过美国国籍，她关注着祖国意大利的命运，在生命的最后，又回到了她阔别多年的祖国。她的一生也从没有伤害自己国家的利益。她在文中表述过这样的感情：美国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情人，甚至可以说是丈夫，对于他我会永远保持忠贞不渝，但把自己当作美国人的想法是错误的。尽管当我返回纽约时，我把护照和绿卡递过去时，海关人员会对我充满微笑，对我说“欢迎回家”。但我只能有一个祖国，我不能背弃她……对祖国发自内心的爱，是她感情充沛的源泉，必然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忠诚，是和法拉奇的爱国情怀相对应的。

擅长捕捉时机采访。法拉奇开创了“提问式”采访的先河，擅长捕捉时机采访，善于把资料的积累和思考、观察和询问相结合，具有很高的捕捉事物形象、发现事物内在联系和规律的感悟和观察能力。她善于把一个问题分解，或把多个问题浓缩，从而抓住有特点的对象、有特点的内容、有特点的事实、有特点的问题、有特点的细节，由点到面，点面对照，反复比较，仿佛手中掌握着寻找认识和表现事物的钥匙。

破除对权威的迷信。法拉奇的许多作品表现出对权力的挑战，显示了她正直勇敢、坚持真理的个性，即不畏强权，拒绝谄媚。“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聪明，有远见，有韧力，他们只不过更能钻营，更有野心而已”。完全的驯服工具，屈从于权势的桎梏，是新闻工作的悲哀。不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的人，是幸福的，但同样也是可悲的。

不为利益所趋的操守。法拉奇恪守记者的职业精神，这对于时下一部分记者经不起物质利益的诱惑，见利忘义，嫌贫爱富，追求享受形成鲜明的反差。市场资本的兴起在侵蚀着新闻业界的独立品格，罔顾政治大局和公众利益，搞有偿、广告式新闻，为追求卖点，吸引读者，扩大发行，而擅自散布虚假信息者，从根本上背叛了新闻工作者的操守。记者的所为和所写的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法拉奇不是另一个星球上的故事。请看有关新闻工作者的甲、乙两个画面：

甲：这是最近网上流传的一组照片。中国某个城市的电视台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的助手举着一张纸提示受访者，纸上面写着受访者应该说的话：“今天下午，我们看了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市政府新一届领导班子记者招待会，非常受鼓舞，非常激动人心……”照片被网友频繁转贴。有教授把这组照片出示给大学新闻系的低年级学生，他们一张张稚嫩的脸因惊讶而扭曲了。接着教授把照片出示给新闻系的高年级学生，大家都会意地笑了。因为他们经过数月的实习后，知道这种现象，并非极端。摆拍、记者兼任导演、抓来一个对摄像机敬畏有加的老实人充当政策条文的解释……大家都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接受采访时，头部、眼睛的动作不大协调。

乙：这是著名记者刘其中《铮语良言》一书中描写的几年前的一





个场景：

北京一所大学的报告厅里，听课的是一家报纸的近百名编辑记者。演讲人问：“中国发生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新闻事件的时候，比如召开‘两会’时，你们看不看报纸？”

“不看！”记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

“为什么不看？”

“没劲，没新闻！”记者们又齐声回答。

“那么，你们自己就不能去采访有劲、有新闻的稿件吗？”演讲人问。

“‘两会’上大都是讲套话和空话，很少能出新闻。”有人回答。

“你们不能摆脱套话和空话，采写有新闻的新闻吗？”

“不可能，这是体制问题。你难道让我们丢饭碗吗？”很多人回答。

“我从你们这些记者口中听到这样的回答，感到非常失望。”演讲人继续说，“许多报道的失败，有新闻体制本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编辑记者们个人的新闻素质问题。你们不应该把自己在新闻采访写作上的失败归咎到体制上。”

……

在我们某些媒体将新闻报道等同于一些官员和机构宣传政绩的工具时，在我们的某些媒体更重视发行量、收视率、借壳上市、资本运营之时，新闻界留下这样令人难堪的照片和场景就无足为怪了。

媒体是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它不仅要保证国家的性质，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理所当然要受制于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目前的许多问题正在这里：作为“喉舌”的党报党刊受到了特殊的政策保护和体制内的优待，缺乏进取意识和生存活力。中小规模的其他媒体则在接受市场洗礼的过程中，把职业当成

生存的手段，活力有余常失之自律。这是目前许多中国读者不爱看国内报刊和电视节目的症结——

僵硬的宣传模式。越是重要的新闻、重要的人物、重要的讲话、重要的外事，宣传形式和内容越是僵化和古板，有些已成为套路。用这种程序化、模式化、脸谱化套路制作的新闻，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阅读欲望，使宣传效果大打折扣。

夹杂太多的抒情和号召语。背景太少，解释太多，一连串口号式的直接引语，阐发大段令人发怵的政治高调。滥用政治术语和口号，用抽象代替具体，用空话代替事实，用笼统代替明确。抒情和号召性的文字浅薄造作，文风不实，以此掩饰新闻体质内容的空泛。

写作技巧上简单从事。无关铺垫太多，叙述不得要旨，拖泥带水，画蛇添足，浮词赘语，因文害义。在结构上层次不明，逻辑混乱，追奇逐异，缺少可读性和客观性，给人一种极不成熟的感觉。

低级趣味迎合世俗读者。内容猎奇造势，“狗仔”队翻云覆雨，恶搞加之明星、球星之类风流艳事充斥版面，彻底背离了新闻的本质，愈发不被人们所尊重。

毋庸置疑，很多有上进心的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着这样一种职业规范，注意对所报道的事物做广泛而深入的纵横联系与对比，对权威“平视”而非“仰视”、“俯视”，尽可能保持相对独立的判断和公益立场。国家也正在努力改进新闻报道，推进媒体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的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权威性的报道也在“三贴近”的要求中日趋可亲、可读和可信，新闻报道中的主要因素——新闻性、重要性、特殊性、关联性、政策性、监督性、趣味性等得到了充分重视，新闻写作上的一些手法，如导语、结构、过渡、背景、解释、时效等得到了应有的





168

法拉奇向世界投不信任票

重视。这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

经济社会的急速发展，凸显了媒体与社会、媒体与政府；垄断与自由、自由与自律；公权与私权、知情权与隐私权；真实与虚假、有偿与无偿；受众的权利与责任等各种关系的冲突。解决这些复杂关系在理念和实践上的矛盾，是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以非典事件中媒体的介入为标志，党和政府提出了深化新闻改革的诸多举措，包括强调新闻工作的“三贴近”原则、改进会议和领导人活动报道、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和社会公共信息公开、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改进国内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加强舆论监督工作……这些都标志着新闻空间的气氛宽松了，国家的新闻意识增强了，人们的知情权得到了保证，我们不再是“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儿”。



第十二章

死神也不能让她停止发问

在北欧荒山中的一间简陋屋子里，驯鹿人把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来的法拉奇照片，贴满了整整一堵墙。

在东西方的各大新闻院校和图书馆中，法拉奇的作品仍被许多学子们爱不释手，奉为经典。

77载岁月不等寻常。不思量，自难忘。法拉奇著述等身，不愧“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荣誉。

她一生中对自己的最大挑战，是和癌症长达14年的斗争。她斥责癌症是一个隐伏的、没有感情但是却机警、诡谲的敌人……

法拉奇享有一个记者和作家很难得到的空前哀荣，舆论界排着队向她发奖。





1. 一个精彩的故事再也没了下文

法拉奇丰富的采访作品和曲折的个人经历，显示了一个从社会最低层冲杀而出，铿锵奋进，一步步进入社会宝塔顶端的不凡的人生历练，是一个足以打动人心的非同寻常的故事。

法拉奇的童年时代为她后来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她的父母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都沉湎于各种版本的图书世界里，他们对书籍的挚爱，对知识的向往，使他们见解脱俗，谈吐非凡，深深影响了童年的法拉奇，他们甚至向法拉奇热情推荐刚出版的一本本新书。法拉奇的作品中，曾出现过全家一起讨论托尔斯泰和狄更斯的动人情景。

她的父母都是反法西斯的坚定战士，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热情助人的优秀品质。法拉奇的父亲曾遭到法西斯分子的逮捕，受尽折磨，还一度被判处死刑。年轻的法拉奇去监狱探望父亲的情景，更坚定了她崇尚正义，反对极权的态度，并把这些内心深处的记忆，写入了她后来的作品中。

二战时期，当美国飞机轮番轰炸佛罗伦萨的时候，法拉奇还是个十多岁的孩子，她和全家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非常生气，走过来狠狠掴了她一个耳光：“女孩子是不哭的！”后来，法拉奇在文中写道：“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亲切的吻。”父亲的耳光对于法拉奇是力量与坚强的启蒙。后来她回忆说：“我始终同情不幸的人，但更同情坚强的勇士……”这句话也是她一生的座右铭。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城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伟大艺术家的诞生，使这个城市闪烁着文明和人文的光芒。在这里，十岁的法拉奇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一篇童话。6年后她进

入伽利略医科学学校学习。在校期间她不断为报刊撰稿，为她后来进入意大利最大的日报《晚邮报》担任报道员提供了赛前的演练。她此时的作品主要有刊登于《意大利中部晨报》的《艺术家和穷人的庇护所：一个忧伤的故事》《英国妇女画像》《没有翅膀的苍穹》等专访文章。刊登于《西西里人民》《新民众》上的《石油是伊朗的生命线》《和皇后一起喝茶》等。

1948年，法拉奇成为《晚邮报》记者，开始正式的新闻生涯。18岁的她，风华强劲，充满问鼎世界的朝气和锐志。她的古典文学素养，对社会生活的渴望，严谨细致的敬业精神，为她播下了成功的种子。

法拉奇早期的作品内容广泛，除了犯罪的社会新闻外，还报道过当地的时装业巨子、电影明星、肿瘤医院的院长、住在公寓顶层的百岁老人等。她定期去法庭旁听，从而获取新闻线索。有许多内容是关于反独裁、反战争的题材。

1953年至1976年她断续供职于《欧洲人》杂志。她的文章由短到长，运用各种方法增加趣味，内涵愈加丰富和深厚，主题内容更加鲜明。1954年她在该杂志上发表了30篇文章，1955年发表44篇，1956年发表24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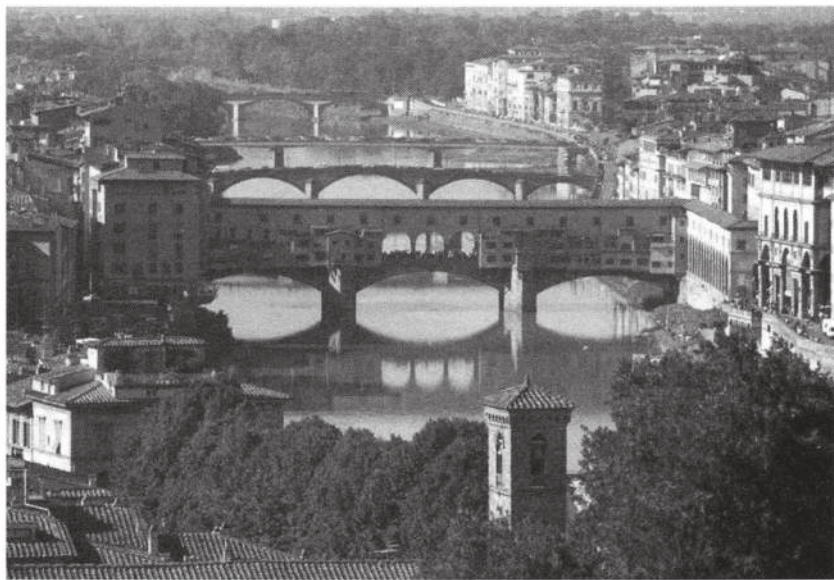
后来的3年中，她发表了70多篇文章，有挪威、丹麦和希腊王室的报道，有演艺界名人的消息，以及暗杀肯尼迪总统的事件等，也不乏社会生活、时装新闻。

1965年，她与另一位记者进行横跨美国的旅行，陆续在《欧洲人》上发表了《我们要去征服西方》《纳瓦霍之路》《最后的牛仔》《莫斯科的恐惧》《阿拉巴马的阿诺河之外》5篇游记和报告文学。她还采访了多篇有关人类征服月球的文章，并于1966年推出了文集《假如太阳陨落》，由纽约的阿西奈姆出版社出版。





1966年她撰写了两篇有关青少年的文章：《可怕的小家伙》《青少年调查》。三篇有关种族主义的文章：《狙击手在射击》《你们想从白人那里得到什么》《我已准备好杀戮》。



法拉奇的故乡佛罗伦萨之桥，桥下流淌的河水，哺育了但丁、伽利略、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伟大的文学家和科学家、艺术家，他们都曾在此生活，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标本。

1967年她发表了幽默的“美国来信”：《中央情报局在我的电话里打喷嚏》《如何把香蕉当烟抽》《他们向我要我的蛋》等。

此后，她开始成为一名自由记者。在为《晚邮报》和《欧洲人》等和她关系悠久的报刊供稿外，还陆续和世界上一些有影响的报刊签约合作，曾担任《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报社特约记者，她的文章见诸世界各大报刊，搭建起了她影响世界舆论的强大平台。

她在担任驻越南战地记者的八年时间里，写出了大量的战地新闻，在残酷战争的炼狱之中，体验着东南亚的血腥灾难：她亲自参加士兵的

巡逻，以体验他们杀死敌人的渴望；她站在猛烈轰击对方的大炮阵地上，记录战争的实态。她在死亡的阴影里写下了《西贡故事》《我回到烈焰中的西贡》《他是越共，他是囚犯》《战俘在越南》《胡志明的一生》《我受到了武元甲将军的接见》等数十篇战场纪实。

在中东战场上，她写出了《在阿拉伯游击队员中间》《阿拉伯游击队的真正领袖》《约旦侯赛因》等一线战场采访记。

20世纪70年代初，她转战在印巴战场上，采访了交战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发表了《孟加拉“猛虎”的真面目》《布托对英迪拉·甘地的回答》等文章，是当时关于印巴战事最及时的权威报道。

20世纪的中后期，世界上地区动荡此起彼伏，法拉奇始终处于世界矛盾的中心地区，守土尽责，从不虚位。即使受伤倒在交战的前方，也从不言退。1968年9月底，墨西哥城学生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运动，法拉奇只身飞抵该城，连续写出了《墨西哥城在六小时的战斗中陷入混乱》《墨西哥日记》等纪实报道。她始终与青年学生们坚守在广场中心，军方射出的子弹，一次击中她的肩部，一次击中胳膊。她虽然受伤倒了下去，但一个捍卫民主、反对专制的形象却在千百万公众的心中树立起来。她每天收到数以百计的慰问电，病房里堆满了社会各界送来的鲜花。

她在先后30多年的时间里，采访了一系列国际风云人物，并发表了相关的长篇采访作品。这些活跃在世界政坛的精英和各界名流在她的笔下各领风骚：

邓小平：充满智慧、坦诚与儒雅，堪称一位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

布托：一个憎恨无比强烈，用感情替代理智的总理。

巴列维：由狂妄产生苦恼，进而走向残忍，是一位深受折磨的冷漠之君。





梅厄：作为一位善良和正直的女性政治家，保持着百分之百的淑女风范。

霍梅尼：既是一个宗教狂人，也是一个机智老到的政治领袖。

侯赛因：善于成功地掩饰自己情感的矛盾中的国王。

海尔·塞拉西：恪守腐朽陈旧准则的偶像，世界实行最专制统治的皇帝。

瓦文萨：一个浅薄无知、让克里姆林宫发疯的人。

……

此时，法拉奇还继续为《华盛顿邮报》《晚邮报》提供专稿，有《欧洲人对卡扎菲的恐惧情绪》《沙漠里已充斥着血腥味》《仇恨中的科威特城》《我想我要去拯救科威特城》等。

在结束了大半生的记者生涯，淡出新闻界后，法拉奇住在曼哈顿的一套高层公寓里，一面继续担任自由撰稿人，一面笔耕不辍，著书立说。

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年她和母亲的对话，那是影响她一生的对话：

“那时我五六岁，站在床上，妈妈正给我穿一件粗羊毛内衣，衣服很小很紧，我的手搭在妈妈肩膀上，回头看见她的脸和泪水。”

“妈妈说：‘你绝不能做我现在做的事。你绝不能成为人母、人妻！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奴隶！你一定要去工作，去全世界旅行！’”

据新闻史料记载，“新闻”一词就源于德文的“旅行”，后来才逐渐演变成“报道”，继而又发展成为“新闻”，同“记者”一词联系在一起。

法拉奇正是波谲云诡的历史风云中不倦的“旅行者”。

2. 将生命的印记留给世界

或许是阿莱科斯之死给了法拉奇太大的打击，或许长达30多年的战地和时政记者生涯让她疲惫和厌倦，法拉奇目睹国际政治的一幕幕风云变幻，心灵渴求宁静。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伊始，现代战争的残酷和血腥就撞击着她的心。在纽约的住所里，她一次次抬起眼睛，看着自己手指间缓缓飘散的烟雾，仿佛在寻求对生命的渴望和爱恋。她说：“没有什么像战争那样暴露着我们的本性。这是人类最大的不幸。”

法拉奇曾多次赶赴贝鲁特采访，因为那里有400多名美国和法国的维和士兵先后死于恐怖分子的炸弹。可是到了贝鲁特后，她忽然手足无措起来，不知写些什么：“如果像以前一样，做别的记者正在做的事吗？”她问责自己。

她已经有了丰富的人生履历，领略了过多的痛苦和悲伤，她向自己的心灵深处苦苦探寻。虽然精力不再充沛，但她想在自己的晚年里，尽力把自己多年来对人性的见解抒发到一本书中。于是她开始酝酿平生的第九本小说《印萨安拉》（“假如真主允许”）。这本取材于贝鲁特战场的作品，描写的不仅是残酷的战争场面，更着意于展现人类精神的内在动力——战争中士兵们的个体感觉。死神在生活中徘徊，虽然人生无常，但年轻的士兵们充满对战争的冒险性、赌博性、挑战性和神秘性的热爱。其主题当然是反战、热爱自由与生命。

她憎恨战争，深深爱着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年轻士兵，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孩子；

战争中充满血腥的爆炸场面在她眼前晃动，她从中寻找人生中至爱的踪迹。

法拉奇奔赴贝鲁特采访留下了一捆捆素材，记下了她观察到的一





切。这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讲述维和部队如何因损失惨重而被迫退出贝鲁特战场。但是在接受生与死考验的关头，意大利士兵却留了下来。全书笼罩着一种悲剧气氛，命运成为一种看不见又挣不脱的力量，给人类带来光荣，也送来悲哀。

她伏案疾书，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一方天地，在内心感情的波澜中度过孤独的岁月。为了使自已处于写作的亢奋中，法拉奇每天又要抽上60支烟！

1991年的一天，有位亲近的朋友到家里来看她，发现她的脸上挂满泪水，疲惫地倒在沙发上，脸色苍白。忙问：“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法拉奇把厚厚的书稿无力地一摊，低泣道：“噢！这部书写完了，译完了，我的孩子，他刚刚被我杀死。”她的孩子是小说中一位名叫比拉的士兵，在战斗中英勇就义。

法拉奇的父亲在她紧张的创作期间去世了，这更引起她的伤感和悲凉。父亲是患癌症死的，但临终前仍不失一条硬汉，这为她做出了榜样。“像一口抽干了水的枯井，我渴望着水的重新涨满。”她愿自己也能平静而微笑着面对毁灭她的事物。

长达30多万字的《印萨安拉》首次出版，就引起社会的热烈反



佚名作者的法拉奇漫画。

响，意大利售出60多万册。1992年，英文版《印萨安拉》由美国双日出版社出版，并迅即再版。该书以20多种文字在世界发行，获得了海明威文学奖和国际安提伯斯奖。

加拿大文学评论家保罗·威廉·罗伯慈称《印萨安拉》是一部杰作，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10部作品之一，他这样写道：“我为这部作品浑身颤抖、口干舌燥、狂喜不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人类的第二个千禧年来临之前会出现这样一部巨著。任何一个关注文学、关注生命、关注人类生存条件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部有关文学、爱情和解决死亡之道的煌煌大作，否则便是人生的一大损失。”

1992年底，法拉奇因患乳腺癌，在纽约隐居治疗。她中断治疗，仍抱病来到美国旧金山，应邀向数以千计的听众朗诵《印萨安拉》的片断。旧金山的上空回响着她依然铿锵、极富感染力的声音。她的激情与斗志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法拉奇一生致力于把最美好的东西展示给世人，同样也要展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旧金山的新闻记者们围住她，要她谈谈自己的病情，被她严词拒绝，“你们在做什么呢？要我乞求怜悯和同情吗？你们去做些更有意义的事吧！”

她在她的最后一部作品中曾写道：“我已经历尽沧桑。在我还是一个小姑娘时，我就知道追求真理、和平和自由是世间最美好的使命。我始终不渝地追求着这个梦想，做了命运要我该做的事。”

她还说：“我主要的三本书都是讲死亡或是涉及到死亡，我对死亡的痛恨，我对死亡的抗争。唯有自由是其中另外的元素。而真正推动我写作的是我对死亡主题的摆脱不了的情结。”

隐居接受治疗以后，法拉奇在沉思和追忆中，先后出版了4本新书，其中2002年的《愤怒与自豪》、2004年的《理性的力量》、2006





年的《启示录》被称为“愤怒与自豪三部曲。”2004年她出版了《对自己的采访》。这些著作在欧洲的总销量已经超过400万册，相继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发行。

3. 向死而生

2006年9月14日，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的法拉奇，在她的家乡——有着“文艺复兴摇篮”之称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市一家私人诊所去世，享年77岁。她去世的消息是由她的出版商于次日宣布的。此时距“9·11”的五周年祭只有4天。



法拉奇去世后，西方记者趋之若鹜，采集有关她的新闻。

似乎有行将就木，落叶归根的某种感应，她在去世前的4天，发现病情恶化时，执意从已经居住了10多年的美国纽约回到了佛罗伦萨。

明晃晃的阳光照耀着头发散乱、疲惫不堪的法拉奇，淡棕色的头发散落在肩头，她安静地躺卧在床上。从童年起就侵袭着她的阴影再度梦魇般地掠过，死亡使她心绪不宁。她在房间里摆满了她的爱物——各种

图书和纪念品。她的财富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套罕见的出版于18世纪的插图本《莎士比亚全集》。

自从1992年法拉奇查出患乳腺癌后，她与之顽强抗争了整整14年。她在自己最后一本书《对自己的采访》中，讲述了自己和疾病作斗争的生动故事——

在一个难忘的冬天，她发现自己的左乳下有一个很大的肿块，她按一下，感到痛疼难忍，她立即得出了一个宿命的结论：“那是肿瘤，我完了。”尽管她应该马上去医院或化疗，或手术，但她却什么也没有做。她要如期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和法文，只有置自己的健康于不顾：“我决定什么也不说，因为我说出去，别人就会让我去看医生，那样我就完不成我的新书稿了。”她像一个患了病却不请假的士兵，仍然持枪守卫在哨位上。

法拉奇一生对自己的最大挑战，就是她和癌症的斗争。1992年7月，法拉奇在米兰接受手术之后，躺在病床上，坚持要看一眼手术中摘除的肿瘤。大夫和护士说，从来没有人要求看自己布满了癌细胞的血肉。法拉奇斩钉截铁地说：“它是我的肌体，我想看一眼！”

于是，大夫把它端进来，那是一块又长又白的肉块。法拉奇看着它，突然像诅咒仇敌一样指着它说：“你这个可恶的王八蛋！你不敢再回来了。你在我身体里留下孩子了吗？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赢不了我的！”

医生们看着这个场面，喃喃地说：“哦，上帝……”

癌症已经成为一个隐伏的、没有感情但是却机警、诡谲的敌人。它已经杀害了法拉奇的母亲、父亲和她的妹妹尼拉，并且已经侵入了她的另一个妹妹宝拉的体内，这个异物当然也不会放过她。她知道命运为什么没有让她死在越南、墨西哥和孟加拉，因为有某种更高的权力让她死





于癌症。

法拉奇把这场灾难此时的爆发，归于1991年她在科威特遭遇的“黑云”。当时，萨达姆下令焚毁了635个科威特石油钻塔，每天都有300多万加仑燃烧的原油流出，滚滚浓烟随风向北飘动。一天，法拉奇正和3名同事驾车行驶在卡夫吉80英里的路上，风突然改变了方向，挟着浓烟向南吹来，顷刻间黑云就包围了他们的车子。他们流着眼泪，喉头灼痛，肠胃痉挛。满身都是黑色尘粒的司机说：“上帝啊，我们的肺完了！”



佛罗佛萨的每条街道上，都仿佛能听到昔日辉煌时代的马蹄声。而今，它因法拉奇而自豪和骄傲。

关于癌症的任何话题都会让法拉奇生气。“我不想谈论这场病。我不想让人怜悯，也不需要同情。这是我的最后愿望。”她担心魔鬼会在她完成最后一部小说之前就夺走她的生命，拼命和时间赛跑。

法拉奇有意识地在死亡面前保持尊严，她父亲去世前，她把他抱在

怀里，对他说：“以基督的名义发誓，您多么了不起，多么有勇气，真伟大啊！”父亲睁开双眼看着她，脸上露出了微笑。法拉奇也希望自己像父亲一样勇敢地去死。

9月17日，法拉奇被安葬在佛罗伦萨的一个普通公墓。

依照法拉奇的生前愿望，少数朋友们前来出席她的简单葬礼。没有任何追悼仪式，也不允许拍摄照片和录像。她母亲生前经常去祈祷的那个教堂，为法拉奇这个无神论者敲响了钟声。

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这座有着漫长历史，依旧迷人的古老名城。远处的街道、房舍、教堂的尖顶时隐时现。在目光难以穿透的地方，生命正在不安地涌动，新的生命在诞生，老去的生命在消亡，时光并不因之而凝固。

在悠远的钟声中，一个不平凡的女人走了。她生前无论面对多么威严的采访对象，也不会让自己尖锐的问题损失一点棱角。而面对死亡，她终于选择了沉默。

法拉奇享有一个记者和作家很难得到的空前哀荣，全世界的舆论界排着队向她发奖：

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现任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享誉全球的记者，一位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作家，一位在文化战场上满腔激情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他评价法拉奇是“积极投身文化战斗的斗士”。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面对妇女权利、战争中的暴行和荒诞等禁忌话题，她的声音坚毅果敢。这让她深受左派读者的欢迎，尤其是那些像她一样蔑视权威的人。”

《纽约时报》评论说：“法拉奇是一个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





为法拉奇敲响钟声的教堂。教堂边上有座八角形的洗礼堂，还有著名的青铜造的“天堂之门”……

新华社电讯稿称她为“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兼作家”，并配发了她的多幅照片。

安莎社的报道图文并茂，称赞她是“一直在与病魔作勇敢斗争的杰出女性”。

路透社用数千字叙述她的一生“她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爱，有着伟大的文明精神，是意大利极具争议的著名的新闻记者”。

国内有影响的媒体均对法拉奇进行了大量报道。《南方周末》不仅刊发了邓科的评论文章《什么造就了法拉奇神话》，同时在文化专版上进行了颇有理论分量的详尽介绍。

法拉奇再一次成为世界新闻界的传奇。她以新闻的犀利手法记录了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世界的起伏激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人世的沉浮，将不断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附录一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1980年8月21日、23日)

奥琳埃娜·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奥：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





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奥：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邓：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1962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

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奥：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

邓：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的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奥：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奥：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奥：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奥：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





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邓：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奥：我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

邓：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奥：你是否能肯定，今后事情的发展更为顺利？你们是否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因为我听说，所谓“毛主义分子”仍然存在。我说的“毛主义分子”是指“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

邓：不能低估“四人帮”的影响。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的罪行是痛恨的。这表现在“四人帮”横行、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去世时，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反抗“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最近两年，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要求。我们正在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已经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这是得人心的。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只要我们现在走的路子是对的，人民是拥护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情况就不会

重复。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1974年、1975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奥：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奥：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邓：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华国锋主席也不兼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了，党中央委员会推荐赵紫阳同志为候选人。我们这些老同志摆在那里，他们也不好工作。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个缺陷在60年代还看不出来，那时我们还年轻。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更多地是关系到我们的方针、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老同志带个头，开明一点好。





奥：我看到中国有其他的画像。在天安门我看到有马、恩、列，特别还有斯大林的画像。这些像，你们是否还要保留？

邓：要保留。“文化大革命”以前，只在重要的节日才挂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改变了做法，经常挂起。现在我们恢复过去的做法。

奥：四个现代化将使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样不可避免地引起私人投资问题。这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

邓：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

奥：那么，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都是坏的？

邓：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奥：我记得几年前，你谈到农村自留地时说过，人是需要一些个人利益来从事生产的，这是否意味着共产主义本身也要讨论呢？

邓：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奥：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说，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作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

奥：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奥：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是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奥：我们不知道。

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奥：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零分以下。

奥：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摘自《邓小平文选》)





附录二

《风云人物采访记》原著序言

我编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希望它成为当代26位政治名流的历史的直接见证，成为一部新闻报道的集子或历史文献。但我不希望它沦为了一本仅供那些研究权力之争的学者们阅读的采访集。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把自己当作一架只是机械地记录所见所闻的机器。我进行每一次采访都费了心血，像对待那些与我利害攸关，我必须态度明明的事情那样去关注我的所见所闻（事实上我对每件事情都根据我所持的道德标准明确表态）。我不是带着像解剖学家或记者所持的超然态度去会见这26位大人物的。我去见他们时往往情绪激动并带去了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我在访问他们之前总是先向自己提出。我进行这些采访的目的是希望弄明白他们在掌权时和不掌权时是怎样左右我们的命运的。我要弄明白诸如这样一些问题：历史究竟是多数人创造的，还是少数人创造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还是取决于个别几个人？

我知道这是一个没有人解答过，也永远没有人能解答的老问题，也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十分危险的陷阱，因为每一个答案的本身都包含着矛盾。难怪很多人妥协了，他们说：历史是由所有的人和个别人创造的，个别人成了领袖，因为他们生得逢时，并且知道如何利用时机。也许是这样。但是那些不愿为生活中荒唐的悲剧所欺骗的人宁可信帕斯卡的话：“如果克委巴特拉的鼻子当时长得短一些，整个世界的容貌会成为另一个样子。”他们宁可信奉伯特兰·罗素所信奉和所写的：“随它去吧，世界上发生的事由不得你，而是取决于赫鲁晓夫先生，毛泽东先生，杜勒斯先生。要是他们说‘你们去死’，我们就得死；如果他们说‘你们活下去，我们就得活下去’。”我无法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总之，我无法否认我们的生存是由

少数人决定的，是由少数人的幻想和反复无常决定的，是由少数人的能动性和意愿决定的。这些少数人，通过他们的理想、发现、革命行动、战争行动，甚至一个简单的行动或对某个暴君的谋杀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和大多数人的命运。

当然，这是一个可怕的假设，这种观点触犯人的尊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成了什么？是一群在时而高贵时而卑贱的牧人手中的绵羊？还是一批充当配角的货色或是一片飘零的落叶？为了否定这个假设也许得信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决定一切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历史是由人民通过阶级斗争创造的。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现实生活并不能肯定这种观点。你会反驳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人能证明，如果马克思不诞生或马克思没有写资本论，约翰·史密斯或马里奥·罗西会写资本论）。于是，你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促成这样的转折而不是那样的转折的是少数人；使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是少数人；理想，发现，革命行动，战争行动都来自少数人；谋杀暴君的也是少数人。你不禁不安地自问，这些少数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坚强，比我们明智，比我们有胆量吗？或者他们既不比我们好，也不比我们坏，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一些不值得我们钦佩也不值得我们生气和嫉妒的普普通通的人？

这个问题要追溯到过去，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只是学校强加给我们的那一套。谁能保证学校没有给我们灌输谎言？谁能向我们提供关于萨珊、凯撒和斯巴达克为人真诚的确凿证据？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的战绩，而对他们的人品、弱点、谎言、理性和道德却一无所知。我们手中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维琴盖托里克斯是坏蛋。我们甚至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个高个子还是矮个子，头发是金黄色的还是褐色的，受过教育还是大老粗，是否与玛丽亚·玛达雷娜同过床；不知道圣路卡、圣马太、圣马可、圣约翰关于耶稣的传说是否真实。啊，要是有谁用录音机采访过他，记录了他的声音、思想和语言就好了！啊，要是有人把圣女贞德在审讯中和在被烧死前的话速记下来就好了！啊，如果有人带着摄影机采访过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就好了！我对耳闻传下来的记事，对发表得过早，又没有证据的报道投不信任票。昨天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无法核对的故事和无法与之争辩的臆断的小说。

今天的历史就不同了，因为它是在事情发生的同时写下的。人们可以在采访时





对控制着世界和改变其进程的少数人照相，拍电影，录音；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马上加以报道，加以说明，并进行热烈地讨论。为此我热爱新闻工作，从事新闻工作。有哪一种别的什么其他职业允许你把正在发展的历史写下来，作为它的直接见证呢？新闻工作就有这种非凡和可怕的特权。理会到这一点后，很自然地会深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每当遇到一个事件或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见时总是焦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眼睛、耳朵和头脑来进行观察、倾听、思考，以便从中理解一条蛀虫如何钻入历史这块木头中去的。我说我每进行一次采访都花了心血，这并不言过其实。我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说服自己：去吧，没有必要成为希罗多德，你至少能带回一块对拼组镶嵌图案有用的小石头和对人们思考问题有用的情况。要是错了，也没有关系。

这本书就这样在7年中编成。7年中，我为“欧洲”周刊作了26次采访。我本着这种精神去访问我所要会见的人物，即：除了获取新闻以外，每次访问都力求弄清这些人物与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不同。约见他们经常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他们几乎总是以使人心寒的不予理睬或拒绝来回答我的请求（实际上本书中的26个人并不是我希望会见的全部人物），即使最后同意接见我，也要让我等上几个月以后才给我一小时或半小时的时间。当我终于见到他们时，我就得千方百计延长会见的时间。一旦见到了他们，便真相大白。我发现这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我很少遇到那种天生应该领导我们和决定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掌权者，而是一些曾经为获得这个权力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斗争，并继续在斗争着的人。至于那些在某一方面使我喜欢并对我有吸引力的人，坦白地说，我思想上对他们是有保留的，内心深处对他们是不满意的。说穿了，我对他们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感到遗憾，我无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去信任他们，因而我不能说他们是无辜的，更不能把他们当作同路人。

也许因为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它能使某些男男女女意识到自己有权力或感到他人授予这种权力去指挥别人或惩罚不服从者。无论是暴君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总统，无论是刽子手将军还是受人热爱的领袖，我认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不人道和可憎的。也许找错了，但是人间乐园并不是在上帝告知亚当和夏娃将劳累终生和备受分娩的痛苦的那一天消失的。人间乐园是在亚当和夏娃发现了存在一位不允许他们吃苹果的主人，并在他们为了一个苹果而被驱逐出家园之后不得不在星期五禁止吃肉的部落里当首领的时候消失的。是的，在有人群的地方需要有管辖人群的人，不然就会出现混乱。但是在我看来，人类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需要有人管辖他们的人，需要一个头目。没有人知道这个头目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唯一确切知道的是你不能控制他，而他却要扼杀你的自由。更糟糕的是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但是人们还是以为它真的存在而去寻求它，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感到有责任告诉读者，我坚信苹果生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入采摘，星期五也是可以吃肉的。我更有责任要使读者知道，在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的同时，我却理解那些反对、谴责和拒绝接受权力的人，特别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我把反对暴君看作是对人的诞生这个奇迹的最好利用；而对那些在暴政面前俯首帖耳、默不作声，甚至拍手叫好的人，我认为他们作为人早已名存实亡。我认为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是我与我的同志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在伯罗本尼撒半岛上见到的一件事。那是1973年夏季，帕帕多普洛斯还在台上，帕那古利斯带我去见一些抵抗运动者。我们所见到的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帜，而是3个字母OXI，希腊文的意思是“不”。这3个字母是一些渴望自由的人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时期在树上写下的。30年来，这个“不”字一直保存在那里，虽然日晒雨淋也不退色。军政府的上校们曾经用石灰浆涂抹掉它。但是，像变魔术一样，雨水和阳光很快溶化了石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字母又顽强地、无视一切地和不可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

是的，这本书没有过高的要求，它只指望成为一段由30来位大人物提供的当代历史的直接见证。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象征性的意义。虽然新版本要比原来的版本丰富，但再版时我并没有重新加工。我只是在每一篇的前言中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有的地方只是改变了动词的时态，也就是把原来的现在式改为过去





式。根据同样的原则我在新版中增加了于原书出版后进行的另外10次最重要的采访的记录。这10次采访的对象是朱里奥·安德雷奥蒂、乔治·阿门多拉、马卡利奥斯大主教、中央情报局的头子威廉·科尔比和他的对手奥蒂斯·派克、圣地亚哥·卡里略、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马里奥·苏亚雷斯和亚马尼。显然，时间会使我对某次采访的印象及对某个人的看法有所加深和发展。但是，如果我采用后来的观点来评论事情，就会使它们失去作为记录当时当地情况的文献的价值，使它们失去真实。性，就像一张经过修改的照片一样。只是在象征性地结束此书前，在介绍关于对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的访问时，我认为有必要加一段有关他的事。这不是出于个人感情，不是因为阿莱科斯曾经是我生活中的伴侣，而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他是被本书所揭露、谴责和憎恨的权力所杀害的。因此，在他被害后，我更希望读者阅读这本书，想到那个在伯罗奔尼撒岛的树上顽强地，无视一切和永不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的“不”字。

——法拉奇

附录三

法拉奇采访维利·勃兰特

历史将会判断维利·勃兰特究竟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政治家和要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一位领袖，他是西欧战后一位极不平凡的大人物。他多年领导着一个新德国，这个德国再也不引起仇恨和恐惧，相反却使别的国家感到羡慕。勃兰特有许多功劳，其中最大的就是使我们懂得德国并不意味着希特勒。他本人从14岁起就“用文字和拳头”反对希特勒。他写文章反对纳粹分子，与纳粹分子搏斗，躲过了纳粹分子的追捕，逃亡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在那里继续进行斗争。做到这一点的德国人并不多。显然，不应该由他去华沙在第三帝国屠杀的犹太人的墓前下跪，不应该由他去耶路撒冷朗诵请求宽恕的圣诗，但他这样做了。在我看来，就其重要性来说，这一行动并不亚于他的“新东方政策”，不亚于他的欧洲主义和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不如说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为社会主义奠基的人，并不能说他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位受抨击的维利·勃兰特，为德国工人谋得的福利胜过许多乌托邦。他没有取消自由。这位可敬而不可爱的人物，是在崇拜自由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为记者、作家、柏林市长和总理。他始终立场鲜明。对于希腊上校们和把持不同政见者送入精神病院的苏联官员们，维利·勃兰特是唯一以同样明确和强有力的声音进行谴责的政府首脑。

他的经历是不平凡的。1913年12月18日，他生于吕卑克市，母亲是一个年轻的没有丈夫的工会工作者。勃兰特从未见过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也不承认他。直到13岁，他才知道他父亲的名字，听起来像一个瑞典人、挪威人或丹麦人。他在一本书中写道：“孩子听到过他的名字，但对此并不感兴趣。难道会感兴趣吗？那些年月笼罩着一层暗淡无光的灰色薄纱，就像吕卑克港口上的薄雾一样。各种脸谱和





形象如同时隐时现的阴影混杂在一起……我难以相信这个叫赫伯特·弗拉姆的男孩子就是我自己。”勃兰特不喜欢谈论他父亲。当他坦率地告诉我他一直知道他父亲是谁，“战后他还活着，就在那时我也不愿见他”时，我感到惊讶。应该指出，“私生子”的烙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给他增添了不少麻烦。他的对手，特别是阿登纳，甚至在竞选运动中也无耻地利用这一点。如果它使我们在对阿登纳的看法上留下一个阴影，那么它却有利于我们对勃兰特的理解。在生活中蒙受过耻辱或痛苦的人，往往更能成为杰出的人物。美梦直至成就经常来源于饥饿和不幸。如果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坐在父亲的膝盖上游戏，也许维利·勃兰特就不是今天的维利·勃兰特了。

他不太像他的同胞。他当了12年的挪威人。他坦率而诚恳地大胆承认，在他的血液中还有挪威人的成份。“当一个人刚跨进少年时期就逃往另一个国家，掌握了它的语言，吸收了它的文化，他就失去了第一个祖国，又找到了另一个祖国。对我来说，挪威是第二祖国。”那么，他现在是否仍然坚持这一点？你越仔细观察他，听他讲话，就越产生这样的疑问。他到底哪部分像德国人，哪部分像挪威人？他在挪威有一所住宅，每年回去度假，他在挪威有知心朋友。他在挪威娶过第一个和第二个妻子，因而他的孩子有一半是挪威人。他用挪威文写的文章胜于用德文写的文章。这也是阿登纳攻击他的一个借口，称他为“外来户”、外国人。他对护照很不在乎，可以说，是嗤之以鼻。一个丝毫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人，曾经代表而且仍代表着一个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这岂不是妙不可言吗？直到1946年，勃兰特才重新成为德国公民。选举他有助于维护新德国的荣誉，而散布针对他的丑闻，使他丧失威信，则是新德国的耻辱。无论怎样考虑问题，利用他的秘书为苏联人当间谍这件事制造丑闻以及后来对他的讹诈都是不值得的。讹诈是件极不光彩的事。

采访是在总理府他的办公室里进行的，那是1973年8月28日星期三和9月3日星期一，共两次。一篇采访记录能够如此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一个人物的肖像是不多见的。这不仅是由于他说的那些话的内容，而且还由于他说那些话时所采用的方式和方法。他讲话准确、详尽、严谨，几乎没有使用过有损于他的端庄和镇定的语言，也没有泄露过有害于他自己的机密。如果你想进一步挖掘他的思想深处，他会有礼貌地退却，沉默不语。我多次尝试都未能成功。当我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向他

提问时，他的大门是敞开的。但当我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向他提问时，他的大门就马上关闭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小心且固执的人。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喜欢女人、葡萄酒、啤酒和喜欢爽朗大笑的快活人，我却看不出这一点。我更容易把他看成在这篇采访记录中他所讲述的挪威海边的农民。倔强、粗壮、铁一般的刚强、讨厌任何赘言。甚至在他接待你时的那种亲切和蔼的举动中，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我没有能够和他单独谈话是一件憾事。采访时，在场的有他的顾问克劳斯·哈普雷希特，他的新闻办公室主任和速记员。这位速记员不满足于手记，还在我的录音机旁也放了一部录音机。这好像是一次正式会议或高级会谈。这是勃兰特要求的。虽然开始时我有点讨厌，但我很快便对他产生了敬意。能跟处事严肃的人在一起，是多么大的安慰啊！

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勃兰特总理，坦率地说，我不知从哪儿开始提问。要问您的事情太多了，包括您的名字的来历。它不是您出生时的名字。您出生时叫赫伯特·弗拉姆……

勃兰特（以下简称“勃”）：是的，维利·勃兰特这个名字我是从1933年初开始使用的，也就是在我离开德国以前和纳粹分子上台以后。那是我用来从事反对希特勒的地下活动的“化名”。我用这个名字在19岁那年逃亡国外。我用这个名字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用这个名字，我从事政治活动，直到成年，直到战后又回到德国。我的一切都与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用我出生时的名字。

法：这就是说，您结婚和加入挪威国籍时也用维利·勃兰特这个名字。好吧，也许我们应该从这个问题谈起，也就是您曾多年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除犹太人外，当时离开希特勒德国的德国人并不很多。

勃：相反，离开的人不少。以我出生的吕卑克市为例，很多人都走了，几乎所有走的人年龄都比我大。我为什么离开德国呢？要是我留下来，他们将逮捕我，并把我送进集中营。当时我没有多少逃脱的可能。即使不逃亡国外，当时我也必须离开吕卑克。但即使离开吕卑克，我也不能上大学，这是我出走的一个原因。上完中学我干了一年的经纪人，这个工作还算有趣。但我想学历史，而当时在希特勒的德国学历史已不可能。因此只要我遇到合适的机会……当时我的小组里有一个人要逃往挪威。他准备在那里开设一个办事处，负责我们抵抗运动的事情。他一切都准备





就绪，一个渔夫要从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把他接走。我的任务是帮他逃走，也已经帮助了他。但是这个人没有走成。他被逮捕，送进了集中营。当时柏林的朋友们问我是愿意代替他，我接受了。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意味着将在国外呆那么长的时间，因为很多人认为纳粹统治不会太久，有人认为它一年后就要完蛋，最多不超过4年。我虽不是乐观主义者，但是也认为不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更长，可是事实上却持续了12年。

法：正是您在斯堪的纳维亚度过的那12年，使您的对手们经常对您进行指责。因此，我的问题是：您对没有在德国直接参加对纳粹的斗争感到遗憾吗？

勃：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我的表现都说明，一旦需要，我随时准备冒生命危险。我曾秘密潜回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几个月后因为他们要逮捕我，我又第二次逃亡。我前往希特勒占领的挪威和瑞典。所以我也冒过风险的。如果用推理的方法来考虑您的问题，那么我的回答是：如果我不离开祖国而留在德国，也许我就没有同样的机会得到锻炼和成长，因而也不可能从事我在柏林时以及在那以后所从事的工作。我指的特别是我在欧洲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活动。自然，任何事情都必须付出代价。我所付的代价与我的大多数同胞所付的代价是很不相同的。我的代价就是出走。是的，对有的人来说，这种支付代价的方式似乎会使他感到奇怪。所以这就成为我的对手们掀起反对我的运动的借口。我对这些人的回答是：那么，许多德国人承认我、信任我也同样是奇怪的。我说的是奇怪，对吗？我应该说妙极了。许多德国人信任一个其生活经历与他们不同的人，这是一件很妙的事情。这个人的生活经历不比他们的好，但不同。

法：勃兰特总理，我猜测您在谈论出国后付出的代价时也暗指您失去德国国籍的问题。您在丢了德国国籍加入挪威国籍时有没有感到痛苦？

勃：没有。

法：为什么？您是不是太热爱挪威了？

勃：是的。我把挪威看成是我的第二祖国。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去国外，在那个国家定居，生活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而且学会了那里的语言……我很快学会了挪威语，我也学得不错。我曾多次说过，我用挪威文写的文章比用德文写的文章要好得多。过去的确如此，尽管现在有所不同。此外，当接纳你的国家使你有许多朋友时，当你彻底吸收了这个国家的文化时，你很容易做到这点，因为你也来自波罗的

海……你感到你与你的同胞是不同的，你增添了一些在正常的情况下不能得到的东西：我说明白了吗？我的意思是说，开始时你失去了一个国家，而最终又找到了另一个国家。这不是今天才发现的，我一直承认这个事实。战争期间，我在出版于瑞典的一本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为争取自由的挪威和民主的德国而奋斗，也就是为争取一个欧洲人可以在那里生活的欧洲而奋斗”。总之，加入挪威国籍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抛弃德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并不意味着抛弃我主张的德国。

法：那么我想反过来问您，您在丢了挪威国籍又重新加入德国国籍时是否感到痛苦？

勃：没有。有的国家不要求你作这种选择。要是我成为美国公民，我就不需要归还护照，最多不过保持双重国籍。在挪威没有这种先例。要么是挪威公民，要么不是。因此我痛快地归还了挪威护照，而且我非常清楚，护照不会影响一个人的立场和原有的关系。我知道我还会回到挪威去，那里仍然有我的朋友，回去后，我仍然讲挪威话。总之，我原有的关系绝不会因为我缺乏一份护照而中断。许多人的护照不符合他们的国籍。要是您问我“难道护照不重要吗？”我的回答是：是重要的，特别是在通过国境时，但是证件的重要性经常是被夸大的。国民的身份是另外一回事。

法：这就是说，您是为了寻求国民身份，寻找祖国，战后才重返柏林的？

勃：不是。1945年秋天和1946年，我以记者身份两次回过德国。我回德国是为了报道纽伦堡审讯，同时也想到各地去看一看。我被聘请去德国领导一家报纸或一个新闻社，但事情进行得不顺利。于是我的好朋友，当时挪威首相兼外交大臣霍尔瓦德·兰格对我说：“要是你一年之内不回德国，为什么你不作为我部的成员去巴黎执行挪威的使命？”正当我准备接受他的建议时，他改变了主意。他对我说：“我认为你最好以新闻专员的身份去柏林，任务是向挪威政府提供政治情报和提出你的看法。”于是我去了柏林。很明显，柏林之行加速了我确定自身归宿的过程；而且同样明显的是，比起去巴黎，柏林之行更能使我加速这个过程。如果我到巴黎去，我可能进入某个国际组织，那起码还得有几年……

法：……继续当挪威公民？

勃：是的。至少会再当一段时间的挪威公民。最终也许不会当了。事实上，要是我再等些时候，我根本没有必要重新申请德国国籍。根据1949年的宪法，我只





要去某个办事处对他们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恢复被纳粹分子剥夺的我的国籍”就够了。我是1948年春天，也就是新德国出现之前，申请恢复德国公民权的。在施勒斯维希·霍尔施泰因政府时期，他们在印有十字记号的纸上恢复了我的国籍！真的如此！当时穷得连新印制的表格都没有。他们不得不用墨水随便把十字涂掉。这个证件我保存在家里作为纪念，它说明我是怎样重新成为德国公民的。

法：很有意思。但是我不能相信您回德国是出于偶然，而不是出于感情。

勃：然而事实却是如此。这不是一件涉及感情的事，不是。我回柏林只是因为柏林引起大家的兴趣，是东西方争执的中心，是个值得去的地方。至于这一点加速了我确定自身归宿的进程，这是另一回事。我指的不仅是政治上归化的进程，而且也指与生活在苦难和失败中的人们融为一体。当时的柏林是一片废墟，但在废墟中可以看到人民的优良素质。是的，这种素质往往在逆境中表现出来，可是每次都使人吃惊。啊，柏林人的士气从来没有像战后头几年那么高涨。即使在封锁时期，也没有那么高涨，因此，我确定自身归宿的进程……

法：但是您说的归宿是指的什么？是大家称作回祖国的概念吗？

勃：不是，不是祖国征服了我，而是人民，是经历了专制、战争和崩溃之后又试图在自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生活的人民。是的，是人民使我重新成为德国公民，是他们每个人那种惊人的工作热情，是他们那种完成任何工作的能力，是他们那种互相帮助的精神……我们变得富裕之后便失掉了这种精神。当时的经济是困难的，但那时的气氛给人以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印象。您明白吗？这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因素，还不如说是人的道德价值的问题。我愈想愈深信，关于欧洲的思想，更确切地说关于欧洲未来的思想，在我身上扎根，正是在我在柏林的那些岁月里。

法：勃兰特总理，我正在想，从您的内心深处，甚至从您的思想深处来看，与其说您是德国人，还不如说您是欧洲人。

勃：啊……让一个年近六旬的德国总理承认这一点未免太过分了，特别是他知道欧洲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发展。不能要求我感到自己与其说是德国人还不如说是欧洲人，也不能要求我这样行动，甚至也不能要求我给人这样的印象。可以这样说：我在承担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责任时，也努力成为一个出色的欧洲人。至于您的问题，我只能回答：我不是欧洲人，我是德国人。

法：我明白了。那么……我想到了您对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访问。我想问您，

您在多大程度上感到您这一代人所承担的德国人的罪责？

勃：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我问心无愧，而且我认为把罪过归咎于我国人民和我这一代人是公平的，也是不对的。罪过只能由某个人去承担，绝不能让人民或一代人去承担。责任就不同了。尽管我很早就离开了德国，尽管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希特勒，但用句婉转的话说，不能排除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或者称为连带责任。是的，即便我当时脱离了我国人民，对希特勒的上台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事实上，我们应该自问：希特勒为什么能掌权？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这不仅因为有千百万人愚蠢地追随他，而且还因为其他的人都未能制止他。是的，当时我还很年轻，但我也属于那些未能制止他的人中的一个。在人民的生活中，决定的时刻是在政权就要落入罪犯之手的时候，也是在具备保持一个负责的政府的客观条件（但未加以利用）的时候，因为在这以后，人民就无能为力了，要把已经掌握了政权的罪犯赶下台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总之，我认为在他们掌权以前人民有责任，以后就没有责任了。不幸的是青年人也有这种责任，当然与他们父辈的责任不一样。但是……您刚才提到去华沙……

法：勃兰特总理，您为什么在华沙下跪？

勃：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认罪，而是因为我想到我国人民在一起，也就是说和这样的人民在一起，他们当中也出现过犯有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那个举动不仅是针对波兰人的，而且也是针对德国人的。认为我那个举动只是针对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是不对的。我也是，首先是针对本国人民的。因为许多人，甚至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

法：勃兰特总理，您那个举动是临时作出的还是事先有所准备？

勃：事先我没有考虑。下意识这类东西，事先怎么知道呢？当然，我这种下意识早就存在。我记得那天早晨醒来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不能仅限于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后来，我突然感到有必要下跪。

法：那么，您最近一次访问以色列时在亚德瓦希姆发生的事呢？在亚德瓦希姆的举动不可能是临时决定的。

勃：您说得对。对于将在以色列干些什么，在去之前我考虑了得久。我曾经听说人们叫亚德瓦希姆为真理之地，是超出人的头脑所能想象的。可怕的真理之地，





我想具体体现这个真理，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就说明人间是有地狱的。这一点好像在华沙我已谈过。我想当我在瑞典了解到当时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也说过。我比当时生活在德国或德国之外的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得早。因而，当我准备去以色列时，我刚才向您解释的那种连带责任感便向我袭来，就像在华沙时一样，我对自己说不能仅仅面无表情或激动地献一个花圈就完事。一旦我面对面地站在曾经发生的事实面前，应对我过去的无能为力有所表示。您明白吗？我想有所表示，不愿意无动于衷。我反复地对自己说，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啊，当然我不能轻率地说这是和解，因为这不取决于我。我认为我找到的解决办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与犹太人之间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是共同的，那就是圣经，至少是旧约。因此我决定念第103条圣经，从第8行到16行：“他们将逃避你的威胁，听到你的声音就胆战心惊……”我决定用德文念，即用马丁·路德的语言来念。可是，有些词句是难懂的，尤其对青年人来说是如此。于是在我飞往特拉维夫时，我仔细地研究了经文，把马丁·路德的德文译文与希伯来语的版本作了比较。我几乎保留了所有马丁·路德的富有诗意的词句，增加了犹太圣经的几句话。我想以色列人懂得了我的意思，因此他们一直很感激我。

法：您很重视以色列之行，对吗？也许比华沙之行更重视。

勃：这是两回事，因为在华沙我不认识任何人，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而在以色列则是另一回事：我在1960年曾经以柏林市长的身份去过一次，在那里我会见过本·古里安和艾斯科尔。另外，在社会党的国际会议上我多次见过果尔达·梅厄。但是……是的，我重视今年6月份的那次访问，这是因为那次访问我是作为我国和我国人民的代表去的。总之，我不是作为维利·勃兰特个人，而是作为新德国的代表。说得更清楚一些，那就是说，耶路撒冷不是我第一个，也不是我最后一个重温过去的地方。事实上，我去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也会去利迪策的。然而耶路撒冷却是最重要的一站，因为它最完整地体现了我们黑暗过去。它要我们承认作为德国人的责任。它告诉我们，我们过去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忘记或抹掉。不，不应该……不应该……现在没有什么可认罪的了，大家都已经知道。但是承认我们的责任……这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我们都应该生活在一起。

法：可是，去年11月份我采访果尔达·梅厄时，她告诉我，她永远也不会踏

进德国领土。

勃：我知道，她跟别人也说过。然而我不能因此而责备她。但我正式邀请过她，她不管在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都接受了邀请。我希望她能来访问，我衷心地希望。我确信她是准备来的。我高兴地看到，我的以色列之行有助于她产生踏进德国领土的念头。果尔达是个伟大的女性、是个富有魅力的女性、是个圣经中的圣贤女性。大家都了解她的品德，只有那些老古董才说这些品德是男性公民的。例如：她那钢铁般的力量，她那机智的头脑。这既不是男性的天赋，也不是女性的天赋，而仅仅是天赋。另外，梅厄待人极其亲切……我说她会来的。

法：这种信念很好地说明了维利·勃兰特是什么样的人。谈到信念，我想再谈谈我们曾涉及到的、必须跟您深入探讨的话题，就是欧洲联合的问题。勃兰特总理，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时有些不安，难道您从来也不怀疑欧洲联合是一种乌托邦吗？

勃：不。欧洲是可以联合的。欧洲正在联合起来。当然，欧洲还没有联合起来，也不能像美国朋友希望的那样成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美国人认为可能用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方式统一欧洲是错误的。这种类比毫无意义。美国的情况和我们的情况有天壤之别，统一欧洲完全是另一回事。统一欧洲意味着在保持各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欧洲政府的结构。尽管进程很缓慢——这是不幸的，尽管没有政治魅力，尽管遇到官僚程序上的重重障碍，但是，欧洲不是正在统一吗？在欧洲不是能自由走动吗？欧洲的交往不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吗？是的，欧洲正在统一起来！当我对比今天的欧洲共同体和四五年前的欧洲共同体时，我对这点就越来越深信不疑。

法：但是，勃兰特总理，我们称之为欧洲的欧洲是一个很小的欧洲！连欧洲的一半都不到！

勃：当然，如果我们能建立“欧洲合众国”，我是十分高兴的。如果我能够在全部统一的欧洲和部分统一的欧洲之间作出选择的话，那么，无需多说，我愿意选择第一种。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在不完善的解决方案和最完善的解决方案之间做选择。我们必须在欧洲已经一分为二的基础上工作，甚至一分为三。我们必须在西欧的基础上工作，也就是为建立一个共同的政府机构而努力；然后通过业已开始的缓和政策来增进东欧和西欧之间的联系，尽管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我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的政治结构和我们的政治结构之间存在着差别。噢，要是





人向我提供联合比西欧更大的地区的办法，那么，我会说，好，好极了，谢谢。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特别是还存在着我称为第三方面的力量这一事实，即欧洲加美国，也就是在安全方面美国作为欧洲的一部分……

法：这就是说，您考虑的不是中立的欧洲，不是在两个大国之间起平衡作用的欧洲？

勃：不是，我不把欧洲看成是置于世界两个大国之间的一种力量。一方面这是因为当人们谈论世界大国时，不应该说两个大国，而应该说三个大国，所以欧洲应该是第四个大国，还要再加上第五个大国，就是日本。另一方面说欧洲是第四大国也不确切，因为如果统一的欧洲从事贸易，它将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不，我不想给人以印象，似乎我希望建立一个在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两大集团之间执行中立政策的欧洲。自然，我希望与美国的关系不同于与苏联的关系。我希望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虽然同时希望执行独立的政策。再说，我相信，美国看到我们今后的行动将比现在更成熟也会高兴的。

法：那么……德国的统一呢？事情既然如此，您认为自己还能看到德国的统一吗？

勃：不能，我想是不可能看到的。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已年近六旬。我并不想成为马士撒拉。如果我能成为马士撒拉的话，也许我的回答就会是肯定的。因为我要看到德国统一，起码要象高加索的某些老人那样活到130岁。甚至再过20年或50年，我也不能看到德国问题的单独解决。不，我甚至不能想象德国问题会单独解决。我认为两个德国关系的变化只能是两个欧洲关系变化的结果。因此，您可以注意到，我没有给您一个乐观的回答，但是我的回答包含着由欧洲解决两个德国分裂的可能性。但是请注意，如果实现了这种可能性，也不意味着我们还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那将意味着两个德国的德国人期望建立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关系和生活。

法：勃兰特总理，您在谈到西欧时，很显然，您是指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欧洲。那么，您认为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

勃：意味着三件事，因为这是要做的三件事。第一件是经济一体化。这个过程正在进行，而且我认为它正朝着共同的货币体制方向发展。这不是指大家必须使用同一种货币，而是指在我们的货币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是的，我们肯定会以某种

方式建立欧洲共同银行，以某种方式实现货币和经济联合。第二件事，我叫它欧洲的社会联合。我说的“社会联合”并不仅仅指旧的含义上的社会政策，即不仅仅指工团主义者所指的那种意思，那种意思也是重要的。我说的社会联合，用现代的口号说，叫“生活的质量”。换句话说，我指的并不仅仅是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并不是目的。我指的环境保护问题，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教育问题……要有足够的雄心壮志去达到如下的目标。从社会角度来看，十年后统一的西欧将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地区。十年是足够的，用十年的时间我们能够实现。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建立共同的政治结构，因为没有经济一体化和社会联合，共同的政治结构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三件事是保持各自民族的特点。如果没有这一条，那将是一场灾难。

法：您说得很对。那么在我们争取建立的美好的西欧中，我们对那些非民主国家怎么办？例如，我们对西班牙和希腊怎么办？

勃：很显然，任何不是基于我们所实行的制度的国家，即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或议会、工会组织等等，都不能成为欧洲共同体成员。很显然，任何不能最起码地尊重人权宣言的国家都不能成为我们这个欧洲的一员。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因为经验告诉我，一旦丧失了自由的国家几乎不可能重新获得自由。对此我越来越感到棘手。几乎总是在经历一场战争后才能重获自由。受专制制度压迫的民族不通过战争而找到自我解放的办法，这是很罕见的。别人的声明，其他人的措施更不能解放受压迫的民族。例如抵制它的产品，拒绝到那里去度假……都无济于事。但是历史总是发展的，有时还会出现令人满意的发展。就拿西班牙来说，我第一次接触西班牙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那时我很年轻，去西班牙当记者。我在那里呆了近6个月，主要在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我还记得两派的可怕的仇恨，我还记得农村的难以置信的贫困。从那以后，我只去过一次，在一个岛上度假。还有一次，是乘船路过，只在那里逗留了半天。那次我是要去美国，从那不勒斯上船，路过马拉加，我在那里转了转。虽然那不是个典型的地方，但从我看到的東西来看，西班牙有了非凡的发展。那已经不是我过去认识的西班牙了。因此要是在一代人以后，西班牙得到改造，成为欧洲共同体的一员，我对此并不会感到惊奇。西班牙通过发展是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

法：希腊呢？





勃：噢，希腊的情况更为复杂。我们谈论希腊时，不应该忘记，事情并不像我们的希腊朋友说的那么简单，认为1967年以前希腊有过广泛的民主，而在突然间变成了军事专政。我访问过希腊，那时卡拉曼利斯是总理。我结识了卡纳洛普洛斯，他今天是非常勇敢的反对派。啊，卡纳洛普洛斯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与德国文化还有很深的联系。这些年来，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但是，我在雅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与我在世界其他地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有很大不同。那次倒很像我在民主很有限的国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所以希腊未来的发展很难预料。我只希望代表自由和未来的力量在希腊能够相当强大。如果是这样的话，毫无疑问他们会在国外找到许多朋友。还有一点，民主是不能用武器获得的，武器只在战时才有用处。不过我想，如果希腊人民愿意的话，他们能够重获自由。如果出现特殊形势，他们能够做到，甚至不需使用武力。到那时，有能力支援他们的外国朋友的援助就不是无足轻重的了。

法：很好。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维利·勃兰特这个话题上。我们扯得有点远了……总理先生，我想起您的时候总觉得您是新闻记者。您的记者生涯太长了。您为什么搞新闻工作？

勃：您看，搞新闻工作对我来说不过是谋生的手段。我一直感到写东西并不难。从上中学时起我就写东西，那时是为了能继续上学。我曾在吕卓克一家报纸工作过。所以我中学毕业时，他们在我的毕业文凭上写道：“将来当新闻记者”。我不想让他们写“新闻记者”这个外来词，我希望他们写“为报纸撰写文章的作家”。那时我是左派社会主义青年，拒绝在德文里使用外国字。但是他们不听我的意见，还是写了“新闻记者”，不管怎样，从幼年起我从来就不怀疑自己将来能够成为新闻记者。我所以攻读历史也是为了当记者。我在考虑如何组织我的生活时，总是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梦想是当吕卓克一家日报的社长，然后到柏林当议员。

法：这样说，最终的目标是政治而不是新闻。

勃：就是说是政治新闻加政治吧。

法：政治还是权力？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读过您当柏林市长时说过的一句话：“权力是干一点明智的事的唯一手段”。

勃：我记不清了，大概是这意思。那是在跟我妻子讨论时说的。她担心权力的责任太大。我不喜欢权力这个词，它容易引起误会。就我来说，我喜欢用势力这个词。

若说是权力，那也要说明它是褒义的。啊，很显然，要想做些事情就必须处于能做事的地位。不一定非得当国家元首，尽管国家元首是能干很多事的。只要……只要您在这个职位上呆一段时间。

法：您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呆了很久，并且准备继续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我问您过去和现在的目的是什么？您为什么要这个权力？

勃：就国内来说，是为了实现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达到更高水平的民主化和社会平衡。我说的是社会平衡，而不是平等。就国外来说，是为了表明我们的国家与东西方都能保持睦邻关系，也许可以说我的兴趣是给德国制定一项外交政策。因为那时德国还没有外交政策。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合适，因为它没有说明是当时德国的外交政策还是分裂前的德国和后来被占领的千疮百孔的德国的外交政策。因此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我的兴趣在于在欧洲范围内给德国安排一个位置，在国内和国外建立睦邻关系。

法：我想您主要指的是您的“新东方政策”，也就是向东方开放的政策。勃兰特总理，您对执行“新东方政策”所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吗？

勃：几乎是满意的。回顾一下，我发现只有两三件事情我处理得欠妥当，但也不是非常不对。总的来说，我是够满意的，因此我得告诫自己不要像老年人那样过份洋洋自得。噢，很显然，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自夸，说自己做的事尽善尽美。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行动不是孤立的，往往是各个方面广泛行动的结果。可是……刚才在你来到这里以前，我会见了我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他向我叙述了在与其他大使包括东欧的大使的接触中听到的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他们认为我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准备在我最近访问纽约时好好接待我。是的，我感到很高兴。我的意思是说，听到他们不是用石子迎接我，这使我感到很高兴。

法：甚至在您去东德时，人们也没有在埃尔富特向您扔石子。当时群众向您热情欢呼鼓掌，您有什么感受？

勃：我非常感动，同时也感到担忧。我为他们担忧，为他们那样冒风险感到担忧。我不断向他们打手势，要他们别太激动。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危险的。

法：请允许我在此向您提一个问题，我向任何掌权的人都可能提这个问题，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你认为某个人能改变历史吗？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维利·勃兰特，您认为今天的德国还会是今天的德国吗？





勃：我认为个人在历史上起着决定的作用，但是我还认为是形势使这个或那个天才人物更为突出。当然，天才人物是客观存在的。我给您举个例子。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在1939年爆发，如果盟国不是那样地毫无准备，如果希特勒在入侵挪威和丹麦后没有向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发动进攻，那么丘吉尔将会是什么样的人物？仍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还是只不过是一个有点好打抱不平、嗓门很高的第二流的要人？时来运转，正当关键时刻，丘吉尔还年轻力壮，于是英国人便能团结在他的周围，使他发挥巨大才智。难道这意味着，如果那些事件晚发生5年，丘吉尔就不会发挥这么大的作用了吗？不是的，很难知道我们在某种形势下所做的事情别人是否能做到。戴高乐做了法国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说必须存在某种形势，而某些个人正是生活在这种形势之中。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遇到了这种形势，他就可推动历史朝某个方向，而不是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法：很奇怪，您提到了戴高乐，正是他推迟了统一欧洲的诞生。

勃：戴高乐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是独一无二的，是他使法国丢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的自卑感，是他使法国成为有名望的强国。如果从欧洲合众国的观点来看欧洲，他当然不是一个支持者。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欧洲共同体得到了发展，而没有瓦解。他当时可以制止它的发展，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在他身上。至于“新东方政策”……

法：“新东方政策”是勃兰特的，因为到东方去的是勃兰特。

勃：对，但我不排除别的人也能提出类似的政策。即使在1967和1968年我当外交部长时没有开始执行这项政策，那么后来也会有别的人提出这项政策，尽管形势不会那么有利。应该有这样的政策，否则德国就会处于困境，就会与它的最重要的盟国即美国和法国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啊，请相信我说的话。既需要有人，也需要有形势。

法：这个论点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勃兰特总理，您年青时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吗？

勃：我想是的。但我不认为我为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做过相当大的努力。很可惜，我应该努力些。因为年青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意味着为晚年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做了良好的准备。

法：这么说，您年青时是左派社会主义者。那么，您现在还保留着哪些当您还

是个热血沸腾、热情奔放的小伙子时所梦想的社会主义？

勃：您看，那时梦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一部分已成为现实。如果把当时人民的生活条件和今天人民的生活条件作一比较，就不得不承认，就物质保证来说，很大一部分已经实现。今天有待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持久任务。这不仅涉及到工资，尽管工资是重要的，而且涉及到加强人的个性。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这就是说人们应该懂得如何组织自己的生活。……您看，我年青时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我当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件有待实现，然后再进行改善的事情。事实上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它是一项没有止境的任务，要把自由、正义和互助精神结合在一起。实现社会主义就象从未见过大海的年轻人学习航海一样，当他第一次出海时，他发现地平线并不是一条疆界。随着航船的移动，地平线也在移动，而且愈来愈远，愈来愈远，直到似乎存在许多新的地平线。噢，就是如此。我就是把社会主义看成一条我们永远达不到但又企图越来越靠近它的地平线。

法：勃兰特总理，您受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影响有多深，是不是受了它的影响？

勃：当然受了影响。就以挪威为例，对我来说那是个很重要的国家。生活在挪威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因为挪威的农民从来没有当过奴隶，从来没有。农民运动是他们现代民主的基础……自然，这一点对我是有影响的。我在那里发现了自由主义的因素，没有这种因素，人道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存在。

法：勃兰特总理，我知道您的大儿子是毛分子……

勃：噢，他不认为自己是毛分子。他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已经25岁了，是成年人了，不再代表自称为毛分子的青年叛逆者，尽管他的思想和他父亲的思想很不同。

法：但是，我的问题还没有提完。您是否认为今天的青年人有点忘恩负义，或者说他们的行动带有盲目性，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将来生活得更好？

勃：不，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今天的青年人没有机会对今天的现实同昨天的苦难，例如我们在战时和战后所经受的苦难进行比较。当我们在苦难中倍受煎熬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没有出生，因此他们只是以他们所希望的明天来同今天的现实作比较。

我说明白了吗？他们不像我们那样考虑问题。我们在天平的一边放上今天的收





获，在天平的另一边放上1945年和1946年我们所有的一切，经过这样衡量，就会感到。“我们真是好样的，干得不错。”在今天的青年人面前，我要维护我们的成就。我说，我们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你们任何人都不能无视我们的自豪感。但是我并不期望他们会把我的问题看作是他们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问题。结果是我维护我的时代，他们维护他们的时代。在我和我的孩子们之间也是这样。这样做有它的好处，可以避免争论。我应该承认，我同我的孩子的争论从来是不多的，固然这也由于我一直很少和他们在一起……我经常不在家……但是，当我住在柏林的大儿子来看望我或到我们这里来度假时，我们也不吵架。有时我们也会接触到各人的道德范畴，我就简单地说：“我的问题不是你们的问题，你们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

法：总理先生，令人惊奇的是政治并没有使您变得冷酷无情。

勃：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一般的人在登上权力的宝座时会情不自禁地喊道：“啊，我总算得手了！”这样的人有变得冷酷无情的危险。但我能控制自己，克服这种情绪。

法：即使当阿登纳猛烈地攻击您，强调您是一个私生子，您加入过挪威国籍……

勃：阿登纳对待我的确是很坏的。奇怪的是就个人关系来说，他从来没有流露出敌意。他虽然说过那些关于我的坏话，但对我却有某种好感。我虽然对他的政策和做法很不赞同，但对他本人很尊敬。在1961年的竞选运动中，正当流传着那些流言蜚语时，他召我去他的办公室。就是现在我们呆的这间屋子，而且我就坐在您现在的位置上，他则坐在我这个位置。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总理先生，您认为像您这样搞竞选运动是正确的吗？是明智的吗？”他回答我说：“市长先生，我不知道您在讲什么！您认为我和您过不去吗？我做梦也没有想这样做！如果我和您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我可以把您找来一起谈一谈。”对此我没有加以反击。或者说没有像在1957和1958年竞选运动中那样对他的攻击进行反击。在1965年，对我的攻击再次出现，我生气了，不愿再参加竞选。我告诉我的党：“算了吧，我给你们增加的负担太重了，你们受不了。最好让别人当候选人。我退出竞选，”正是从那时起，情况才开始好转。有时需要放慢速度，甚至把汽车停下来才能重新快速前进。1966年我党举行了代表大会，会议结束时代表们一致支持勃兰特……

法：于是勃兰特当了外交部长，然后当总理，后来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勃兰特总理，您听到这个消息时哭了，这是真的吗？

勃：没有，这是夸大事实。没有，我事先预感到要授予我这个奖金。当我的助手阿勒斯把有关这个消息的电报递给我时，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接过那张纸把它放进了抽屉，继续写我的笔记。那天议会召开了会议……的确我很感动，但没有哭。

法：您从来没哭过吗？

勃：成年后我很少哭，非常少，无论是高兴的时候还是不高兴的时候，或者激动的时候。您瞧……像大多数北方人那样，我是个重感情的人。如果你愿意说我是个浪漫的人也可以。因此，我并不是不容易激动，我常常竭力掩盖激动的心情或者说抑制这种感情。我更喜欢笑，特别是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喜欢说笑话。这是我的弱点。我收集所有的笑话，而且常常编笑话。不幸的是我常常比听我说笑话的人笑得更厉害。

法：您讲的这些都很有趣，可是我觉得您不大可能以这样超然的态度谈论诺贝尔奖金。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政治家并不多……

勃：这是因为优秀的政治家并不多，是因为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必须注意不要得罪其他人。授予我奖金正是因为遇到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即得罪人最少的时机。事实上，尽管我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但我还是有很多朋友。是的，我明白。您想知道诺贝尔奖金是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满足。不是的，它使我受到鼓舞，但我并没有高兴得手舞足蹈。要是我浏览一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名单，甚至只要想到诺贝尔奖金被认为是最严肃的奖金，那么我……总之，我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金时的情况和卡尔·冯·奥西茨基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金时的情况不一样。他当时正关在集中营里。后来让他从那个集中营里出来也仅仅是为了把他软禁在医院里，直到他去世。奥西茨基是一个象征，一位烈士。而我决不是烈士，当我获得奖金时并没有遭受痛苦。

法：勃兰特总理，由于听到了“痛苦”二字，我向您提个在这次谈话开始时就提的问题。您对不知道谁是您的父亲感到痛苦吗？

勃：我没有感到痛苦，没有。如果您说的不是“痛苦”而是“伤痕”，那是另一回事。“伤痕”是有的。但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几乎把它遗忘了。我很早就开始独立生活，很早就开始用自己的名字，自己取的名字。我把我现在使用的名字





看成是我自己真正的名字，这并非偶然。再则，说我不知道谁是我的父亲并不确切。我告诉您一件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的事情。对任何人也没有……我知道我父亲是谁。我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从来不愿去见他。战后他还活着。即使那时我也没有兴趣去见他。

法：为什么？是出于怨恨？是出于对母亲的尊重？

勃：不知道。我不愿评论我这个态度。我只向您提供事实。

法：我明白。我想，大概您的母亲在您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勃：是的，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这样的。所以当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成了社会主义者”时，我就回答说，这是由于我的母亲。尽管当时她还很年轻，尽管当时禁止妇女参加政治集会，但是我母亲仍然是工会运动的积极分子。因此，我不仅出生于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的环境中，而且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有深刻的根源。您明白吗？这不是我的功劳，是母亲的功劳。

法：也许，正是因为您没有父亲而有这样一位母亲才成为维利·勃兰特的。

勃：这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请教过精神分析专家，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我只能告诉您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好像这一切对我的潜意识都有影响。是的，应该有影响，但我不知道影响究竟有多大。再说，如果仔细、清醒地自我分析一下，我对生活的态度大多是受书籍的影响，而不是受人的影响。当然，我母亲除外。如果人们问我，“哪一位作家、政治家或其他人物对你影响最大？”我觉得很难回答，简直不能回答。我只能说：“我读过许多书，读了很多。”我甚至还不知道如何把那些书对我的影响与我出生和成长的环境联系起来。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我并不在乎这些，对无法弄清楚的事情，我不喜欢非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法：勃兰特总理，您信教吗？

勃：噢……我对宗教的解释完全不是正统式的，但我不是无神论者。您是不是想知道这一点？不是，我不是无神论者。简单来说，我对人们称之为上帝或超自然问题的解释不同于去教堂的那些人的解释。一般来说我不喜欢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因为……总之，彻底透露内心深处的东西是违反我的本性的。即使我愿意我也说不明白。

法：勃兰特总理，这一点我很理解。我还没有采访过一个像您这样守口如瓶的人。什么都谈，就是不谈维利·勃兰特。

勃：您应该记得，我是波罗的海人，是半个水手。在挪威居住的那些岁月对我影响很深。为了使您能谅解我，我给您讲一个似乎是特意为我编造的小故事，当然是挪威的故事。在峡湾边的一座山上住着两个农民。他们各自生活。一天，他们中的一个到另一个家里串门。他走进屋子，一言不发，只是稍微点了点头。主人同样一言不发，甚至头也不点，但是他向酒柜瞥了一眼，那里放着一瓶烈性酒。客人明白了主人的用意，他走近酒柜，拿出酒和两只酒杯，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斟满了酒。两个人开始喝起来。屋子里鸦雀无声，两个人慢慢地喝着，一杯又一杯。没有任何一点声音惊扰这场哑剧。但是，当剩下最后一口酒时，客人举起杯来，轻声说道：“干杯”。这时另一个人马上叫了起来：“蠢货！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喝酒还是为了说废话？”

法：勃兰特总理，我不对您说“干杯”，但我能否对您说“再见”和“谢谢”呢？

（摘自《风云人物采访记》）





附录四

联合国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

序言：新闻及出版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是《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中所尊崇宣示的所有自由权利的试金石。因此，和平的增进与维护，必须靠新闻及出版自由。当报业及所有其他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经常自动努力保持最高度的责任感，切实履行道德义务、忠于事实，以及在报道、说明和解释事实中追求真理时，这项自由将获得更好的保障。因此，这一国际道德信条，对所有从事新闻及消息采访、传递、发行和评论的人，以及对从事文字、语言，或任何其他表达方法，描述当前事件的人而言，可作为职业行为的标准。

第一条：报业及所有其他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他们应当尽可能查证所有的消息内容，不应任意曲解事实，也不应故意删除任何重要的事实。

第二条：职业行为的崇高标准，是要求献身于公共利益。谋求个人便利及争取任何有违大众福利的私利，不论所持何种理由，均与这种职业行为不相符合。任意中伤、污蔑、诽谤和缺乏根据的指控，都是严重的职业罪恶；抄袭剽窃的行为亦然。对公众忠实，是优良新闻事业的基础。任何消息发表之后，如果发现严重错误，应立刻自动更正。谣言和未经证实的消息，应加指明，并作正当的处理。

第三条：唯有符合职业原则和尊严的任务，才能指派给报业及其他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以及参加新闻事业的经济与商业活动人员承担。

发表任何消息或评论的人，应对其所发表的内容负完全责任——除非在发表时已明白否认这种责任。

个人的名誉应予以尊重，有关个人私生活的消息与评论，可能损及个人名誉时，并非有助于公共利益，而仅仅是迎合公众好奇心理一者，则不应该发表。如果对个人的名誉或道德人格提出指控时，应当给予答辩的机会。

关于消息来源，应慎重处理。对暗中透露的事件，应当保守职业秘密。这项特权经常可在法律范围内，作最大限度的运用。

第四条：描述及评论另外一个国家事件的人，有责任获得有关这个国家的必需知识，确保自己作出正确而公正的报道和评论。

第五条：本道德信条的基本原则是：确保对职业道德忠实遵守的责任落在从事新闻事业身上，而不是由任何政府承担。因此，本道德信条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政府可以任何方式加以干涉，并强制新闻界遵守其中所列举道德义务的理由。





附录五

美国三项新闻道德准则

第一项 报人守则

我们相信，新闻事业为神圣的职业。

我们相信，公众信赖报纸上所刊载的文章，凡与报纸所刊载文章有关的人，就其全部职业而言，均为公众所信赖的人，因此，不为公众服务而仅为私利驱使者，均为背信弃义之徒。

我们相信，思想清晰，说理明白，正确而公允，是优良新闻事业的基础。

我们相信，新闻记者，只需写出心目中认为真实的事物。

我们相信，对新闻压制均属错误，除非为国家社会幸福而设想者。

我们相信，出言不逊者，不适宜从事于新闻之写作。受本身偏见所左右及他人偏见之笼络，都应该避免，绝不能因威逼利诱而逃避本身之责任。

我们相信，广告、新闻与评论，均应为读者的最高利益服务。因此，一种有益的求真求实的观念高于一切，是唯一的标准。新闻事业的良莠，视其对社会服务的多寡决定。

我们相信，新闻事业的最大成功者，也就是最应该获得成功者，必使上苍与人间有所敬畏。它独立不挠，傲慢权势均不能使其动摇。重视建设性、宽容性，而不取粗率性。自制而忍耐，经常尊重读者，而始终无所恐惧。勇于打抱不平，但不为特权者的要求或群众的吵闹所惑。在法律、忠诚及互助的认识下，尽量给予人平等的机会。

深爱我们的国家，又诚心促进国际善意，加强世界友谊。这样的全人类的新闻

事业，为今日世界所共有，亦为今日世界所共享。

第二项 新闻界信条

前言

人类一切活动、感觉与思想，均有赖于新闻报道，而相互了解，这是报纸的最基本的任务。所以担负此项任务的人，必须有渊博的知识，广泛的见闻与经验，天赋与专业训练而成的深刻观察力以及最明确的理解力。新闻记者有立言记事的机会，必须尽到教导者与解释者的责任。美国新闻界有优良之传统与远大之理想，为提纲挈领便于信守起见，特作为守则七条如下：

一、责任

报纸有争取读者吸引读者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利，必以为公众利益考虑为范围。报纸吸引读者愈多，其对读者所负的责任愈大。报社工作的每一同仁，均分担严肃的责任。既然读者信赖报纸，若报纸利用读者的爱戴，实施自私自利的企图，谋求不正当的目的，实在有负于这种崇高的信任。

二、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人类基本的权利，应受保障。凡是法律上未明文禁止的事项，报纸都有权评论。这种权利，不容置疑，即限制自由的各种法律，是否必要，亦可讨论。

三、独立

报纸对于公共利益必须尽职尽责，对于任何方面都不可接受委托与义务。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由极为重要。

1. 报纸若为任何私人的利益作宣传，违反公益，则不问其借口如何，均有违反诚言之旨。私人方面交付的稿件如予发表，必须确实能证明该稿件之内容与形式，均有新闻价值。不然，亦应使读者明了此稿件是何方面说送刊的。

2. 社论不可稍有偏颇，若有意颠倒是非，实属违反美国报业的高尚传统精神。新闻的记载，亦不可稍含偏见。以致破坏报业的基本原则。





四、诚信

凡一切新闻事业，当以对读者的诚信为其基础，故必须诚挚、忠实与正确。

1. 报纸为争取读者的信任，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力求正确。凡为报纸力所能及，而未能作完全与正确之报道者，这种报纸，确实不可宽容。

2. 报纸的标题，应与代表的新闻内容相一致，不可稍为夸大失真。

五、公平

新闻的记载与意见的发挥，两者是有区别的，不可混淆。意见与事实分开，是美国报界的优良习惯，每一新闻不可掺杂任何私见或带有任何偏见。唯特写之类，显然是为鼓吹某事而写的某种新闻稿，用记者个人签写发表，其中结论与释义，记者本身可负责者，则不在此限。

六、正直

报纸发表文字，涉及他人名誉及人格者，除有官方文件可资依据者外，均使受害者有申诉辩驳的机会，除司法诉讼已有裁判者外，凡报纸对于他人有严重指责，均应给予这样的机会，此为良好的习惯。

1. 报纸不可侵犯私人的权利与伤害私人的感情，以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公众的好奇心与公众的权益，二者截然不同。

2. 报纸的言论与记载，如发觉有错误之处，不问其原因何在，均应作迅速与彻底的更正。更正一事为报纸的权利，也是报纸的义务。

七、尊重

凡报纸假借道德的理由，对于社会伤风败俗，如奸淫劫掠的犯罪事实，着意描写，迎合低级趣味，煽动低级情感，此类报纸，显然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实不逃于不诚实的罪名。我们虽然没有制裁此种不良报纸的规定，但是我们在此不得不郑重宣布，凡诲淫诲盗的报纸，必定因读者的反证与同业的谴责，而日趋于失败。

第三项 记者道德律

第一决议：

1. 新闻记者的第一责任，是报道正确的无偏见的事实，并展现在公众的面前，

他与公众的接触，应遵守尊重团体与个人权利的原则。

2. 新闻记者应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报道，均应遵守正确与公正二原则，而不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种族的及宗教的偏见所左右。

3. 新闻记者报道犯罪新闻时，对于有犯罪嫌疑的人，在法庭判决其有罪之前，只能当他是无罪者看待。犯罪新闻的写法，不可使读者大众引起误解或发生偏见。

4. 有特殊关系的个人及团体，如广告户主、商业巨头、新闻记者亲友，凡是与他们有关的消息，应该刊出的不许加以扣压不发。本会会员应共同努力，或与发行人及编辑人取得协议，以限制此种扣压新闻的举动。

5. 新闻记者应保守秘密，不许在法庭上或在其他司法机关与调查机关之前，说出秘密消息的来源。

6. 一切新闻只能在编辑部内处理，不许在业务部内编好了新闻，拿来给新闻部使用。

7. 在采访部门内与采访部门外，新闻记者均应举止大方，表述其独立的地位与自尊心，不许有任何举动，使人有向人献媚以谋利之印象。

第二决议：下列事情，本会认为失当

1. 把一切宣传材料，拿到新闻版上来，冒充新闻刊出。

2. 有些事情，新闻记者明知其为虚伪欺骗，且对于个人或团体，有压迫与损害之影响者，一定要记者去采访去描写，这种流行的习惯，我们也认为失当。





附录六

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原则声明

序言

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不被任何法律剥夺，保证了人们通过媒体表达言论的宪法权利，并因此赋予报纸工作者一项特别的使命。所以新闻工作对其从业者，除了行业和要求外，还要针对新闻工作者的特殊使命对其追求正直品质的情况有所要求。为此目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制定本原则声明，作为职业表现和工作道德的最高标准。

第一条 责任

搜集和传播新闻与意见的最初目的是服务大众利益，将情况通知他们，使他们能对当时的情况做出判断。为个人私利或不值得的目的滥用自己专业工作者力量的报人，将辜负公众的信任。美国新闻媒体是自由的，这不仅是为了告知大众，或作为一个争辩的论坛，也是为了能对社会中的力量，包括政府各级官员的行为，进行独立的检查。

第二条 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属于人民。必须保护新闻自由不受来自任何公共或私人集团的侵蚀与破坏。新闻记者必须时时警惕，关注公共事务是否在公开场合下讨论解决。他们必须同任何利用新闻媒体为自己谋私利的企图进行勇敢的斗争。

第三条 独立性

新闻记者必须避免任何表面或实质上的不适当、表面或实质上的利益冲突。他们既不应该收受任何东西，也不应该参加任何看起来有可能伤害他们正直性的

活动。

第四条 真实与准确

来自读者的良好信任是优秀新闻的基础。应该不惜一切努力保证新闻准确、没有偏见、平衡地表达各方意见。社论、分析文章和评论，在准确性上应该与报道中的事实做同样的要求。严重的事实错误，和疏忽产生的错误，都应该做最快的和突出的更正。

第五条 公正

公正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不应该进行质问，或者不应该发社论表示意见。但是，它却要求媒体在新闻报道和媒体意见之间为读者划出一个清晰的界线。其中有观点和个人意见的文章应被明确标示出来。

第六条 正义性

新闻记者应该尊重被报道的人们的权利，遵守普通的正派的标准，对其报道的准确性和正义性向公众负责。被公开指控的人应该在最早的时间得到做出反应的机会。保证为新闻来源保密是要花很大代价的，因此不应轻易承诺。除非有十分清楚和急切的需要为新闻来源保密，他们应该被明确指出来。

这些准则是为了保持、保护和加强联结美国新闻工作者和美国人民的信任和尊敬，这种联结对确保这个国家的创始人委托给美国新闻工作者和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事关重大。

(1922年作为《新闻记者规范》被采用，1975年修改，并重新命名为《原则声明》)





本书参考文献

1. 《风云人物采访记》(全译本), 法拉奇著, 秘书佩、乐华、杨顺祥译, 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第 1 版
2. 《人》, 法拉奇著, 郭毅译, 新华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
3. 《女人与神话》, 圣·阿里科著, 李青葵译, 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4.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法拉奇著, 毛喻原、王大迟译, 海南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5. 《法拉奇新闻作品中文学技巧的运用》, 《敏思博客》, 2004 年 5 月
6. 《世界第一女记者: 法拉奇》, 刘宇晖、刘宇新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1 版
7. 《诤语良言》, 刘其中著, 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8. 《新闻哲学》, 胡兴荣著, 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
9. 《格调》, 保罗·福塞尔著, 梁丽真、乐涛、石涛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
10. 《偏见》, 伯纳德·戈德堡著, 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11. 《向世界说明中国》, 赵启正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05 年第 1 版
12.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塞缪尔·亨廷顿著, 周琪、张立平、王圆译, 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法拉奇是个另类的性情女人：爱吸烟，说粗话，着男装，有着超凡的思辨与分析能力。她的经历和她的作品都在塑造和强化着一个传奇故事。

她强调社会公平和公正，被视为自由和民主的化身。

责任编辑：窦欣平

封面设计：魏东岳

法拉奇是享誉世界的著名记者和作家，知识女性中的杰出典范。在这个世界上，她纵横捭阖，挑战权贵。在与几十位国家领袖的交锋中，一举成为交相辉映的风云人物。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新闻工作者。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5011-7828-5



9 787501 178285 >

定价：26.00元